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 ARCH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5/95

国内首次出版中文核心期刊名录

本刊被列入全国 45 家综合性文科重要期刊行列

最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公布了我国综合性文科重要期刊 45 家的名单,本刊被列其中。这项工作是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组织的,是国内 41 所高校的 200 多名科研人员长期研究的成果,特聘的 400 多位各学科的专家对各类期刊的分类和核心期刊的筛选分别作了书面鉴定,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核心期刊,指的是刊载与某一学科(或专业)有关信息较多,且水平较高,能反映该学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受到该专业读者特别关注的那些期刊”。这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书编辑的原则和标准,在这一原则和标准下,该书编者应用国际通行的方法对我国近万种中文期刊进行了分类,共分为 128 个学科,再经过全面统计、分析,最后筛选出核心期刊名录表 131 个。其中社会科学类列有《综合性文科重要期刊表》,该表共列出重要期刊(相当于“核心期刊”)45 种,现将此名录表转载如下:(按刊名汉语拼音排序)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社会科学》(北京社科院)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东岳论丛》(山东省社科院)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福建省社科院)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贵州社会科学》(贵州省社科院)
《国外社会科学》(中国社科院)
《河北学刊》(河北省社科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江海学刊》(江苏省社科院、社科联)

《江汉论坛》(湖北省社科院)
《晋阳学刊》(山西省社科院)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瞭望周刊》(北京)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
《宁夏社会科学》(宁夏社科院)
《青海社会科学》(青海省社科院)
《求是》(中共中央党校)
《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
《求索》(湖南省社科院、社科联)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社会科学》(上海社科院)
《社会科学辑刊》(辽宁省社科院)
《社会科学家》(桂林社科联)
《社会科学研究》(四川省社科院)
《社会科学战线》(吉林省社科院)
《思想战线》(云南大学)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藏研究》(西藏社科院)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学术交流》(黑龙江省社科联)
《学术研究》
《学术月刊》(上海市社科联)
《学习与探索》(黑龙江省社科院)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科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中州学刊》(河南省社科院)

1994 年度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评选揭晓

我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广东的成功实践》入选

1992 年以来我刊已连续三次获此荣誉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的 1994 年度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评选最近在北京揭晓。我刊 1994 年第 6 期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广东的成功实践》（作者：周燎刚、张炳申、刘少波、肖立见、鲁开垠；责任编辑：张林）入选，这是继 1992 年度、1993 年度以来，我刊文章第三次获此荣誉。该项评奖活动自 1991 年开始设立以来，一直被誉为全国精神产品最高奖。此前，该文已入选 1994 年度首届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获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通报奖励。

（石成）

目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梁渭雄

主编

张硕城

常务副主编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兼)

编务主任

黄荣显

多出精品 推动我省宣传文化事业向前发展

..... 黄华华 (6)

深入生活实践, 潜心著述耕耘, 为人民奉献无

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 于幼军 (9)

·邓小平理论研究·

邓小平社会发展的观点..... 李恒瑞 (12)

邓小平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 刘景泉 (15)

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 吴志雄 (18)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研究·

珠江三角洲高科技农业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 蒋和平 罗必良 (21)

港澳直接投资与广东产业升级..... 李善民 (24)

·经济·

论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性条件..... 钟阳胜 (29)

劳动形式的比较..... 王茂修 李义平 (35)

从西方“市场失败”论谈中国企业改革... 邓伟根 (39)

“农业滞后型”通胀的特点与成因..... 张爱中 (44)

税收支出与宏观调控..... 胡笑辉 (47)

广告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张纪康 (51)

广东清远经济开发试验区发展战略浅谈... 崔河 (55)

·哲学·

论朱熹哲学体系诸范畴的理论价值..... 梅焕庭 (58)

中国百年一词的嬗变

——“百科全书”定义问题..... 钟少华 (63)

1995年第5期

录

· 历史 ·

世界民族大迁徙中的客家先民南渐新论

..... 谭元亨 (69)

岭南文化与孙中山的思维模式 胡 波 (73)

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与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

——戊戌变法时期女学思想探析 杨 晓 (78)

抓紧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 陈晓东 (83)

论妈祖信俗的性质及中国学术与宗教的多元

互化发展 (澳门) 谭世宝 (85)

· 关于“教育储蓄”办学的讨论 ·

“教育储蓄金”收费方式是有效增加教育投入

的新路子 陈忠联 吴颖民 (90)

教育投资入股:教育大投入与大发展的新选择

...《教育产业与教育市场研究》课题组 李季执笔(92)

· 文学·语言·

中国抗战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页

——抗战初期广州文学活动的一个轮廓 邓国伟 (95)

中国抗战流亡文学简论 殷国明 王 平 (100)

《说文解字》中的“夸父”意象 戴克和 (104)

宫体正义 王力坚 (109)

· 学者访谈录 ·

博士生导师桂诗春教授谈应用语言学

..... 本刊记者 陶原珂 (113)

· 学术动态 ·

“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研讨会综述 关 仪 (115)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3815300—246

3846307、3846177

邮码: 510050

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排印

佳达电子公司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总第 132 期

Creating Much More Excellent Work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pagandistic and Cultural Causes	Huang Huahua (6)
Going Deep into the Realities of Life and Working Heartily on Writing to Present to the People with Perfect Works not Shaming the Era	Yu Youjun (9)
Mr. Deng Xiaoping's View of Social Development	Li Hengrui (12)
Deng's Contribution to Materialist Dialectics	Liu Jingquan (15)
The Main Intension of Deng Xiaoping's Patriotist Thought	Wu Zhixiong (18)
Measures to Develop the Agriculture of Hig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earl—River Delta Area	Jiang Heping and Luo Biliang (21)
Some Relation between the Direct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and Guangdong's Industrial Upgrade	Li Shanmin (24)
On 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or a Constant Increase of Economy	Zhong Yangsheng (29)
A Comparison of Labour Force	Wang Maoxiu and Li Yiping (35)
A Talk about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through a Western View of "Market Failure"	Deng Weigen (39)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ricultural—backward Style" Inflation and Its Cause	Zhang Aizhong (44)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xpenditure from Tax and the Economic Macro—control	Hu xiaohui (47)
Advertisement Economic: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Zhang Jikang (51)
A Brief Talk about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y of the Experiment of Economic Exploitation Region, Qingyuan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Cui He (55)
About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 Category of Zhuxi's (1130—1200) Philosophic System	Mei Huanting (58)

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Word "Encyclopaedia"	Zhong Shaohua (63)
Some New Points concerning Ancient "Hakka" Peo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Nations	Tan Yuanheng (69)
The Culture i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and the Pattern of Dr. Sun Zhongshan's Thought	Hu Bo (73)
An Approach to the Thought of Woman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1899)	Yang Xiao (78)
"A Sequel of the Data Col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ing Compiled and Published Soon	Chen Xiaodong (83)
The Nature of the Popular Belief on A—M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and Religion in Multi—mutual Enfluence	Tan Shibao (85)
Two Theses in Group Discussing on "Educational Founds Collected in Saving"	by Chen Zhonglian, Wu Yingmin, Li Ji and so on (90)
An Outline of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Early Time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Deng Guowei (95)
A Brief Talk about the Chinese Literture—in—exile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	Yin Guomin and Wang Ping (100)
The Image of "Great Father" in the Dictionary Explaining the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uo Wen Jie Zi")	Zang Kehe (104)
Correct Explanation of the Poetry in Palace Style	Wang LiJian (109)
Prof. Gui Shichun, as a Tutor of Doctoral Students, Talks about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Tao Yuanke (113)
A Summary of the 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Guan Yi (115)

多出精品 推动我省宣传文化事业向前发展^{*}

□黄华华

(一)

这些年来,我省宣传文化工作者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乘改革开放的东风,积极探索,勇攀高峰,以改革促繁荣、求创新、图发展,有力推动了我省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在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艺术等思想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一批讴歌改革开放、反映广东人民艰苦创业、奋发向上精神的,有较高思想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宣传文化精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受到广泛好评,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省委对我省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是满意的,同时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继续为我省的宣传文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为了鼓励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多出精品,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和省委宣传部经请示省委同意,决定从今年起设立“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每年评选一次,表彰我省在国内外权威竞赛、评比中获奖的精神文化产品。这是我省宣传文化领域的一项新举措,对推动我省精神文明建设和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鼓励多出宣传文化精品,首先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必须适应物质文明

的发展不断提高,这是我省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开放10多年来,我省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经验。改革开放的大潮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文化艺术的春天。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艺术精品,讴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歌颂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改革者,鼓舞人民群众开拓进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不仅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且迫切需要有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精神产品,陶冶情操,振奋精神,充实生活。

多出精品,也是为了弘扬主旋律,发挥我们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优势,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需要。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持,需要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的宣传文化精品。宣传文化精品,比一般作品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能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积极的影响。能更有效地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发扬江泽民同志倡导的“64字”创业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现

* 这是作者1995年8月12日在广东省精神产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删节。

代化建设建功立业。我省这次获奖的《情满珠江》等一批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就是这样的精品,实践证明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力是巨大的。我们今后应该创作和生产更多这样的精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多出精品,还是为了带动和促进宣传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我们开展了“五个一工程”建设,实质上就是精品工程建设。宣传文化事业要繁荣发展,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只有真抓实干,重点抓好一批精品,并通过这些精品发挥导向、示范作用,才能带动和促进各项宣传文化事业上档次、上水平。同时,通过抓精品,更好地探索新时期理论宣传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规律,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和加强党委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更好地团结和带领广大理论宣传、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工作者,搞好社会主义宣传文化工作。现在,我们通过设立精品奖的形式,将“五个一工程”建设成果巩固下来,形成一种新的激励机制,就能更好地促使这项工程建设,收到以实带虚、以点带面、以少促多的效果,全面推动宣传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二)

创作、生产出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宣传文化精品,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省委交给宣传文化战线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应该说,完成这个任务,多出精品,有利条件是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改革开放走在全国的前列,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先进人物层出不穷,这些伟大的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为我们多出精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多年来我们在宣传文化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锻炼了队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我们多出精品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今后,能否多出精品,就看我们的工作了。我认为,要多出精品,重点要抓好五个环节。概括起来说,一要坚持高标准,二要深入生活,三要形成机制,四要多出人才,五要加强领导。

要坚持高标准。精神产品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具有导向的作用,必须讲求思想性。注意社会效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精神产品要进入市场,要特别注意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创作文化精品,更要求思想立意要高。要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把弘扬主旋律放到提高作品质量的首位,努力创作出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有利于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有利于鼓励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作品与研究成果。使我们的精神产品,能像江总书记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要提倡多样化,将主旋律寓于多样化之中,在多样化中更好地弘扬主旋律。内容上既要有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作品,又要有充分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形式上既要考虑主要艺术门类,又要兼顾其他艺术形式,提倡多种类、多流派、多风格,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需要。文化精品必须是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相统一的精神产品,艺术水准一定要高。各类精神文化作品,都要讲究艺术技巧,提高艺术品位,做到精益求精,增强艺术感染力,要尽可能使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艺术熏陶和思想教育。

要深入生活。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是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造就了一批勇于开拓、求实进取的新人,探索了一条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子,宣传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去感受时代的脉搏,总结实践的经验,了解群众的精神风貌,发现典型,激发灵感,创作了更多的优秀作品。要结合广东实际,挖掘具有广东特色的题材。这次获奖的电视连续剧《情满珠江》、舞剧《南越王》、潮剧《陈

《太爷选婿》等一批具有鲜明岭南文化的作品,在全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显示了岭南文化的巨大生命力,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要立足于广东改革开放中的现实,大力挖掘和反映现实生活题材;同时要继承和发展优秀的广东历史文化,创作、生产出更多的“广货”精品,逐步形成富有岭南特色的现代思想文化景观。

要形成机制。多出精品,需要有一个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和创作氛围。因此必须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步建立和形成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鼓励编创人员勇于探索,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要思想是健康的,就要鼓励敢于立一家之言,标新立异。要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理论研讨、评比等活动,通过竞争,互相促进,提高水平。各地区、各个宣传文化部门、各个学术艺术团体,都应结合自身特点,发挥优势,形成自身的学术艺术风格,更好地在竞争和交流中发展自己。要以这次省设立精品奖为契机,在全省建立奖励、激励机制。各市县、各部门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标准,设立奖项,奖励创作文化精品的有功人员,形成制度,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机制。

要多出人才。抓精品的创作和生产,需要一支政治坚定、思想成熟、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优秀人才队伍;同时这个创作和生产过程,又是最能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把抓精品,同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培养“四个一批人”的任务,同组织实施我省培养宣传思想战线跨世纪优秀人才“十、百、千工程”,有机结合起来。采取措施,动员和吸引更多的宣传文化工作者,投身到创作和生产文化精品的实践中来,并注意在这个实践中发现人才,尊重和保护这些人才。要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使他们能集中精力搞好创作。要加强编创队伍的思想作

风建设和业务建设,并有计划地输送一批有培养前途的人才进修深造,提高他们的思想、业务水平。每个宣传文化工作者,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自身的理论、业务修养,坚持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多出成果,提高自己。

要加强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加强宣传文化工作,多出高质量的精品,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坚持立足广东,面向全面,面向国际,精心组织,加强指导,搞好协调,力争每年都有一批高格调、高品位的精品跨长江、过黄河,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要善于发挥我省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改革开放先行等优势,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吸取国外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的成果打出国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广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级党委、政府不但要抓好宏观的组织和协调,而且应突出重点,由领导挂帅,抓好一批重点项目的创作和生产。有关领导要与有关单位、人员一起,定选题、定实施办法、定标准、定责任;协助搞好攻关,狠抓落实,不能只是在评奖前后才做些选拔、推荐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还应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妥善解决所需经费的问题。一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增加宣传文化建设的投入,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的发展,以及其他重点研究和发展项目,给予大力扶持。二是要切实抓好中央和省委对宣传文化单位实行财税优惠等各项文化、经济政策的落实。三是要帮助思想文化领域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通过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相配套、充满生机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极开辟多种经济来源,形成文化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增强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活力。

深入生活实践，潜心著述耕耘，

为人民奉献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

□ 于幼军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坚持“一个根本方针”、落实“四项主要任务”，要求我们“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今年初，江泽民同志在与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代表座谈和听取新闻出版署、广播电视部电影电视部工作汇报时，强调要重点抓好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影视和儿童文艺创作。丁关根同志和中宣部在今年工作部署中强调要高度重视、认真抓好精神产品的生产，要增强“精品意识”，努力抓出一批精品来。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十分重视精神产品的生产，今年以来，谢非书记、朱森林省长和黄华华副书记等领导同志，多次在会议和检查工作中，明确指出要更加繁荣我省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因此，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这些重要精神和指示，进一步发展我省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形势，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迫切要求我们把精神产品的生产搞上去。

搞好精神产品生产，多出精品佳作，环境、条件十分重要，省委已决定从各种政策、措施上予以扶持和激励，努力改善和优化我省精神产品生产的环境和条件。但是，能否多出精品佳作，关键还在于精神产品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取决于这支队伍是否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较高的理论艺术素养，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对于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工作者来说，希望出精品佳作，就须“打铁先得自身

硬”，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和水平，振奋进取、拼搏和实干的精神，把握正确的科研和创作方向。在此，就这一问题与同志们谈点不成熟的意见和看法。

（一）立足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坚持两为方向，努力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纵观人类发展史，古往今来，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时代精神，用以动员、教育和激励新兴阶级和人民群众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奋斗进取，特别是处于社会大变迁、大动荡的年代，更需要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时代精神，把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武装起来，无论是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莫不如此。

从思想文化发展史来看，有理想、有作为，为社会奉献出深邃思想、上乘精品和传世佳作的思想家、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无一不是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敏锐捕捉和准确反映代表历史发展进步方向的新的思想、新的时代精神，并以反映所处时代社会变迁过程的的矛盾、冲突和各种社会问题、现象为己任。无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时代的诸子百家，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文艺家，都是如此。很难想象，远离社会现实，远离社会文明进步的潮流，能够产生出对社会发展影响积极、重大的思想和作品。

今天，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迫切需

* 这是作者 1995 年 8 月 10 日在广东省精神产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第三部分，发表时略有删节。

要确立起与时代发展趋势要求相一致、与这个时代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相适应的时代精神。时代要求广大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工作者,脚踏祖国的大地,背负民族的希望,积极投身于时代洪流和生活实践中去,用自己手中的笔,忠实纪录历史变迁的轨迹,为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和创造美好新生活的开拓者、创业者、普通劳动者讴歌立传,大力弘扬时代精神,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和理论成果,引导和鼓舞人们不断开拓进取、建功立业。

当前,我们仍要大声呼吁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现实题材的创作给予足够的关注,要立足中国、广东的现实,充分挖掘科研和创作的“资源富矿”。具体来说,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钥匙,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历史发展趋势,深刻揭示时代的精神;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当前的社会运动,深入把握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从理论上予以阐释,或以艺术形象加以展现;要积极探索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又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今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既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又融汇现代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并由此形成作品中的精神力量,去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我们强调要重视现实题材,并不是否定其它方面的题材。我们主张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历史生活的各个方面。题材领域是没有禁区的,关键在于你怎么去表现。题材、艺术形式、风格流派的广泛性、多样性,不仅体现了文艺反映生活的规律,而且也是一个时代文艺创作繁荣的标志之一。我们倡导突出主旋律,但并不否定多样化,主旋律与多样化并不矛盾,主旋律本身要通过学术流派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表现出来。一些同志对“提倡多样化”是接受的,但提到“弘扬主旋律”,就把它与过去那种“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等同起来,担心科研、创作的路子会变窄。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

我们还要进一步清醒认识到,“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更应该成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精品。公式化、概念化以及简单的标语口号化倾向,决不应该成为主旋律的代名词。

没有艺术魅力的“主旋律”,无疑是对“主旋律”的否定。为此,文艺家要在思想精神上自觉地保持自己和时代沟通联系,自觉地争取个人审美情趣与时代审美要求和谐一致。有了这种一致和联系,才能获得驾驭题材的自由。广东的各个艺术品种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独特的民族风格的地方色彩,应保持和发扬这些独特的风格和流派。与时代同脉搏、与人民共忧欢的情感和尊重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规律,将保证我们的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事业既有健康、高尚的导向,又能够产生动人心魄、催人奋进的撼动力。

(二) 要坚持自觉深入生活, 深入实践。

艺术源于生活,理论来自实践,至今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是社科研究、文艺创作自身规律的要求。脱离实践、脱离生活,难以出好作品。这些都是常识。对于深入生活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是老生常谈,不予重视;也有的同志以为在咖啡厅关起门来“侃大山”,就能侃出文学、侃出理论来,其实,如果生活枯竭了,生活积累“入不敷出”,终究会江郎才尽。我们所说的“深入生活”、“深入实践”,主要是指参与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去。因为只有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才能代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生命线。面向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探索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人民群众创造性的伟大实践,也为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源泉。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捕捉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进行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不断总结有积极意义的新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新论断,为实践提供正确导向、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对文学艺术来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广大文艺工作者,应牢牢记住这一教诲,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

实践,贴近人民群众,了解和熟悉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语言艺术,在思想感情上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敏锐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受到人民欢迎的力作和精品。

(三) 要树立精品意识。一部精品佳作所产生的作用和社会影响,远远胜过几部甚至几十部一般的作品。树立精品意识,就是要在社科研究、文艺创作、新闻出版等方面,以向社会向人民负责的认真态度,对自己的作品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小平同志的这番话,同样适用于其它门类的精神产品的创作和生产。

树立精品意识是宣传文化工作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重要表现和保证。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性变革时期里,精神产品对于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对于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都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力求向人民奉献精美的精神食粮,鄙视和不屑于去搞那些格调低下庸俗,甚至是使人颓废堕落的精神垃圾,是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工作者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是起码的职业道德要求。

树立精品意识还是一切精神产品工作者实现自我价值的客观要求。综观古今中外历史,社会大变革、大变动时代,往往是出大文艺家、大思想家和传世佳作的好时机。我们国家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振兴的时代。广大理论社科和文学艺术工作者要珍惜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遇,自觉对自己的科研和创作实践高标准、严要求;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作品精益求精,追求高质量而不贪图数量。“人生能得几回搏?”对一位理论社科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来说,辛勤耕耘劳作几十年,如果能为社会奉献一二部或三几部对社会有积极意义和较大影响,给人们留下良好印象的学术成果和作品,也不枉到人间走一回了。我们热切地期待我省的理论社科

和文学艺术工作者,选准课题和题材作为突破口,把自己生活和知识的积累以及洞察力、分析力、想象力、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力求拿出精品来。

(四) 要有敬业乐业、艰苦奋斗和韧性战斗的精神。搞社科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俗称“笔耕”、“爬格子”,是一种艰苦的精神劳动,是一种崇高而又艰辛的事业。曹雪芹著《红楼梦》,“披阅十载,数易其稿”,杜甫作诗写赋,“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对艺术的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几乎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

从事精神劳动,需要天份,更需要勤奋。选择了这一职业,走上了这条道路,要想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就意味着吃苦耐劳,安贫守道,负重跋涉和奉献牺牲,当然,也会有成功的愉悦。有些同志分析说,广东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有较好的传统,队伍阵容比较整齐,基础也不差,而且兼得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为何十多年来所出的成果和作品,尤其是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成果作品,不如兄弟省多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粤军”的吃苦耐劳和拼搏进取精神不如“陕军”、“川军”和“湘军”等。这话有道理,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

不甘平庸,力求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的我省广大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工作者,确实需要振奋精神、急起直追。要进一步树立敬业乐业、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的精神;要学习鲁迅先生的孺子牛精神和韧性战斗精神,以“十年磨一剑”的意志和毅力,力戒浮躁、潜心创作;要经得起清贫、耐得住寂寞,坐得稳“冷板凳”。

同志们,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充满希望、生机和活力的振兴发展时代!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以稳健、有力的步伐迈向21世纪。这一切都为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广东的理论、文艺、新闻、出版等各个方面,将以更加蓬勃进取和崭新的风貌,不断推出更多精品佳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邓小平社会发展观

□ 李恒瑞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仅制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和战略,而且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观。而贯穿于邓小平的社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则是他的社会发展观。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应用于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着眼于解决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指导原则,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阐述了以生产力为本位、以改革开放为根本战略、以发展和公正的统一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发展观,不但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也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在当代世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邓小平从中国发展的现状和要求出发,从世界发展的走向着眼,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①从各方面阐述了解决发展问题对于中国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关键性。

(一)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既是中国的关键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他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来观察和解决问题。”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我们要从世界发展的全局,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上,来认识中国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首先,现在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而核心问题则是发展问题或曰经济问题,和平也是为了发展。其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开放、经济合

作的过程,是激烈的经济竞争的过程,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经济、科技、人才的竞争。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求得主动地位,关键是加速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再次,要着眼于抓住当前最好的时机,利用矛盾,争取持久的和平环境,加速我们的发展。“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③

(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

“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④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立国之本,最根本的着眼点应当放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上,用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才能促进发展,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前者是条件,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

(三)实现国家的稳定、团结和统一,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因为,稳定是条件,发展是目的;只有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的稳定,才是真稳定,才是长期的、根本的稳定;只有在长期的真正的稳定的条件下,才会有经济的持续的发展。在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发展才是硬道理。

实行“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同

样也有赖于大陆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⑤“一国两制”统一祖国，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是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是海峡两岸现代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大势所趋。“一国两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根本在于民族和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在于经济的共同性和开放性，有赖于大陆经济的真正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达。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社会发展的科学论断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则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⑥的学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又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客观要求提出来的，这一“硬道理”的“道理”就在于“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还在于它是“大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应当服从这个“大道理”，服务于这个“大道理”，而不能违背这个“大道理”。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的发展观是以生产力为本位的发展观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当中还包括了一个更基本的道理，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是以社会生产力为本位的发展观。以生产力为本位观察和解决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这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核心，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突出的特点。

（一）邓小平以生产力为本位观察和解决发展问题，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观点，是强调“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⑦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是“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

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⑧邓小平把这一根本观点概括为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⑨邓小平的这一精辟的结论，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整个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表明了他的以生产力为本位的社会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所在。

（二）邓小平以生产力为本位的社会发展观，从根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发展观上的“左”的错误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观上实现了根本的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被人们所忽略或者被曲解，因而导致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左”的观念、“左”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第一，本末倒置，即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仍然把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放在本位位置上；第二，目的与手段倒置，把巩固制度、体制作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途径，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根本目的和根本的出发点，荒谬地把生产力作为手段，“削足适履”，要求生产力去适应某种体制的框架；第三，因此而把巩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着眼点放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一端，在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问题上引出了错误的结论。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坚持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提出和倡导以生产力为本位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在社会发展观上正确地解决了理论基础和出发点的问题，从根本上批驳和克服了“左”的社会发展观念，引导人们走出了社会发展观上的认识误区。

三、树立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的思想，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

以生产力为本位观察社会发展，就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的出发点，正确地解决发展的道路、动力、战略和社会条件问题。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是中国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又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观。社会发展走改革开放之路，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的又一个基本思想原则。我们应当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从一般与特殊的结合上来理解和把握这一发展观的基

本思想原则。

首先,只有走改革开放之路,中国才能取得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条件。邓小平从社会发展的高度阐述改革的任务和意义时指出:“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条件。”“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10年和下世纪的前50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⑩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道路。改革也是为了发展。邓小平从革命和改良、制度和体制的统一上提出社会改革的范畴和以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从公有制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的关键性问题——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又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因而从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上科学地阐述了社会改革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其次,邓小平还提出和阐述了“社会开放”的理论,强调在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同样把开放作为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邓小平从世界发展的全局,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社会是开放的社会等论断,从这一方面解决了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原则问题。中国是“开放的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汇入世界开放的大潮流,闭关自守同时代的开放特征和趋势格格不入,不可能取得发展。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同属于开放的社会,封闭只能窒息社会主义,葬送社会主义。在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由当代世界的开放特征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开放性质所共同决定的,我们应当牢固树立开放的发展观。

四、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公正、协调的社会发展思想

邓小平的发展观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观,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的基础上公正、协调的发展观。

首先,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相统一的发展观念。我们讲的发展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是实现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在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概括,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发展观的角度来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经济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公正(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两方面的结合,即发展和公正的统一,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只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办到。发展和公正的统一,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公正,在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中推动发展,两者不能偏废。牺牲经济发展去求公正,或者认为先实现公正再去讲发展,这只能是共同贫困,这不是社会主义;离开公正去求发展,或者认为先发展起来再去讲公正,这只是导致两极分化,这同样不是社会主义。当然,在这里,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公正只能在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其次,邓小平观察我国社会的发展问题,着眼于长期、稳定、持续、协调的发展,为实现这样的发展创造条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从根本上为这种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同时,邓小平提出的实现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目标,又是一个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和解决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它关系着改革开放大业的成败进退,关系着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否实现,需要我们共同努力,通过改革开放加以解决。

①②③④⑤⑨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P377, 265, P282, P365, 354, P149, P265, P116, P160, 131

⑥《列宁选集》第2卷P442、586。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34、32

⑧《列宁选集》第1卷P8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彭生

邓小平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

□刘景泰

邓小平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主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①具体说,可以概括为:恢复和阐发了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提出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历史辩证法以及唯物辩证法如何在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上灵活运用的问题。

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反复强调以实践为基础、以客观实在为出发点、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认识路线,系统地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即要求“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邓小平继承了以上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其特点是:

第一,把“实事求是”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的高度来认识。

长期以来,理论界不少人只是把“实事求是”理解为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认为它体现了哲学基本问题,即何者为本原的问题;之后又有些学者把“实事求是”作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仍然没有正确理解“实事求是”的内涵及其地位。而邓小平则突破了人们的狭隘眼界,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审视“实事求是”,第一次作出了这样的科学论断:“‘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③应该说这些论断非常新颖和精辟,是合乎科学性的,为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二,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统一起来,构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正确思想路线。

在过去,不少人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对立甚至割裂开来,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就不能解放思想;要解放思想就不应当受实事求是的束缚。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邓小平与此相反,认为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应当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④另一方面,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

了。”^⑤

邓小平不仅强调实事求是，而且强调“解放思想”，并把两者统一起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第三，把实事求是与历史观点统一起来，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提出不同的对策。

我们知道“一切事物的产生和解决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离开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去考察问题，人们就会陷入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泥坑。邓小平一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讲问题的。”“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⑥

第四，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统一起来，构成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有机整体。

以往有些学者往往把上述几个部分机械分开，没有把它们作为整体中的组成部分来考察。而邓小平则把这几方面都视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彼此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灵魂、根本，丢掉这一条，就等于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也必将否定其他部分的存在。坚持实事求是，必然要求从实际出发，因为“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物、过程及相关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原则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也必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因为从实际出发所获得的各方面材料，还要加以分析研究，上升为理性的东西，揭示其客观规律。同样，坚持实事求是也必然要求通过实践去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把社会实践作为检验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的标准，因为要认识实事求是中的“是”（规律），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并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当然，上述几

方面又是有区别的：“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灵魂、基础，而“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整体。鉴于此，邓小平如是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⑦这个党的思想路线，唯物而又辩证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有机统一，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

第五，善于运用正确思想路线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会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邓小平提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不无新颖独到，因为领导要亲自写一篇指导性的文件或文章，就必须学习许多书面材料，深入群众中去搞调查，然后再加以分析研究，提出指导性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既可培养正确的工作作风，又可学会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另外如“坚持群众路线”、“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等无不是活用唯物辩证法的突出体现。

二

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辩证法进行了新的突破。其主要特色是建立了“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历来都非常重视物质生产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重大作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⑧“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⑨同时，也十分强调劳动生产率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⑩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中，提出“以生产力为中心”的

社会发展理论体系,实现了对历史辩证法的重大突破。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用“以生产力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决策方面实现了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其二,正确处理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把政治路线与经济路线统一起来。“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①邓小平上述论断充满着对立统一的历史辩证法,一方面揭示了经济与政治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经济与政治的差别性,它们各有其特点,因此既要从政治角度来考察经济工作,又要从经济角度来考察政治工作。其三,把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大是大非的根本标准。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提出“生产力标准”这一新见解。他在1980年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②这一见解使人们判断社会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全面的标准,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和具体目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③其四,指明了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政治和文化生活。同时,开放又可打开眼界,推进改革,改革开放政策解决了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推陈出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异常关注但是还未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清

醒地看到:“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

④其五,找到了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⑤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总结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论述:“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⑥1992年他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⑦最后,揭示了劳动者在社会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广大劳动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运用科学技术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性的力量。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新的阐述,他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战略意义,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⑧这又高度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①③④⑤⑥⑦⑪⑫⑬⑮⑯《邓小平文选》第2卷P118, P67、126、278, P364, P141、142, P118、121, P278, P194、195, P314, P128, P86, P88

②《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P759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424

⑨《列宁选集》第1卷P88

⑩《列宁选集》第3卷P509

⑭⑯⑰《邓小平文选》第3卷P265, P274, P277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彭生

邓小平爱国主义

思想的主要内涵

□吴志雄

邓小平既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他把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和忠诚全部倾注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从而形成其充满时代特色的爱国主义思想。正如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升华和结晶。

邓小平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十分丰富，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其中四个主要的方面谈点粗浅体会。

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还在半个世纪前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邓小平就发出“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的号召。^①在建国前夕，他针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响亮提出“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②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面对两个超级大国施加的压力，他严正指出，我们“历来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的”。^③改革开放之初，他不失时机发出警诫：“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同时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提高民族自尊心”。^④1982年，他在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⑤1989年平息动乱之后，他针对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叮嘱第三代领导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⑥

邓小平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语言，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之魂。

二、维护国权，维护国格，增强国力

国权是国家权力的简称，指的是国家实现其职能所必须拥有的特殊社会权力。它对内集中体现为强制性，即国家对敌对势力和破坏分子实行专政；对外集中体现于主权性，即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而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控制和影响。国权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权，国

权丧失了,国家也就名存而实亡了。几十年来,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变换花招干涉我国内政,近几年又拿什么人权、社会主义制度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对此,邓小平大义凛然说:“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⑦“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⑧

国格是一个国家在国务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风度和品格,它既是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尊严、风貌诸方面的统一,又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形象、威望的综合体现。如同一个人不能没有人格一样,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格。“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⑨

西方一些国家大肆鼓吹“人权”、“人格”,其主要目的一是损害我们的“国权”、“国格”,二是推行其“和平演变”策略,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颠覆我们的国家。对此,邓小平洞若观火,他一再提醒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⑩针对西方一些国家散布的无耻谰言,邓小平义正辞严表明了爱国主义者的坚定立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⑪这就是说,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人权,也提倡尊重人格,但是,国权、国格比人权、人格“重要得多”,我们要始终把维护国权、维护国格放在首要位置上。道理很简单:人权,说到底就是人的生存权,如果国权丧失了,老百姓成了亡国奴,他们的生存权还有保障吗?人格,体现人的尊严,国格丧失了,谁还会尊重你这个下等公民?在国际交往中,邓小平始终把维护国权、维护国格放在第一位,这也就是从整体上、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国人的人权和人格。

要真正维护国权和国格,最终只能依靠国家的实力。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贫穷,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⑫为了尽快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他亲自做出了抓住机

遇振兴中华的一系列部署。

三、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就要拥护社会主义,至少不能反对社会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⑬基于这一历史结论,邓小平在关系国家命运、人民利益的最高原则上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明确指出:在今天,爱国就是“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⑭在这个问题上,他既坚持原则又尊重历史和现实,认为对境内境外、党内党外不同的人要求应该有所不同。港澳、台湾爱国同胞和海外的爱国侨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这就是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共产党员尤应在这一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为社会主义无私奉献,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些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⑮

在当今中国,爱国主义必须而且只能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社会主义赋予爱国主义以崇高的理想和崭新的内容,而爱国主义则是社会主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劲的精神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统一的结果,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几年前,邓小平在创立这一理论时,就曾严辞批驳各种企图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言论和糊涂观念。

四、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既要加强民族的爱国宣传教育,又要加强中央的权威

几千年来,爱国情愫和文化传统把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因而,中国历来

就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泱泱大国嘛”，邓小平曾多次以如此深沉豪迈的语言来赞美祖国母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古老的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但同时也招来觊觎已久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敌视。它们或以武力或以和平演变方式妄图颠覆、分裂我们的国家。

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和干涉，我们应该怎样巩固泱泱大国的统一、使她永远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之后，着重指出两点：既要加强民族的爱国宣传教育，又要加强中央的权威。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就发出“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这一号召，^{①⑥}后来他曾多次重复这一号召，前些年他又随着形势的变化把这一号召进一步具体化为“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①⑦}邓小平这一新的号召在今天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①⑧}因为懂得些中国历史，才能对“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①⑨}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懂得些中国历史，才能知道应该怎样去爱我们的国家。

加强中央的权威，这历来是维护大一统国家所必需的。在对内实行市场经济、对外

扩大开放的今天，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这样，诸如宏观控制、协调发展等很多事情“就办不到”；^{②⑩}因为“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那样，动乱就难以制止，分裂也就不可避免；因为“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国外、境外的敌对势力就会乘机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寻找突破口，以实现他们的颠覆、分裂阴谋。有鉴于此，邓小平以坚定果决的语调指出：“中央要有权威”，^{②①}“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②②}“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②③}切不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今天，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都应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个中央的权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为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而多做贡献。

①②③⑤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页、134页、299页、30页、25页。

④⑭《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2页、392页。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⑰⑱⑲⑳㉑㉒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320页、345页、348页、332页、320页、331页、224页、311页、206页、358页、306页、278页、277页、278、319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责任编辑：冯 生

珠江三角洲高科技 农业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 蒋和平 罗必良

要实现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向大商品经济转化,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农业高新技术化,加快高新技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以谋求高科技农业在国内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对此,我们提出如下设想:

一、总体思路

考虑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高科技农业思路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能就珠江三角洲地区谈珠江三角洲地区,而应该积极地把珠江三角洲地区高科技农业的发展放在全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中去考虑,放到整个广东的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中去考虑。据此,我们认为:90年代后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高科技农业的总体目标是根据比较利益原则,主动地把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纳入到国际经济系统中,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新技术,实现有限的农业资源向高层次、高效益开发。充分利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市场、大城市、大工业和大科技的优势,坚持科技发展与市场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实行农业高新技术引进、消化、创新与自主研发开发并举,改造传统农业技术与开发高新技术并举,外引与内联并举,逐步建成用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武装的、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对外开放的现代高科技农业。珠江三角洲高科技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应是建立现代化生态农业的综合技术体系,这就是把现代高新技术同优良的传统农业技术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有机农业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工程技术的成就,构成一个多种适用技术结合,技术、经

济、生态协调统一,具有高产、高效、优质、耗能低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农业技术体系。农业产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有重点地强化名特优稀和鲜活农副产品的生产,大力发展出口创汇农业和城郊农业,努力开拓旅游观光农业。考虑到农产品价格逐渐全部放开以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市场调节比重逐渐加大,广东其它地区会有越来越多的初级农产品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所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郊农业应逐步向高档精细和无公害的方向发展。高科技农业应当成为未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郊农业发展的主要方面,通过发展高科技农业不仅可以提高城郊农业的经济效益,促进更多的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而且,通过农产品的出口还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换回必要的饲料,以缓解因城市的“菜篮子工程”的进一步实施,而对城郊饲料供应产生的巨大压力。旅游观光农业则是积极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开发和第三产业超前发展,追求农业的综合效益,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显然,旅游观光农业在短期内还难以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发展的主流,但是,它在改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环境,满足人们高层次消费需求是有益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对策选择

1. 农业高新技术的重点研究开发领域应紧紧围绕名特优稀和鲜活农副产品和精加工品的生产来确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组织开展与农业生产工厂化、

现代化规模生产相配套的技术研究开发。着重解决：蔬菜工厂化无土（或基质）栽培技术；蔬菜、花卉保护地生产设施及机械化耕作技术；果树、蔬菜工厂化育苗技术；名优鱼人工繁殖鱼苗及高产精养技术；农、牧、渔结合的、与立体农业模式相关的生产配套技术；农业生物工程技术（如动物胚胎工程、单克隆抗体、单细胞蛋白的研究和开发等）。二是进一步扩大引进蔬菜、水果、花卉、畜禽、水产的名优特新稀品种，旨在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档次，增加和更新鲜活产品的品种。如无籽黄瓜、芒果、厚皮甜瓜以及国内外名贵花卉、名优鱼种、珍贵畜禽等。三是重视农业畜牧水产品的保鲜、加工、贮藏、运输和综合技术的研究开发。大力发展农产品的多层次加工和综合利用技术，积极地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户提供农产品产后处理的技术指导，以减少农产品的损失，提高农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扩大发展减少消费者食用前再加工的鲜活产品，如净菜、配菜等，还有绿色食品、保健食品的精加工技术以及荔枝等名贵果品的贮藏保鲜技术等。四是加强农业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要重视近期见效的生物工程技术成果，快速繁殖优良品种，促进建立脱毒苗基地和实现育苗工厂化，利用农产品加工下脚料、植物茎叶等，大量生产单细胞蛋白饲料，开发生物农药、保健食品、绿色食品等。五是要促进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的农业技术相结合，建立和完善应用技术的研究。加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育种进程。重点开发二系法杂种优势利用和单倍体育种技术，动、植物胚胎培养技术，突变体的诱变和筛选技术。把生物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种优势、生产优势和商品优势。运用生物技术手段妥善保存动、植物和微生物等资源；通过生物技术方法创造新型的品质资源，并妥善加以保存和利用。

2. 组织高科技农业示范体系。发展高科技农业是一项多层次、多方位、多内容的技术、经济、生态和社会综合性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科、贸、工、农相配套，逐步形成大农业、大流通、大市场。这就要求打破农业、科技、贸易既分割又封闭的旧格局，

由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各农业科技推广单位、社会各界组成一个一体化开放型的高科技农业示范体系。以科技为龙头，农业部门为主体。搞好技术、资金、农资供应、产品加工、产品运销等系列化配套服务。这个服务体系，既可以称为“高科技农业示范领导小组”，也可以称“高科技农业示范服务中心”。由主管农业的市长领导，办事机构设在农业职能部门，主要任务是协调贸工农生产出口体系各方在高科技农业示范区建设中有关方针、政策、规划、基地建设、优惠措施、签订合同、集资和引进等重大问题。

3. 广开门路，多方疏通农业科技投入渠道。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显著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如建设现代化的花卉温室 50 亩，需要资金 900 万元，建设 1000 亩对虾基地需资金 200 万元，而且引进国外良种也需要大量的外汇。这样大的资金量，不采取多渠道筹集是行不通的。因此，应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第一，建立以农业银行、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农业高新技术应用的信贷投入体系，尤其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应设立农业高新技术应用推广专项贷款项目，把资金投向成熟、适用的农业高新技术的转移、试验和推广。第二，建立农村乡镇的自我积累机制，乡镇企业每年应从销售额中提取 2—4%，加上开发新产品的免税金和固定资产折旧，三者捆在一起，用作高新技术开发和应用资金。第三，尽快建立农业新技术装备基金制度。具体办法是：乡镇企业可在其税后留利中提取 5—8% 作为农业技术装备基金；利用矿藏、森林、河域等自然资源兴办的企业，可在上缴的部分中提留 50% 作为农业技术装备资金；外出从事工、商、运、建、服的个体户和联合体，可在上缴管理费中提取 30%，纳入农业技术装备基金；村、组原有集体财产、资产积累应把大部分列入农业技术装备基金；国家对农业的专项投资以及单位或个人支付的土地征用费的大部分作为农业技术装备金使用；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部门也要增加农业技术装备的投资，其服务所用的资金，除收取一定的成本

费用之外,应大部分作无偿投资。第四,积极争取各级财政的支持。第五,引进外资,主动招商,重视引进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吸引外资投资于先进的农业企业。

4. 博采众长,国内外引进与自我创新相结合。引进农业高新技术消化吸收与国产化,是提高珠江三角洲农业的技术水平,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向外向型农业转变的重要环节。在技术上必须大胆实行拿来主义,走引进——消化——创新——输出的路子。农业高新技术的引进地域性很强,台湾、新加坡、泰国及东南亚地区一带,其人文、地理、资源、技术、市场与珠江三角洲有强烈的互补性。它们与欧美有良好的传统关系,把它们作为珠江三角洲引进农业高新技术的重点地区,也能间接地引进急需的欧美技术。由于粤台农业具有相似的自然区域性和传统技术渊源,可用性强、见效快、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应把台湾的农业高新技术引进摆到重要位置,对台引进农业高新技术的重点是:果树、蔬菜、花卉、经济作物、食用菌的品种资源及杂交优势的利用;水产品人工育苗、集约化养殖技术;畜禽饲料、添加剂,特别是单细胞蛋白饲料和藻类蛋白饲料,植物生长素、抗生素等生物剂品的利用,小型农业机械和生产自动化技术,农副产品保鲜、加工、贮藏、运输技术和设备。

5. 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建立以发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综合经济优势的高科技农业产业体系。就现实条件

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应用的重点产业是种植业、畜牧业以及食品和饲料加工业。在城市郊区,以畜禽饲养业和果蔬为重点,在其它地区,则要求主攻粮、棉、油等人们基本生活必需品。为了加快珠江三角洲地区高科技农业产业体系的建立,应实行以农业工程建设方式来推进现代高科技农业产业体系的建设。把现代工业产业运用现代科技和投资的工程建设方式应用于农业的建设。综合运用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科技措施、投资措施、工程措施来建设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现代高科技农业体系。换句话说,要把农业工程化建设寓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并把现代农业的建设工程分解为多层次农业子工程,分项制定实施规划。采用农业工程化建设的方式,是一条投资省、见效快、产出高、效益好的建设现代农业的最有效的途径。从珠江三角洲的实际出发,农业工程化的建设重点要放在农业技术开发工程,传统农业产业改造工程、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工程和新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工程上,为了使农业工程建设更符合现代高科技农业的要求,还必须注意工程项目之间与工程措施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套,农业物质装备工程与农业基础设施及生物技术工程配套,产中设施工程与产前、产后加工保鲜仓储工程配套,通过配套的农业工程的建设,加快珠江三角洲地区高科技农业产业体系的建设。

作者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责任编辑: 郑英隆

1978年以来,广东产业结构变化的最突出表现是第二、三产业迅速取代第一产业的地位,在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1978年广东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9.9:46.4:23.7,1993年演变为17.3:50.4:32.3。广东产

业结构的迅速变化是大量利用外资,尤其是港澳直接投资兴办合资企业,发展“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实现工业化的结果。要实现广东产业升级的目标,必须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在继续吸引港澳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吸引跨国公司来广东投资,增加广东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

一、80年代港澳直接投资与广东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香港在50—70年代工业起飞成功,而进入80年代香港面对劳工短缺的矛盾以及高昂的土地和租金成本,一些公司企业迫切需要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区外。广东率先在国内实行特殊政策,允许采取各种灵活措施接受来自港澳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这一开放政策措施给两地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港澳企业大规模进入广东以后,利用了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差异的优势,使传统的香港小规模经营企业重

现生机。对于港澳企业家来说,通过对广东的直接投资,继续保持了其“低成本、中技术、高增殖”的发展优势。港澳的制造业,通过这一跨地区的合作,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组合模式:“西方国家的R&D的技术

转移成果——广东(或华南)的土地、劳工的低成本投入——港澳通过市场开拓和管理实现高增殖。”^①这一经济技术组合模式,不但为港澳的制造业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而且对广东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979—1993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近300亿美元,其中约有70—80%来自港澳。1990—1993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191.19亿美元,其中来自港澳的投资143亿美元,比重为74.8%,同期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43.23亿美元,其中来自港澳的投资124亿美元,比重为86.6%。

从投资行业来看,广东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80%投资于工业(图表略)。尤其是投资于轻工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家电、电子、印刷、医药等轻工业,不少产品在生产规模、质量、品种等方面逐步成为国内市场竞争的优势,部分产品出口国外,使广东的轻工业优势得到发挥,1978—1993年间广东轻工业产值年均递增速度达22.5%。

利用港澳直接投资,促进了广东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演进,主要表现在:

第一,广东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发生重大变化,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

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为:第一产业将逐渐减少,第二、三产业将逐渐增加。广东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317元,到1993年达3909元,三次产

港澳直接投资与广东产业升级

○李善民

业产值(GDP)构成由1978年的29.9:46.4:23.7变为1993年的17.3:50.4:32.3,劳动力构成由1978年的73.3:14.2:12.1变为1993年的44.0:32.5:23.5。据估计,广东目前约有300多万劳动力,为3万余家港澳投资的工业企业生产和加工。

第二,广东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变化,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广东利用港澳资金发展“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后,大量农村劳动力洗脚上田从事工商业活动,使农村中工业、运输、建筑、商业的产值比重从1980年的31.6%升至1993年57.9%,农业只占42.1%。由于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后,农民经营的土地面积增加,加上工业发展后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增加致使农业内部出现了从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结构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格局,尤其是养殖为主的牧业与渔业增加更快,使种植业与林牧副渔业的产值比从1980年的65:35变为1991年的49:51,农产品商品率达70%。

第三,广东第二产业内部形成了轻纺、食品、饮料、电子及电气机械等一批优势产业。广东由于受资源条件的约束,重工业中的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发展缓慢,而机械制造业发展较快,成为主要的重工业部门,1978—1993年间,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年均递增仅为5.5%和8.5%,而制造业平均年增长达13.6%。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占重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50.6%下降为1993年的32.1%,同时制造业比重由1978年的49.4%提高到1993年的67.9%。改变了重工业内部的不平衡发展,发挥了机械制造业在广东重工业方面的相对优势。

轻工业内部也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传统轻工业向以金属和化工材料为原料的现代轻工业转变。在机械工业中家用电器制造和金属制品快速增长,纺织缝纫业中克服了单一棉纺初级加工的弱点,转向服装制作及化纤原料为主的纺织深加工,电子工业迅速发展,使其比重从1981年的2.4%提高到1993年的11.1%,形成了轻纺、食品、饮

料、电子及化工等优势产业。

第四,广东第三产业迅速恢复。改革开放前广东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的需要,促进交通通讯业、商业饮食服务业、外经外贸和房地产公共服务和咨询业的发展,广东省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在商业饮食业、供销储运和房地产业有大量的港澳资金进入,尤其是房地产成为外商投资第三产业的热点,投入的资金占广东外商直接投资10%以上。广东第三产业的恢复性发展,改变了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格局。

二、广东产业升级的矛盾与港澳直接投资的作用

产业升级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使各产业之间互相配合,发挥产业整合效应;二是产业层次不断提高,从技术水平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低层次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层次转化,在第一产业中发展“三高农业”,在第二产业中发展高科技工业,在第三产业中发展金融保险、技术服务咨询及信息等现代服务产业。

(一) 广东产业升级面临的矛盾。

第一,广东产业内部层次低。农业中“三高农业”的比重不高;第二产业发展又受到的能源原材料不足的限制,存在支柱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从广东1992年投入产出表看,感应系数最大的前十位产业,能源原料部门占了五位,即金属冶炼及加工、化学工业、石油开采及加工、电力等,说明这些部门制约经济发展最严重。从影响力最大的前十位部门看,纺织缝纫、金属制品、电子、电气及交通设备制造等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比较大,这些产业的发展会对整体经济起带动作用。但目前这些产业的组织结构不合理,规模效益差。各地产业结构趋同,都集中搞以上产业,造成小型分散、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专、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拳头产品和形成优势的名牌。产业技术水平低,高新技术产品在全工业总值的比重不到6%,大量属于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产品。②第三产业中高层次的金融保险、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等等的比重很低,很难适应第一、二产业高速度发展的需要,提供不出高质、高效的服务和劳务,特别是在推进全面改革中,金融保险和社会公共保障体系建立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深化改革的进程。第二,资金不足的矛盾突出。广东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实绩,但相对于快速增长的广东经济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尤其在投资项目金额小,缺乏大型投资项目时,要提升产业层次极其困难。据专家测算,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要实现新目标,1991—2005年共需投入资金21000亿元,平均每年约1400亿元。由此可见,广东产业升级必须进一步利用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大额投资。第三,科技体制与高速的经济增长相矛盾。高速的经济增长,需要不断的科技投入,各国产业升级的事实表明,技术进步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但目前国内整个科技体制仍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能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科技成果转化困难,而另一方面企业普遍感到科技开发不足,技术水平难以提高。

(二) 港澳直接投资在广东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要使广东产业升级,提高广东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港澳直接投资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第一,港澳自身的产业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60年代香港工业开始全面发展,香港选择了纺织制衣业作为现代工业的突破口,服装出口到70年代都保持在世界前列,香港成了亚洲最大的“服装加工厂”,70年代除制衣业外,香港的电子工业、玩具、钟表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迅速发展,到了80年代,香港本身劳工成本上升,土地租金昂贵,因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大量转移到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前店后厂”模式。由于港澳自身的工业技术层次不高,仍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因而仅利用港澳投资来实现产业升级就较为困难。目前港澳投资于广东的“三资企业”从事纺织制衣、玩具、家电、

制鞋、印刷等生产的企业为数最多,而在这些行业中,又偏向于技术层次低、劳动密集型的领域。以在投资中占很大比例的纺织业为例,投资于生产纱布及坯布的项目占六成以上,而印染整理及生产高档产品的项目比例却很小。在已批准的电子工业项目中,约有七成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据统计,属于高新技术型的外商投资企业还不到企业总数的10%。

第二,港澳企业规模不大,从而制约了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规模。香港将雇员50人以下的企业界定为小型企业、雇员50—199人界定为中型企业,200人以上者界定为大型企业。按此标准来衡量,1991年香港小型企业占94.4%,中型企业占4.7%,大型企业占0.9%。如此高比例的中小型企业对广东的直接投资,规模不可能很大。据统计,1978—1993年广州市引进外资项目20729项,合同利用外资金额163.43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吸引外资合同额为79万美元,实际为20万美元。尽管进入90年代外商投资的大型项目不断增加,但是毋庸讳言,广州市“三资企业”中小型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89.11%,大型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2.5%。③对比外商在越南与马来西亚的投资,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广东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的差距。1990—1992年,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平均投资规模为350万美元,马来西亚1990年的单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325万美元,1991年为338万美元,均远远大于广东外商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④没有大项目投资广东,就不可能使广东在较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不可能推动广东的技术进步,产生较大的技术辐射和扩散效应,从而不利于广东产业升级。

第三,港澳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短期行为,造成投资集中于短平快项目的情况,对于长期投资考虑较少。事实上目前广东很多港澳直接投资就是奔着优惠措施而来,甚至出现免税期一满又换一块牌子重新注册,继续享受优惠政策待遇的情况。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不利于支柱产业优势的发挥,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它不可能

带来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无助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三、对粤港澳产业分工与协作的思考与建议

粤港澳产业如何分工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争论颇多,看法各异,笔者认为应该在“优势互补、利益互惠”的原则下实现三地产业的分工与协作,促进三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人们认为港澳具有现代化的通讯运输系统、有广泛的国际销售网络、有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和极具效率的金融保险服务等优势,而广东及华南地区具有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优势,因此粤港澳的优势互补应是在广东及华南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香港中文大学饶美蛟认为珠江三角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是其比较利益所在,并且认为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高科技行业发展需要一个艰辛的过程。由于香港具有各项有利条件(如市场信息多、管理人才多、全球市场网络广等),使香港在进行无边界的制造上具有重大的优势。香港工业家的角色犹如贸易商,把境外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起来,只在本地进行产品设计的工作。^⑤香港浸会大学陈玉尔主张发展“跨地分工”,认为应将产品设计、研究开发、市场分析等“关联服务”以及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生产作业留在香港本地进行,而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作业(包括加工和装配)则转移到华南地区。^⑥这里香港学者或许忽视了广东及华南地区在科技和教育方面的优势。广东具有很大的科技潜力,仅仅由于体制的原因,大部分科技成果未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部分科技人员的潜力未得到发挥,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广东的科技和教育优势将得到发挥,如果从优势互补的角度来看,广东不仅仅应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且有很大的潜力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

另一方面,粤港澳的分工协作必须体现利益互惠的原则。80年代粤港澳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广东的发展离不开“港澳因素”,而港澳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中国因

素”。所以许多学者主张加强华南经济圈的合作,饶美蛟也主张实现香港与华南经济的“一体化”,并且主张由珠江三角洲作中心,辐射到整个广东省,以及福建、海南和广西等省区。他预言香港的服务业与华南的劳动力结合将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与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竞争。^⑦但香港的服务业要与华南地区的劳动力结合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华南地区的经济必须能从这种结合中得益。如果一直利用华南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也可以增加华南地区的国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经济发展,但华南地区本身的产业得不到升级,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这股强大的力量可能也不会持续太久。

因此粤港澳的产业分工与协调应建立在“优势互补、利益互惠”的基础上,从“跨地分工”逐渐过渡到“产业一体化”,即粤港澳的产业技术水平共同提高,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融合发展。对此,笔者建议:

首先,以吸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大型项目为目标,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过去我国的投资环境中强调的几项基本区位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和优惠的税收。实际上这三项基本的区位优势对大型的跨国公司投资项目并不具有吸引力,因为大型的跨国公司投资要求的是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且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投资项目中劳动力的成本比重很小。从税收来看,跨国公司所在国若未与投资国东道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实际上并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因而跨国公司对优惠税收的考虑很少;从土地成本来看,我国土地成本逐渐增加,也将失去优势。但这三项基本区位优势有利于小型投资项目和短期性投资。港澳在广东的直接投资正是因为这三个基本的区位优势而迅速增加。香港和富科技有限公司何锡安最近在广东所作的调查也表明,港澳厂商早期在广东投资,主要因素是邻近香港、低廉的劳动成本、优惠的政策等短期利益。^⑧而从长期和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角度来看,开放的国内市场、互补的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就具有吸引力。因为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主要

希望占领中国的市场。如果有互补的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就更能使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挥潜力,获取利润。何锡安的调查也表明,同样的香港合资企业对将来再投资广东的要求则强烈地重视国内市场,重视人才资源,而对劳动成本及资源供应则放到最低层次。^⑨鉴于此,广东应在逐渐开放国内市场方面作出努力,尤其应逐渐减少对外商外销方面的限制,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广东投资。

值得指出的是,改善投资环境的主要目的是吸引资本技术密集型大项目投资,但并不排除继续利用港澳直接投资。虽然前面的分析指出,港澳直接投资在广东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有限,但可以通过港澳的直接投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促进广东产业升级。不但如此,港澳直接投资对广东的经济发展仍然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从目前来看,广东仍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尤其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地区具有良好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条件。从趋势来看,港澳直接投资中的一部分也开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将对广东产业升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加强粤港澳的科技合作。广东具有良好的科技和教育优势,可以与港澳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近香港工业署宣布开展一项5000万港元的合作应用研究发展计划,增加采用内地与香港科技专才的应用研究及产品开发项目,从而增强香港工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并希望藉此促进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技术合作。^⑩这种有计划的项目合作,不但能促进香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高,而且通过直接投资的扩散效应和广东科技专家的推广,可以促进广东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广东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再次,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广东近年来从内地引进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从总量上看增长很快,但从经济发展的需求来看,则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必须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培养科技人才,并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适应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最后,要正确地确立广东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根据广东产业发展的实际,广东的产业升级思路应该是:一是要立足于现有的优势产业;如家电。二是发展一批带动作用大、技术含量高的石化工业,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如石化工业、汽车工业。三是要积极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业、微电子技术、新材料、精密仪器和生物工程等。

①郑德良:《现代香港经济教程》(第三版),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王鼎昌:《广东产业结构的调整》,《开放导报》1995年第2期。

③隋广军:《华南区域经济变革与广州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港澳经济》1994年第8期。

④杨荣珍:《中国投资环境分析》,《跨国公司研究》第30期。

⑤⑦饶美蛟:《香港产业结构的转型与香港华南经济“一体化”的构想》,《中国人地区的经济协作》,(香港)广宁出版社1995年3月。

⑥陈玉尔:《两岸三地产业“跨地分工”系统的形成》,《中国人地区的经济协作》,(香港)广宁出版社1995年3月。

⑧⑨何锡安:《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工业的协调和整合》,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改革与发展研讨会论文,1995年6月。

⑩《粤港信息日报》1995年6月27日第1版。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论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性条件

□ 钟阳胜

一、经济体制选择的决定因素

从世界经济发展中各国和中国的改革实践来看,我们认为选择何种经济体制主要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这是历史地选择经济体制的基本决定因素和最终决定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体制是一定生产关系存在和运动的具体形式。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反映了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从物质技术基础上决定了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存在和运动的形式。如: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及其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行业、企业和地区之间的分布状况,直接决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状况;社会生产力规模的大小、社会生产结构的复杂程度,直接决定了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结构的复杂程度和方式,决定了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信息传输、决策层次、管理层次及动力层次的结构状况。在社会生产力规模较小、水平较低,从而国民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方式比较简单的情况下,社会为了高度集中和配置经济资源,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保持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的持续发展,可以选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赖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社会生产力的规模小、水平低,国民经济结构简单,一般都选择和实行了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

迅速增长,显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尤其是原苏联,还在这种体制下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的强大基础,于60年代末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但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规模的扩大、水平的提高,从而国民经济结构越来越复杂,这种以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为基本特征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就逐步由适应转变为不适应。于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持续快速的的增长,要求必须改革这种过时的体制,选择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践证明,原苏联由于在这方面没有及早认识,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结果从70年代中期尤其80年代初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最后导致国家解体。中国的成功,改革开放15年以来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加快经济增长的要求,对过去实行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逐步在改革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可见,选择和实行何种经济体制,主要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基本经济制度,而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社会经济自身不断增长的客观要求。

其次,是国家和地区的规模和民族发展的状况。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国家和地区地域的大小和人口的状况,对经济体制的选择、建立和实行过程起着一定的作用。在一

般情况下,如果国家比较小,人口比较少,从而信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比较容易,信息的传输和反馈比较便捷,往往哪怕选择和实行比较分散的经济体制,较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能够宏观上调控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因而就使之有条件选择和实行自由度比较大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反,如果国家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体制的分权程度就要受到较大限制,为了使国民经济有序运行,实现经济持续协调增长,就往往需要较多地运用直接或间接的调控手段,有效地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中国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因素外,本身作为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国的国情,也决定其选择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重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力量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对外竞争战略。这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选择和实行何种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经济体制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实现形式,是为国家在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服务的。因此,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受这种环境影响确定的国家在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中包括对外发展战略,必然要对经济体制的选择产生巨大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原苏联过去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评价颇多,对中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一般用照搬苏联模式加以指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看到,进入20世纪以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几乎都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普遍都面临着要迅速实现工业化,奠定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任务。不仅如此,还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由于这种国内国际环境,因此各国建国后最大的问题几乎都是能否生存的问题。为了能够生存和发展,从苏联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洲的中国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往往都无一例

外的推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中苏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中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无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所受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也最大,自然就迫切需要有一种能够保证国家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建设事业,靠巨大投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具体经济形式,因此就选择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各国由于仍然面临着和苏联相同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建设任务,再加上苏联在高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下确实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证明了这种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的合理性并显示出其优越性,因此这种体制几乎被移植到了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各国都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成就。南斯拉夫虽然较早进行了改革,但一开始还是基本移植了这种体制。历史告诉我们,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体制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其基本决定因素就是国际国内的环境以及所选择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发展的战略。当然,现在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依据及其发生的历史作用。这是在体制问题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

二、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及在经济增长中的主要功能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社会经济体制是依据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与一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体系。其基本结构主要有:一是基础结构,即社会生产力及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主体结构;三是组织(机构)结构;四是法规、规则、条例、政策等的规范性制度。这四个方面的基本结构,在运动中又形成信息搜集和处理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利益机制和利益结构系统、经济运行动力机制和动力系统。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组成

经济体制的动态结构,并必然要在运动中对经济增长过程产生一定的经济作用,形成一定社会经济体制的经济功能。

那么,一种社会经济体制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哪些主要的经济功能?

第一,是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不管哪一种类型的社会经济体制,都有一种调节资源配置的机制和功能。其中,以行政手段为主,以计划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的经济体制,为计划经济体制;以价格手段为主,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这里,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的方式,决定了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从而赋予任何经济体制必然具有一种内在的调节功能,即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从社会经济增长过程的起点和实现来看,任何社会经济增长都是一个资源的配置和结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源调动和配置的规模、结构和效率,决定了社会生产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从而决定了国民经济的规模、结构、效益和增长的速度。在这里,经济体制的调节对资源配置的规模、结构和效率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据此进一步对社会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如果经济体制的调节功能比较合理、比较强有力,对经济资源就有较强的调动力、配置力,资源的配置结构就会比较合理,资源的浪费就会比较小,资源使用效率就会比较大,从而就可以用合理的较少的投入实现较大的产出,促进社会经济的较快增长。反之,如果经济体制的调节功能不合理而不够有力,对经济资源的调动和配置的力度就比较弱,资源的配置结构就会不合理,就会造成资源的较大浪费,资源的使用效率就会比较低,从而就会出现投入大,产出小,阻碍社会经济较快地增长和发展。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之所以能形成一种经济动力,加速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善和强化了经济体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以此为中介改善了资源配置的状况,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和资源转化为产品的产出率。

第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功能。这是由

经济体制内部的动力机制决定的一种体制性经济功能。一定的社会经济体制,是一定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主体存在和活动的具体社会形式,其内部有一种以主体需要的满足和发展的实现为中介的利益的分配、调整和实现的利益机制,对主体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起着基本的制约作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任何一个劳动者乃至任何一个社会个人,都不是孤立在孤岛上的单独的个人,而是既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系,又与一定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联系的社会个人。其中,前一种联系是物质联系,形成社会个人的一定的物质利益,对社会个人起着重要的物质激励作用;后一种联系是精神联系,形成社会个人的一定的精神利益,对社会个人起重要的精神激励作用。诚然,社会个人并非单纯的“经济人”,不能没有精神生活和精神激励作用,所以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是,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存在物,又不能不受物质的纠缠。如果不与一定的物质利益相联系,得到一定的物质鼓励,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很难充分调动起来,即使一时调动起来也难以持久。在这里,经济体制内部一定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使用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与一定的物质利益价值尺度有机构成的利益机制,由于与社会个人的物质利益密切联系,并对社会个人的物质利益起着基本的调节作用,因此就成为在微观上影响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以及在宏观上把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机组合起来,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现实社会推动力量的动力机制,从而使社会经济体制具有一种动力功能。

中国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利益机制片面强调统一和公平,不重视差别和效率,与每一个劳动者缺乏直接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使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不利于形成基层社会经济活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过去高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

一系列的改革,使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比较灵活又比较直接的利益机制,承认差别和效率,承认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强调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此使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给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更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比以往更快地增长。由此说明,经济体制具有一种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功能,经济体制改革从动态过程说是一个动力机制转换,搞活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增强社会经济活力,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快速发展的过程。

第三,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整功能。这是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社会经济功能,也是衡量和判断一种社会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增长适应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结构体系,不仅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结构关系,依据它们建立起来的由不同产业部门组成的结构关系,以及反映和体现这种结构关系的积累与消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目前与长远、个人与社会等的动态结构关系,而且包含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结构关系,并与上层建筑各组成部分及其结构状态密切联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无论在其结构还是在其运动过程中,都贯穿所有这些结构关系,反映并以积极的姿态作用于这些结构关系。因此,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经济增长动力的整合、规模的大小、结构的状况、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都必然受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的这种制约作用,我们认为就是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调整功能。

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高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都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整作用则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按马克思设想“把整个

社会变成一座‘大工厂’来管理”,①直接组织生产单位的生产和经营,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的调动、组合,从而实现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由最高决策层进行。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以及它们的组合,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和实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进行等,都打上这种体制的“命令”烙印,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整功能这一经济现象往往“异化”为政治现象,国民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经济过程往往变成一个依靠行政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动员的非经济过程,从而使经济增长运动化、国民经济生活政治化。

在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整功能,才逐步恢复其经济功能的本来面目,并日益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强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经济体制的经济功能,一般以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决策执行主体多层次为基本特征,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以经济杠杆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调节手段,以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为纽带,通过商品的交换、社会供求的总量和结构调整的要求为导向,调整产业、产品、技术以及社会生产和非生产的投资,控制投资与供求的总量和结构,调节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动力,最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整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适应于总量规模较大、结构比较复杂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和运行过程,更有利于调动基层生产经营单位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经济体制的宏观调节和整合功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

三、主体因素与经济体制作用的发挥

上述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从客观分析来看的一种体制性的可能作用,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其实现都有赖于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作为主体的努力。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主体的素质高,主体的实践表现

得更主动、更积极、更富于创造性和更正确，经济体制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功能的容量就更大，就更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反之，其经济功能的推动力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人类社会历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过去被认为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及作为其具体形式的经济体制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并甚至能于此间创造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奇迹，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社会经济主体——国家和企业主，在不改变私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经济体制在局部上进行调整，拓宽了经济体制的经济推动功能的容量，从而形成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利益机制，使劳动者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激起劳动的热情和创造精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管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其优越性和经济推动功能实际也只是一种客观可能的东西，其最终实现必须有赖于社会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无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是，如果认为只要改革体制，转换机制，就能一变百通，解决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中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的快速和健康发展，而忽视作为改革和生产主体的人的素质的提高及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这种认识显然未冲破生产关系决定论的束缚，犯了一种“体制崇拜病”。必须树立一种新的改革、发展观，充分认识人在经济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和人作为主体与经济体制的一体性，看到离开作为主体的人，经济体制的存在和运动就将失去能动的物质和精神的载体，就将失去经济体制作用的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一方面人作为改革主体要改革经济体制，另一方面随着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改革主体由于社会存在条件的改变，又必然要求改革主体自身进行改革，即更新观念，自觉地认识和适应新的利益结构，提高自身适应和驾驭新体制的能力。不然，在改革中建立起来的新体制就不可能高效运行而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甚至还可

能面临体制回归的危险。这是中国在改革高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过程中，必然面临和必须解决的一个改革的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今后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实现经济振兴和现代化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必须看到，人作为主体对经济体制在经济增长中推动功能的充分发挥，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能动作用，是人作为能动的社会存在物的社会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一方面把人放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经济体制是具体的经济关系）中来考察，另一方面又把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提高到人的高度来思考。关于这一深刻思想，马克思有段精辟的论述：“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②这就告诉我们，人作为主体是社会的人，既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相联系又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相联系，生产关系或者说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必须主要通过它对人作为主体，尤其是劳动者作为生产过程的主体在经济上的作用来实现。因此，人作为主体一方面在经济体制结构关系体系中的能动的联系中介和承担者，是在一定经济体制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产生巨大的激情，维护和完善现有的体制或改革旧的体制，努力充分发挥合理的体制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那么，人作为主体对经济体制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什么力量或什么途径去实现呢？

第一，主体自身的素质。其中，一是思想素质，二是能力素质。我们在改革旧的体

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同时对主体自身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要看到,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一个全方位、综合的社会变革过程,其主要目的是打破旧的体制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机制,建立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激励机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全面革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的思想观念和能力素质等,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组织形式,能最充分地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创造才能,这就有赖于日益增长的人的素质的作用。离开这一点,改革的目标,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作用,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因此,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改革主体包括每个社会成员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是完成改革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充分显示其优越性的主要条件、基础、手段和目的。只有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并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人的基础,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地方,实行同样的体制;但领导人不同,其生产发展和经济面貌则迥然,这就在实践上证明主体因素对于体制作用发挥的决定性影响。任何国家和地区,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改革主体在改革中都不能只注意改革客体,建立一种新的体制,而必须同时重视自身的改革和素质的提高。这是一个规律。不遵循这个规律,改革就不能深入下去,就不能建立新体制生存、发展、完善和充分发挥作用的能动基础。

第二,把主体素质的提高引入改革和经济实践,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实践力量。社会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用哲学的观点看,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实践能力和素质在实践中充分展开。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③在改革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作为改革主体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的成果,也是遵循这个规律进行改革实践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在改变世界”,即改革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这就必须把改革主体的改革实践转变为在新体制推动下发展经济的生产实践。因此,又是马克思说得好:“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④为了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不能光停留于拥护赞成改革和新体制的建立,而必须把这种改革立场转变为生产实践,把改革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集中为生产能力付诸生产实践,成为现实、创造财富的社会生产力。我们的一切政策正确与否,其基本点在此。

综上所述,应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联系主体因素与经济体制作用的发挥来考察,必须看到衡量改革中建立起来的新的经济体制合理与否,基本的标准可以有两条,即是否有利于主体素质和能力或者说人的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的生产能力转化为生产实践,或者是否有利于人的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中发挥出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由此告诉我们,我们在深化改革,整体推进,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主体的改革和提高,培育适应于驾驭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新的主体力量,才能充分释放新体制的经济功能,实现通过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9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0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政研室
责任编辑:谭湛明

○王茂修

李义平

劳动形式的比较

生产要素之上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权利关系或行为关系，其基本特征是排它性、流动性和受益性，这里所讲的排它性是指劳动者以其独立人格支配劳动力产权，排除任何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强制；这里所讲的流动性，是讲在 market 价格的诱导下，按照社会需要流向能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力价值的区域或岗位，而收益性，则指劳动者以此作为自己收益的来源。作为劳动力产权的逻辑延伸，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知识产权。

劳动者拥有劳动力产权的过程，是一部壮观的经济发展史。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起着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其中商人资本的作用是使商品生产的范围不断扩大，肢解自然经济；而高利贷资本则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使旧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是形成产业资本的一个有力杠杆。①在这两种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两种不同层次分离。首先是劳动者摆脱了直接的统治与从属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由此而使劳动者不再属于生产资料的并列部分，不再是生产的客观条件。它意味着劳动者从物质地位上升到了有独立人格的地位。然而，仅有这种分离还不足以形成劳动力产权。这种分离只是形成了劳动者的独立人格，但距劳动力产权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他并不必然地使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产权形式进入交易市场，仍然包含着劳动者同个体占有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成为个体劳动者的可能性。要使劳动力的所有权真正转化为与市场交易相联系的产权，还必须有第二层次的分离，即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马克思认为，这是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虽然是残酷的，但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摧毁了个体劳动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使得劳动力的使用成为一种交易关系，成为一种市场行为，并由此使社会经济发生了由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质的飞跃。

劳动力产权的确立，促成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具体表现在：
(1) 劳动力产权的形成，改变了无论是奴隶

比较一下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自由劳动，劳动者与个体占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以及计划安排的劳动形式，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由劳动

自由劳动是指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与其它财产等值的财产形式，并以此与其它当事人签订契约、发生交易、受益或受损。它是与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行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自由劳动的关键在于劳动者成为劳动力产权的拥有者。笔者把劳动力产权定义为附着在劳动力这一

式的生产,还是自给自足的生产都不能包含的,具有深刻内涵的生产目的。这不仅是教科书上所讲的追求剩余价值的问题,而在于这一追求本身是无限的。这种“无限”将作为一种动力,促进社会以难以预料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2)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劳动力没有产权化以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在狭窄的空间结合着,特别是农业和手工劳动的结合的生产方式可以维持人们最基本的生产。而这种生产方式事实上也窒息了人们“侈奢”的欲望及这种欲望对生产的反作用,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生产长期在低层次中周而复始的循环。这里基本上不存在社会分工,准确地讲是一种自然分工,因为该种分工更着重于男女等天然特性。劳动力产权化以后,把整个社会生产尽可能地纳入交易的轨道,如果不生产商品,就什么也没有生产,从而使生产越来越专门化。(3)任何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都在于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产权化所带来的交易与流动,以货币选票作为其流动方向的社会评价,这样的流动在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使稀缺的社会资源得以高效配置。(4)劳动力产权化的特有的经济激励机制,在促使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美国学者西奥多·W·舒尔茨告诉我们,在劳动力产权明确的基础上,可以把人力也当作一种资本,并进行相应的投资,比如消费和教育,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人才资本的价值。此外,在我们看来,此举的关键在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核心是起点平等的平等观和竞争观,并由此而使得个体的人更为全面自由的发展,以达到更高的文明程度。

二、劳动者与个体占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形式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劳动者与个体占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形式。这种劳动形式是指人们的财产以地产为主,劳动依附于地产,因而在人格上并不独立。它一般形成自由劳动的前史,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三大社会形态的第一种形态。在西方社

会,这种劳动形式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最终被商品货币关系所肢解而成为自由劳动,而在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的东方社会则长期存在着劳动者与个体占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形式。鉴于这种劳动形式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本文将主要以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种劳动形式为例作出论证。

“亚细亚”社会的特征是劳动与个体占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形式赖以存在的基础。据研究,“亚细亚”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社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②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③这就使得这样的社会有着极强的自组织能力,使得劳动者与个体占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形式得以长期存在。

道格拉斯·唐思、舒尔茨们曾用劳动的相对价格的提高来说明自由劳动的产生和西方社会制度的演进,我们也可以用这一观点来说明中国社会。在中国,长期以来个体对于土地依附式的劳动形式则在于人力的经济价值没有高过土地的价值。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相当多数的农民在计算成本时,甚至不考虑劳动的因素,而中国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的实质都是“均田地”,这就说明了土地相对于劳动的稀缺。这种情况不可能提供改变劳动形式的激励。

最后,由于亚细亚社会国家高于一切,它完全控制了政治和经济生活,从而阻止了马克思所讲的“市民社会”的产生,也最终扼止了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城市的、个人主义文化的产生,而与这种文化相适应的,还有保护私人产权,包括劳动力产权的法制建设。亚细亚社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当然也没有与之相应的法制建设了。而作为不用交易的个体劳动。事实上也不可能提出这种法制建设的要求。于是,在这种背景下能够存在的只能是个体劳动的形式。

应当如何评价这种在我国历史上长期

存在过的劳动形式呢?首先,这基本上是一种基于男女性别等天然特性的自然分工,而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又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要,于是就扼止了分工,从而扼止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我国社会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羁绊中。在这里,不需要社会评价和社会计算,计算问题被降到了最简单的程度(往往局限在一个家庭内)。其次,最简单的生产只能产生最简单的需要,最简单的需要又反作用于最简单的生产。这种低层次的周而复始,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劳动能力的周而复始,阻碍了人的素质的提高,人们更不会把人力当作一种资本去投资,去交易。而且由于人对土地的依赖,而土地又最终是国家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④最后,封闭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封闭和愚昧的观念,由于没有完整的产权观念,形成了小生产的依附、依赖和不平心理,形成了终点平等的平等观,以及祈求上帝保护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不错,这样的生产方式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但它也同样是中华民族后来落伍的主要原因。“在这些国家里,发展之所以比欧洲迟缓,最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自由工人的存在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哪种不可思议的墨守成规。”⑤

三、计划安排的劳动形式

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由计划安排的劳动形式的特征是国家统一掌握并按计划分配劳动力资源,劳动者则通过按劳分配的形式取得相应的报酬。

计划安排的劳动形式来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前提是国家掌握一切生产要素(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通过国家统一的计划组织社会生产。除此之外,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按劳分配的设想。当然,按劳分配的设想是存在着许多假定条件的,例如,整个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区别和矛盾,财富还没有充分“涌流”,劳动力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力,并和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高度有计

划的结合等。

如何评价计划安排的劳动形式呢?无疑,这种劳动形式试图达到社会公正,当家作主,激励效率的目标,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实践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原因在于:

第一,这种劳动形式很难解决经济激励,资源配置所必须的经济计算问题,这就象理论界已经证明的,在缺少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不可能有效地解决任何经济计算问题——用会计手段计算商品价值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离开了市场交易是不可能社会核算的。然而,由于这种劳动形式不承认劳动力产权,也就当然不存在以产权为前提的交易和流动了。计算的不佳是因社会稀缺资源配置的误导和激励效率的丧失——当平均主义盛行的时候,理性的人的最佳行为模式是“搭便车”。

第二,这种劳动形式使得企业很象一个大家庭,因为劳动者必须依附在企业里。于是,企业不仅要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劳动所得,而且要为劳动者提供子女升学、就业,以及劳动者生老病死等社会保障。劳动者对企业的这种依附,又往往蜕化为对企业领导的依附,这双重依附诱发了劳动者的依赖,攀比,也异化了当家作主。当这种状况进一步蜕化为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的时候,企业开展工作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扼止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因为(1)劳动力产权不明确,谁也不愿意把劳动力作为资本去投资,当未来的劳动素质更多地表现为“知识”的时候,其后果将更为严重。(2)对劳动素质的影响,还表现在依附,依赖所形成的封闭,攀比,平均主义,不敢竞争的心理和观念。这是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严重相悖的观念。

社会主义的中国终于发生了改革,而且改革最直接的原因被理解为是平均主义,“两级大锅饭”所造成的效率低下,这无疑是对该种劳动形式的历史总结和权威评价。

四、明确劳动力产权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选择

我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说是步履维艰了,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在于如何确定人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在于明确劳动力产权,例如,如果劳动者缺少独立的人格和明确的产权,就不能对自己负责,就必然依赖于企业,企业就不可能在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破产,国家也就难以割断与企业的父子关系。

明确劳动力产权,使劳动者以其独立人格签订契约,自由流动,受益或受损,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明确劳动力产权,采取自由劳动的形式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其中各个子系统都与周围环境,制度基础,以及其它的各个子系统有着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有机联系。经济史学家马克斯·维贝尔曾经写道:“我们已经认清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和商业化都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和先决条件。”^⑥限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他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抛开他所讲的资本主义不论,他无疑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的各个必不可少的子系统,其中特别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自由劳动。换言之,如果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而不选择自由劳动,则割裂了制度安排的有机体系,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不合适的。

其次,选择自由劳动作为未来劳动形式的改革取向,还可以拓宽我们的改革思路。迄今为止的改革思路,基本上都在国家与企业、计划与市场上打圈子。然而,企业本身

是一个中间层次,他是需要人搞的。国际上前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实际是无所有制,国内的改革经验也表明,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作为依托,企业是很难成为真正企业的。而选择自由劳动的形式的变革,不仅在于一种劳动形式的变革,而且在于真正着眼于人这一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在于抓住了组成企业的最基本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有效的竞争,才可能有失业、破产机制,企业改革乃至整个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当然,选择明确劳动力产权的自由劳动,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例如观念的变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但无疑,这是一个方向,而且相对于我国历史而言,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巨变。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9—690页。

②〔意〕见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译书),商务印书馆第6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⑤〔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38页。

⑥〔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页。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从西方“市场失败”论 谈中国企业改革

□邓伟根

本文试图围绕西方市场失败问题作一些探讨,并对如何推进我国企业改革的思路作相应分析。

—

在西方经济学界,“市场失败”理论着眼于市场中某些“缺陷”,即市场中偏离纯粹竞争模式的现象,或说市场体制完全不能提供某些商品,或者不能提供最合意的或最适度的产量。

在以私营为基础的市场体制条件下,市场失败往往产生于一种商品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消费。非排他性意指无法排斥那些没有对商品支付代价的人享受其利益。例如,每个人不管对反污染措施是否作出贡献,都能享受到新鲜的空气。在这种场合,个人无需花费任何代价或费用就可以获得物品,市场交换体制也就不能发挥其作用。非竞争性是指某一个体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别的任何人对它的享受。举同一个例子,呼吸新鲜空气的享受就是非竞争性的。在这种场合,索取代价以阻止人们享用该物品是办不到的,因为人们无需花费任何代价即可享受这种物品,市场体制亦不用考虑如何实现最优的消费水平。^①总之,基于种种原因,使市场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或当需要它发挥作用时却并不尽人意,均统称为“市场失败”。

从资源分配的最佳化角度,“市场失

败”包含下列一些问题:(1)垄断、寡头对竞争的限制及市场机能下降;(2)消费者由于情报的不完全性而易于受害;(3)调整人力资源与资产设备供求不均衡所需时间及费用过大,这个问题特别构成中、短期的经济波动,成为随之而来的各种经济浪费及社会动乱的基础性原因;(4)现实的市场经济在收入分配调节上也存在差异性。即由于在市场中通过自由交换决定收入的方法,会因每个人在交换初期占有什么样的资源(劳动力或资产等),以及各个人在经济变动的各种局面下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而形成巨大差异,从而导致所谓“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

以上客观表现或者反映在对社会资源利用的不善上,或者反映在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上。由此很自然地带来另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引致这些“市场失败”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市场不去考虑社会成本与利益,使社会成本与利益和私人成本与利益发生偏离呢?其性质又是什么呢?

依照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社会费用问题”理论,^②只要有明确的私有财产权,很多有外部效果的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适当的契约安排达到最优福利效果。以嘈杂的邻居为例,某一制造噪声的人从大声地放唱片中得到他自以为的享受,而住在隔壁的人则要付出难以忍受的代价。为了解决这一冲突,表面看来可以采取市场解决办法。

爱好安宁和恬静的人为了减少噪音,宁可付给邻居一定报酬,这种交易将会使双方的处境变得好过些,然而,这种做法似乎并不多见,为求宁静而行贿别人的这种观念亦确实异乎寻常。

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市场解决方法虽然可行(正如科斯定理所说的),却很少发生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财产所有权(简称产权)上有差距。倘若有人被授予了合法的权利,在其住宅里愿意制造多大的噪音都可以,那么,屋外的人为使噪音减少,支付他一定的报酬,看来也就不足为奇。同样,倘若有人被给予了合法的权利,不能遭受隔壁邻居的噪音,那么,产生噪音的邻居会因侵犯其权益而给予赔偿,这也讲得过去。事实上,这些权益是模糊的,正由于每一方都没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因而获得经济效率的机会往往在给予谁有什么权利的争吵声中丧失。

从这个表面看来并不重要的例子中可以得出两点:(1)对经济效率来说,谁支付给谁,这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关于谁支付给谁的争论纯粹是一个分配问题;(2)人们经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分配问题,而且这些分配问题往往体现公平的观念,它常常同市场的效益观念相抵触。人们从中发现,一般商品市场只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如果把广义的契约关系看成是一种广义的市场,则企业内各种复杂的契约关系甚至家庭都是可选择的制度安排,什么制度安排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节省交易费用和保证有效的激励机制,这已远远超出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研究范畴。

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学中最活跃的一个领域——“市场失败”是产权定义不明确的结果,许多外部效果问题,都是由于人们议定契约的权利无法严格界定,没有严格界定的这种权利,就不会有有关产品的市场,所以产生了外部效果。例如清洁空气的所有权难以界定,自然就产生污染问题的外部效果。而且,用交易费用经济理论去解释,这种市场失败只是说明了某种最简单的契约形式在节省交易费用如保证有效的激励方

面的失败,并不说明广义的市场(包括企业制度等复杂的契约关系)的失败。正象货币和银行制度没有发明时,人们可以发现很多经济活动不能通过物物交换的低级市场来进行,人们可以说那是市场的失败。实际上,恰恰是由于低级市场的失败才产生了对高级市场形式和制度创新的需要。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就是极好的例证。

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企业而不能纯粹依靠市场来组织生产的分工呢?一定是企业相对于市场有某种长处,而这种长处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那里是得不到解释的。科斯认为:企业制度的本质是用相对固定的长期契约来代替市场,对很多经济合作,市场会比企业制度有更高的交易费用。例如,倘若经理与工人之间的分工通过市场来进行,则需要很多细则明确的契约,而现代大工业生产使这些细则无法明确,而且这类契约亦非常频繁,造成大量交易费用。③工厂制度一方面用长期的细则不明确的契约代替短期契约;另一方面用地域上工厂的集中来减少交易费用,由此可以取得比市场更高的效率。在现代化生产中,以上无法分割的经济活动还很多,碰到这种问题,市场往往不如企业制度灵。

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更明确指出:企业也是一种市场制度,这是用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④例如人们可以买卖中间产品来组织分工,但也可以不买卖中间产品,而买卖劳动力,企业家购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在企业内组织分工。所以,企业的出现必然是劳动力买卖比中间产品买卖交易效率高。从而得出另一个比科斯理论更进一步的观点,即问题根本不是企业代替市场,而是企业制度的创立用高效的市场代替低效的市场。艾智仁也指出,企业制度的发展不但会发展出一个企业内市场,而且也会使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市场更发达。⑤钱德勒在其《看得见的手》中所阐述的论据,与其说是企业代替市场的事实,倒不如说是市场升级发育的历史。⑥

我们在经济理论上是极为重视所有制关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经济理论流派大都把体系构成建在公有制基础上,把所有制关系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尤以斯大林理论为突出。他把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作为生产关系的三大要素,其中所有制被看作是生产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然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却恰恰把理论上十分重要的所有权关系给虚拟化(或说非人格化了),突出的表现是采用国家所有制。这种以代表全民制利益身份出现的国家所有权主体实际上是一种虚化的国家主权者,主体非人格化“国家”或“全民”模糊了所有权关系,使其所有权的界定极不明确。

一方面,国家所有制的占有主体不是自然人。国家所有制是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从表面上看,它从属于自然人(全体人民)的共有关系,但从现实看,或说从完整的产权意义上看,这种自然人共有关系并不能成立。因为国家所有制并不是全体人民按份共有,即共有人按各自份额对同一财产享有所有权,并有权将自己的份额从共有财产中分割出来。事实上,每个公民只是名义上的全民财产的所有者,他在这一总体财产中占有多少份额是不清楚的,即使清楚,也无法履行归其所有的那一份的财产所有权,更无权将自己的份额从共有财产中分割出去。现实上,全体劳动者并不是国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主体。

另一方面,国家所有制的占有主体也不是法人。国有制的占有主体是国家,而国家主权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据现时的法律体系,法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两类,国家管理权的各级管理机关以公法人的身份出现,它与私法人的区别在于既不是以提供一定目的的财产为基础的财产集合体,也不是以社员权利为基础的人的集合体,而是履行国家管理职能的机构。由于公法人与国家所

有权主体并没有直接的法定联系,因而,不能把国家所有说成是国家机关法人所有。^⑦在此情形下,国有企业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国家作为所有者仍能支配、干预企业资产的实际营运。因此,企业始终未能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也就不拥有财产的法人所有权。国家所有权既不是国家法人所有,也不是企业法人,实质上是从抽象的全民或集体所有变为抽象的国家主权者所有或政府所有。

由此看来,只强调经济上的占有关系,而把法律所有权撇在一边,使所有制实际变成一个空泛模糊的概念,这是我国现实所有制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整个体制改革的难点所在。我国国家所有制因其财产占有主体的虚化,所有权界定不明确,从而引致一系列问题,诸如企业缺乏活力、效率或效益低下、集中化的经营垄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及腐败等等。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无法解决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问题。恰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弊病是“预算约束软化”,^⑧其原因何在?我以为,传统公有制主体虚化及产权界定模糊是造成企业预算软化的罪魁,实际上它亦是一种“市场失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时期,这种“市场失败”表现得尤其突出,使市场机制或者难以发育,或者以各种扭曲的形态调节经济运行。

(1) 产权模糊下的“市场化改革”,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公共部门(含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额约占GDP的8—10%,国有资产以数百亿,甚至数千亿元地流失。

(2) 产权模糊下“企业预算软化”的新表现突出反映在虚盈实亏现象十分突出,大体占国有企业总数的1/3,还有1/3左右国有企业是实实在在的亏损!这种现象同西方以偷税漏税为主的“虚亏实盈”形成强烈对比。

(3) 产权模糊下的公有制日益演变为实际上的部门所有制和地方所有制,造成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封闭和隔绝,本

来残缺不全的市场受到“诸侯式”的割据，严重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4) 产权模糊下的政府、企业及个人缺乏必要的自我约束机制。首先，各级政府拥有无限的资产管理决策权，但又没有实在的人格化代表承担决策责任，这种近乎无约束的决策权不仅使决策失误在所难免，而且受狭隘的本位利益驱动，向上级政府机构施加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及政策优惠，追求本地区及部门更高增长速度，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使政府具有不可抑制的扩张冲动及鲜明的短期行为倾向。其次，企业也不是产权的主体，企业的非市场主体及市场本身的扭曲，企业的种种扩张行为可以不受市场约束，就看谁项目争得快，规模搞得大。最后，职工同样也不是产权主体，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所有者、“生产资料的主人”，但实际上不享有资产所有权，也不对资产的损益承担责任。他们只关注个人的收入，因为只有个人收入是确实属于他们自己的。因而，职工对企业决策者亦施加压力，而最直接的动机就是追求人均收入最大化，最终往往会联同经营者一起共同对付国家，尽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工资、奖金和各种各样的福利性开支。

由此看来，产权不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难以建立，不仅会导致“市场失败”，而且有返回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危险。

三

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发展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价格体系及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更重要的是重构合格的市场主体，确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概括地说，就是要把界定产权作为我国进一步加快市场取向改革的中心环节，以产权明确化的思路来推进我国企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根据财产权的内涵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我以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重新界定产权，确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应注意解决以下几方面的原则性问题。

1. 如何加强对产权的法律性保护问题。从财产权性质的界定看，财产权性质可分为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所有制改革不仅在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产权的法律性保护。私有产权以不法手段或歪门邪道侵吞公有产权是违法的，同样，公有产权以强凌弱或以政府部门行政干预去侵犯私有产权也一样是违法的。只有加强产权的法律保护，才能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 如何明确占有财产的法定主体问题。从财产权主体界定看，法定主体对某一特定财产权客体（即法定主体所占有的对象）有排他性的独占权，不可能有“无主物”情形的出现。说传统公有制产权关系模糊，就在于它的产权主体虚化，谁都可说成是财产的所有者，但谁也不承担财产风险。因此，明确产权的核心就是要明确界定财产权主体。就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而言，首先应明确原始财产权主体，重塑出代表国家或全体人民独立行使财产权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改过去由行政部门拥有所有权的格局。在此基础上明确法人财产权主体。促使企业产权独立化，使企业成为名符其实的法人。然后由代表所有者利益的法人机构拥有法人财产权，最终实现以企业法人为中介的两权分离。

3. 如何完善财产权客体的界定问题。财产权客体的界定，实际上就是明确法定主体占有的对象是实物形态的资产，还是价值形态的资产，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通过客体界定，为确立财产的归属提供客观依据。目前在界定财产权客体工作上，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国有资产评估时，往往低估国有资产，以提高自身的利益，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对国有资产的变相侵吞。因而，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时，要切实加强对资产评估公司及资产评估过程的监管，尤其要加强对土地这些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如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评估的监管。

4. 如何实施《公司法》等市场法规，以法律形式界定财产权实现方式的问题。公司法人制度建立后，原本意义上的财产权裂变为原始财产权和法人财产权，它们分别以股

权、债权、物权形式存在,因而,亟需通过法律形式来界定财产权的实现方式,明确原始所有者与法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出资人若以股东身份出现,他只以投入资金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凭借股票参与公司纯收入的分配,对公司财产不再拥有支配权,但可以在股东大会或股票市场上对公司施加股权约束;出资人以债权人身份出现在偿还期内,债权转变为单一的收益权,债权人凭借债券,不管公司盈利高低,按预先确定好的利率获得利息,到期收回资本;公司法人则拥有法人财产权,即物权,代表所有者利益的法人机构对公司财产具有独立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并承担财产风险。

5. 如何制订统一标准,以规范化、制度化去推进股份化改革工作问题。目前,在推行股份制改革进程中,出现不少新的问题,而最为突出的就是用旧有计划经济手段去管市场经济,如依然采用控制规模、搞地区平衡、部门平衡,尤其对申请上市公司,采取“切一刀”的办法,引致一系列非公平竞争的扭曲行为。能否制订出一个规范性标准,并制度化、公开化,让达到标准的企业(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均按统一标准公开竞争,够条件的就让它上,这样才能促

使企业老老实实在地抓好内部基础工作,而不搞争关系、拉后台等浪费资源的寻租活动。

①(英)D·W·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5—376页。

②Coase, R.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 21

③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s* 4: 386—405.

④Cheung, S. N. (1982):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1—21.

⑤Alchian, A. A and Demsetz, H.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 777—795.

⑥Chandler W. Jr. (1981): *The Visible Ha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⑦李肃等:《论我国公有制企业所有权关系的重构》,《中青年经济论坛》,1988年第1期。

⑧诺什·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责任编辑:郑英隆

“农业滞后型”通胀的特点与成因

□张爱中

一

通胀是个国际性问题,而近年我国通胀是有其自身特殊性的。即通胀与农业、粮食有很大的关连,农产品短缺价扬成为通胀的主导因素。1994年的严重通胀更是这种主导因素的连锁反应,农产品价格急剧爬升成为一系列物价上涨的“带头羊”。1994年以粮食为基础的食品价格上涨35%,在整个物价总涨幅中占60%左右。涨势尤其是1994年一至三季度,9月份食品价格同期上涨39.2%,粮食上涨62.8%,油料上涨72.5%,猪肉上涨94.3%,蔬菜上涨55.4%。农产品价格如此高涨,不能不说明我国通胀的特殊性为农业滞后及农产品短缺所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长期保持在50%以上,即人们生活消费有50%以上的支出花销在食品方面。因此,以粮食为基础的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无疑是人们感受高通胀的“压力表”。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近年来工业品消费市场与农产品消费市场相比,其价格相对平稳得多,不少工业品市场甚至变为买方市场。国家内贸部曾对543种日用工业品的1994年下半年供求情况调查发现,供求基本平衡或供过于求的占95.8%,供不应求只占4.2%;面对128种农副产品调查发现,供不应求的占38%,特别是粮、棉、油、肉、菜供不应求的占70%。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农业发展滞后,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日趋突出,消费品价格上涨已集中反映到粮、油、肉、

菜等农产品方面。近年来,我国通胀由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其相当大一部分又是向农副产品转移的,以粮食为首的农产品货缺价扬使人们多少认识到农业发展滞后的恶果。一价(粮价)带百价的高物价实际上就是对过去口头重视农业,行动轻视农业的惩罚。

提到粮食问题,有不少论说认为我国多年一直保持较好收成,不存在短缺状况,这是只看表象的偏颇。事实并非如此,我国粮食生产和供求潜在的问题历来就十分严峻:其一,90年代五年来,全国粮食总产都徘徊在4.5亿吨与4.4亿吨之间,若按被允许的2%统计误差打折扣,每年粮产实际还约少900万吨左右,另外,粮食损耗的增加又使粮食绝对数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由于储藏、运输、加工、制酒、作饲料等等的损耗就高达1.4亿吨左右,相当总产的1/3。其二,近年我国南方诸省粮食生产停滞甚至下滑,以往的“南粮北调”格局已被“北粮南运”所代替,全国的余粮省已由50年代的21个减至目前的8个。不少南方省份,特别是东南沿海及西南地区的一些省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缺粮户”。如广东、福建每年就各需调进50亿公斤粮食。1993年四川省减产13.9亿公斤,连同本来就缺粮的云南、贵州、广西,使西南又成了粮食的较大调进区域,而我国目前每年粮食除2/3的常量由农民生产,生活自我消费外,可上市的商品粮只有1亿多吨左右,粮食供求趋紧是不言而喻的。其三,我国人口每年约以

1500 万人的速度递增,并且每年又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农转非”,粮食需求有增无减。另外我国现在每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约有 3000 万,由此每年也至少增加商品粮消费 1500 亿公斤。其四,我国人均有粮偏低,用粮难免捉襟见肘。如 1992 年我国粮食总产达 4.4 亿吨,似乎远超 1984 年的总产,但按人口增加后计算,人均有粮只达 377.5 公斤,比 1984 年还少 14.5 公斤。我国现在人均有粮比起美国人均有粮的 1500 多公斤相去甚远,人均量仅是其人均量的 1/4,如此而比,我们的粮食就不能妄言丰余了。综上所述,我国农业基础尚为薄弱,基础的基础——粮食供求仍是吃紧。这个关系国计民生、四化大业的“瓶颈”问题急待我们抓紧解决。然而现实的“二律背反”,却使我们看到不愿看到的事实——

二

众所周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我国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重要性已被口号、文件、会议说得天衣无缝了,但真正做起来,往往不是扭曲就躲闪。我国农业是个忍辱负重的母体产业,解放以来为支持哺育工业的发展,农业为之积累大量的资金。仅统计 1952 年至 1989 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就从农业取走 10000 多亿元,而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仅有 3000 亿元,农业资金积累的 2/3,达 7000 亿元之多被转移了。本来在解放以后一个时期,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哺育性”资金积累是无可非议的,但时隔 20—30 年之后,工业仍未“反哺”农业,并时有以牺牲农业发展、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工业的暂时快速发展,就显得无理而短视的扭曲了。我们不少地方,不少官员抓农业多停留在“口号农业”、“文件农业”、“会议农业”,自觉或不自觉挤压农业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当农业需要拿钱投入时,就躲闪回避,口惠而实不至。从以下我国工农投资比和农业投入逐年下降的数据看,农业长期处于被取

多予少的窘境,重工轻农即成事实。其一,国家投资持续有重工轻农的偏向。有统计资料为证:“一五”期工农业的投资比为 6:1;“二五”期为 5.3:1;“调整”期为 2.8:1;“三五”期为 5.2:1;“四五”期为 6.7:1;“五五”期为 5:1;“六五”期为 8.9:1;“七五”期为 15.7:1;“八五”期数字虽未披露,但料其投资比不会低于“七五”期。由此可见,除“调整”期外,其他各期的工农投资比都趋高。按国际经验测定,人均国民收入 300 至 1000 美元阶段的工农投资比应为 3.8:1;我国工农投资比趋大化不能不说明重工轻农和工农失调的偏向。其二,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五五”期后逐年下降。“一五”期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下称投)41.83 亿元,占全国基建总投资(下称占)7.19%;“二五”期投 135.71 亿元,占 11.3%;“三五”期投 104.27 亿元,占 10.7%;“四五”期投 173.08 亿元,占 9.8%;“五五”期投 246.08 亿元,占 10.5%;“六五”期投 171.81 亿元,占 5%;“七五”期投 245.5 亿元,占 3.3%。到了 1993 年只占 2%;1994 年前三季度仅占 1.9%。“五五”期后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下降到前两年的最低点,确令人有难于理解的忧虑。其三,国家财政支农投入逐年下降且往往不按时到位,地方财政对农业投资也得不到保证。如 1994 年国家财政预算中有 523 亿元用于农业投入,但直至当年 9 月份到位的不足全年预算的 50%。另外,不少地方财政的农业投入难以为继,逐年下滑。在我国财政体系中,最困难的是县级财政。全国有 2420 个县,其中 1300 个为财政补贴县,占 53%。县级财政状况不佳,往往就以种种借口扣减农业投入资金,使本来就少的农业投资得不到保证。其四,农业信贷投入波动大,常呈“多了多了少了少,少了少了多了多”的扭秧歌式状态。本来从支农责任感出发,农行、信用社是愿意转轨不转向,增加农业信贷投入。但由于外在制约因素太多,使农业信贷投入欲增难能,加减不定。一是国家宏观调控对农行、信用社没有实行区别对待的特殊

政策，资金规模控制“一刀切”，使农业贷款总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贷款总规模的增长速度。二是国家对农行增加的农业信贷投入往往只批规模，不给资金或虽批资金，但却迟迟不到位。另外，对农行的准备金率、备付金率、再贷款利率没有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农行的支农资金组织难，使用又不比其他专业银行多。三是对农行、信用社投资周期长、利率低、风险大、收益少的农业信贷经营课税偏高，削弱了农行、信用社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积极性和资金实力。四是农村资金分流严重，农行、信用社支农的资金来源枯竭。特别近年来其他专业银行机构下伸农村吸存；邮政部门在乡镇竞争揽储；农村基金会狂组资金投向他业；加之都市城镇的集资、募股、卖户口、招农工，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流向工商业，所留给农行、信用社的资金来源名为多乎哉实为不多也。五是农业信贷投入多是农行、信用社唱“独角戏”（农业发展银行刚从农行分离），其他专业银行则很少“入戏”，使增加农业信贷投入渠道单一。六是农业信贷投入被转移用途比比皆是。不少信贷单位受利益驱动，得了农贷不用于农业，随意挪用到工商业、运输业甚至婚丧消费，农业信贷投入名存实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使农行、信用社的农业信贷投入常因形势左右或制约因素困扰而时多时少。其五，农村集体经济的农业投入严重下滑。不少地方农村由于

统分经营体制不完善，使集体经济陷入有集体乏经济的困境。有的集体甚至只是剩个桌（办公桌），有个戳（公章）的空壳，因此对农业投入不是微乎其微就是无能为力。其六，农户的农业投入亦少。由于种养比较利益低，农户经济脆弱，农民负担偏重，农家土地规模过小等等原因，农民缺乏强大的农业投入实力和自觉的农业投入行为，农民的农业投入偏少也就见怪不怪。综上所述，国家、集体、农户对农业投入趋少。农业因此基本建设迟缓，水利库渠失修，生产条件恶化，潜在危机加大。如50年代至70年代所兴建的农业水利库渠，相当一部分因长期失修已不能正常发挥效能。全国的8.4万座水库有1/3左右已老化为病险库，水库容量从80年代初的4500亿立方米下降到目前的约2000亿立方米，以致农业遭灾情况日趋严重。全国每年受灾和成灾面积已分别从80年代初期的3500万公顷和1600万公顷增加到1992年的5133.3万公顷和2589.5万公顷。水土流失面积也从80年代初期1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993年的170万平方公里。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也因投入少而陷入钱紧、网破、人散的困境，以致农民缺少科教而低效用肥、用水和低效植保、养护。总之，农业投入连年下滑，造成令人忧虑的恶性循环。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
责任编辑：谭湛明

税 收 支 出 与 宏 观 调 控

□胡笑辉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必须充分重视 税收支出的宏观调控功能

我们知道,税收作为国家依据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所进行的强制、无偿分配。首先具有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功能即聚财功能。另外,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同时,税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国家与社会成员以及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在国民收入占有关系上的变化,即税收天然具有调节经济生活的能力。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的这种调节经济功能不断得以强化,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日益得以加强和重视。税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宏观调控作用要依靠多种调节工具来实现,税种、税目、税率、税收支出等是主要调节工具,就这四种主要调节工具来看,税种、税目、税率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而税收支出则相对灵活些,它可以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国家政策的需要进行灵活的调整,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及宏观经济结构的优化创造条件。因此,税收支出这种灵活的调节工具一直为西方国家所重视,成为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就宏观调控中的税收手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益重视税收的调节功能,其中税收支出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税收减免作为我国一种普遍运用的税收支出形式,在发挥税收对经济生活的灵活调节。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方面均有一定的作用,缓解了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同相对稳定的税收制度之间的矛盾。但同时又必须看到,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税收减免往往是作为一种微观调节工具来加以运用的,偏重于对微观经济即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的调节,而且这种调节往往带有较多的照顾性色彩和非规范性色彩,表现为困难性减免、照顾性减免、越权减免、任意减免,不重视运用税收支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即忽视了税收支出在保持经济稳定、优化经济结构中的应有作用。正由于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过于重视税收支出的微观调节功能而忽视了其宏观调控功能,所以导致了税收调节的整体功能低下,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向调节,阻碍了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使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我们在运用税收支出时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改变过去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的作法,充分重视税收支出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应有作用,以更有效的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避免对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干扰,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税收支出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简称为对经济总量的调控。另一方面,则是保持经济结构的合理与优化,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各地区协调发展,并形成合理

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资源高效配置创造条件,这简称为对经济结构的调控,其中又以对产业结构、地区发展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等为主要内容。而税收支出在实施宏观调控这两大方面的内容时均可发挥一定的作用。下面就税收支出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和经济结构调控中的作用分别加以阐述。

(一) 税收支出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税收在调节经济总量、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主要有两大作用机制,即“内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稳定器”。就税收的“内在稳定器”作用而言,它主要是借助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的。在税收制度一定的前提下,它不需要额外的调节即可由累进税率达到对经济总量的自发调节。但正由于“内在稳定器”作用是通过累进税率来实现的,即税率的累进程度越高,税收的“内在稳定器”作用越强,税收支出会改变税制的累进程度,使所得税制的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相背离,即使得实际税率小于名义税率,所以税收支出对“内在稳定器”作用有一定的削弱。正确理解这一点,可为税收实践中削减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提供理论依据,即税收支出必须适度地运用。

从税收的“相机抉择稳定器”作用来看,它建立在对经济运行态势进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在经济增长过快,将要出现过热状态时,实行增税政策,以抑制企业和个人收入增加过快的势头,达到抑制总需求的目的,避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过大差距。在经济增长过慢,将要出现萧条状况时,则实行减税政策,以刺激总需求,保持经济总量的相对平衡。由于通过运用灵活多样的税收支出,可以适时调节经济总量,缩短税收在“相机抉择稳定器”调节作用方面的“时滞”,因而一般是通过增加税收支出来实现对经济萧条的抑制作用,在抑制经济过热方面往往也是通过削减税收支出来达到目的。

(二) 税收支出在经济结构调控中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对国民经济结

构的调节主要包括对产业结构的调节、对地区发展结构的调节以及对个人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相对于税收支出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而言,税收支出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较为突出。

首先,税收支出在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和优化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国家通过对某些需要优先发展以及那些相对滞后的产业给予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使投资于这些产业的资金得到较高的税后利润率,就可刺激资源向这些产业的流动,达到调整和优化一国产业结构的目的。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and 优化的税收支出形式中,既有普遍采用的减免税,又有加速折旧、亏损结转、再投资退税等多种其他形式,其中加速折旧对加快技术改造、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重要作用,而亏损结转则对扶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其次,税收支出在调节地区发展结构方面也有着较为积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一国地区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此,应以地区平衡发展作为税收政策的着眼点。这就要求在实施税收调节时一方面要强调为各地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即应保持全国税制的相对统一性,但同时又应在强调公平税负的前提下,充分重视税收支出在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方面的作用,即对贫困地区给予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最后,税收支出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就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而言,主要是在收入形成环节、收入使用环节和财产占有与继承环节分别设置相应的税种加以层层调节。在收入形成环节的调节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在收入使用环节的调节税种主要是消费税,而在财产占有与继承环节的调节税种主要是各种财产税和继承与赠与税,在这些税种中相应运用适当的税收支出可以起到照顾低收入者基本生活需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如在个人所得税中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生

活费用水平规定适当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就是一种较好的照顾低收入者基本生活需要的税收优惠形式。

三、税收支出与其他宏观调控工具的配合

如前所述,税收支出在对宏观经济的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方面均可发挥一定的作用,有时这种作用还很明显。但是,我们在重视税收支出宏观调控功能的同时,必须深刻体会其内在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税收支出应与其他宏观调控工具相互配合,以有效地发挥宏观调控体系的整体功能,避免对市场机制运行的干扰。具体地,税收支出与其他宏观调控工具的配合可以从宏观调控两大方面的内容来加以把握。

从对经济总量的调节来看,税收支出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虽然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如果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进行考察,则货币政策远比税收支出具有更大的作用。一般说来,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可以有效地控制总供给和总需求规模。因此,在运用税收支出调节经济总量时必须注意税收支出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在我国现阶段,选择“双紧”的税收支出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种较好的配合模式。而从财政调控系统内部来看,税收支出在调控经济总量时,还必须与其他税收调节工具以及财政支出政策、公债政策等相互协调,以形成宏观调控的合力。

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来看,税收支出对产业结构、地区发展结构的调节作用较为明显,而对个人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作用则相对小一些。但是,无论是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协调地区发展结构,还是在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税收支出都必须与其他调控工具相互配合,协同运作,才能既避免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又发挥税收支出手段的特殊调节作用。

首先,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进行考察,税收支出政策重在调节新增投资的税后收益率,诱导投资流向与规模,因而它还需要与银行信贷政策、企业发展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相互配

合。银行信贷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社会新增投资的规模与方向。因而在调节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最为明显。企业发展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社会投资存量的流动,它在调节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财政调控系统内部来看,税收支出在调节产业结构时还必须与其他税收调节工具以及财政支出政策等相互配合。

其次,在协调地区发展结构方面,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考察,税收支出政策必须与投资政策以及资源产品、农副产品等的价格政策相配合,通过对落后地区以及少数需要优先发展的地区(如经济特区)给予优惠的投资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些地区优先发展,而对落后地区的资源产品、农副产品按其价值定价,也可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从财政调控系统内部来看,税收支出在协调地区发展结构时需要与其他税收调节工具以及财政支出政策、财政体制等协调,如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就可有效增加落后地区的财政实力,促进其社会、经济的发展。

最后,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考察,税收支出主要从减轻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的角度来适当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它有必要与从根本上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相配合。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从源头上决定了社会成员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多少,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首先要依赖初次分配形成,其次才是再分配的调节问题。为了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从财政调控系统内部来看,税收支出与其他税收调节工具以及财政补贴政策、社会保障支出政策等的相互配合显得更为重要。而税收支出在这方面的作用毕竟有限,相对来说,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其他税收调节工具如累进税率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最为明显。此外,对低收入者提供的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等对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也有较大的作用。

四、我国税收支出的现实考察与优化

经过1994年的全面税制改革,我国已

初步形成了适应发展市场经济要求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的复合税制,在税收支出方面,我国也初步建立了遵循国际惯例,体现公平竞争要求、简化规范的税收支出制度,但是,我国现行税收支出制度无论是在具体形式上还是在体现产业政策和协调地区发展结构以及在管理上都存在着某些不足,影响了税收支出宏观调控功能的有效发挥。

首先,在税收支出的具体形式上,我国过于偏重税收减免,而对其他形式都重视不够,以至于难以充分发挥多种税收优惠形式的特殊调节作用,不能取得税收优惠的整体优势。一般说来,税收优惠有税收减免、亏损结转、加速折旧、延期纳税、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出口退税等多种形式。不同的优惠形式在调节效果上各有侧重,如加速折旧能有效地鼓励固定资产的更新,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亏损结转则可减少投资风险,有效扶持幼稚产业的发展。同时,不同的税收优惠形式也有各自的局限性,如税收减免一方面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当运用于涉外所得税领域时还依赖于一国对外税收协定中是否有税收饶让条款。因此,在具体运用税收优惠时,必须注意多种税收优惠形式的搭配运用,以取得税收优惠的整体优势,而过于偏重税收减免这一优惠形式,不仅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很大,而且导致某些调节功能缺位。

其次,从税收支出的调控功能来看,仍然难以适应发展市场经济所提出的转换税支出调控功能的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转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税收支出微观调节功能为宏观调控功能。为此,税收支出应着重于调节经济总量和调节经济结构,为经济稳定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创造条件。经过1994年税制改革,为了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避免对市场机制的干扰,我国大量削减了流转税优惠政策,税收优惠主要依靠所得税制来实施,这无疑是适应发展市场经济要求的,为税收支出宏观调控功能的有效发挥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从所得税制来看,不可否认,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在

宏观调控功能上仍有欠缺,特别是在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以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就内资企业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而言,税法仅原则规定了两项税收优惠措施,其初衷在于大量削减以往存在的过多过滥的税收减免。不过,在税收优惠主要依赖所得税制实现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脱离了实际,为此,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实践中基本上还是沿用以前的规定。这导致在体现产业政策方面只有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税率以及对某些第三产业企业的暂时免征规定。在体现地区协调发展战略方面只有针对老、少、边、穷地区新办企业的定期减免规定。其他优惠政策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微观调节型规定。因而从总体上看,与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税收支出调节功能差距较大。就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规定而言,它采用的是多层次地区主导型的优惠政策,这种梯度推进的税收优惠体系已不适应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同时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也有较大的副作用。总的说来,我国仍需进一步完善现行所得税优惠制度,税收优惠应切实体现产业政策。同时,在地区优惠方面只宜对贫困落后地区和经济特区提供普通和税收优惠。

最后,从税收支出的管理制度来看,我国也有待改进。从1994年起,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简称分税制),分税制的实施将为改变以往大量存在越权减免、任意减免创造条件。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分税制仍不完善,仍在维持既有利益格局,与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提高税收优惠的运用效果,加强税收优惠管理仍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税收支出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税收支出预算,对每年因提供税收优惠而直接减少的税收收入进行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考核税收优惠的实际效果,使税收优惠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财金系
责任编辑:谭湛明

广告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张纪康

广告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广告宣传促销活动的经济内容、经济性质、经济特征、经济影响、经济作用、经济效果、经济损益等广告综合经济规律的专门学科。

广告经济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分支,形成于本世纪70年代中期。标志是广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内容体系基本确立。事实上,广告行为的经济学讨论早在16世纪经济学的发展之初就已存在,但当时的研究主要是作为价格、产量、成本、市场这些对象的附带品而被“顺便”加以简单讨论的,且往往处在一种无意识、不自觉的被探讨状态之中,所以在20世纪之前,从来就未作为一个专题出现在学术文献之中。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学向系统化方向发展、完善,当然也因为广告经济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频率,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经济学领域对广告问题研究的篇幅变得越来越大。当时,主要的研究专题包括四个方面:(1)广告对商品价格影响,前提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竞争格局下广告对商品价格的作用;(2)广告对商品产量的影响,主要是从广告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入手,研究广告的促销作用与限制条件;(3)消费者行为方式在广告下的变化,特别是广告宣传促销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4)广告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其假定前提也是在没有广告政府管制下的充分竞争市场条件下。例如,英国经济学马歇尔在20世纪初完成其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和内容时就曾对广告进行过经济分析。

自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后期,广

告的经济性质、经济影响在质和量上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就是广告成了一些经济学杂志论文的专题研究对象,对广告的研究已触及到了相对较广的领域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经济学界定的研究范围,这是广告经济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准备时期,事实上广告经济学内容框架三大部分之一的“微观”部分或称厂商部分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广告经济学的这一层次的内容正是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中直接发展而来的。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较为严密和有影响的主要有:(1)N·H·博登(Borden)1942年对广告促销效应的研究,它代表了经济学界及社会当时对广告作用的支配性论点,即广告宣传所提供的商品、市场信息有助于消费者的正确消费,有助于促进厂商产品的销售。(2)N·卡尔多(Kaldor)1948年首次对广告的经济作用的传统观点提出了疑义,他认为,阿尔弗烈德·马歇尔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广告,特别是劝诱性广告只不过是把人们对某种产品的需求从一个牌号转向了另一个牌号而已”的观点(即广告的品牌需求转移作用)是正确的,并通过建立模型的方法,在广告尚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充分发展的时期就大胆地提出了广告数量过度的论点,为广告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分析早早地定下了论题。(3)多尔夫曼(R. Dorfman)、斯坦纳(P. O. Steiner)1952年12月从微观的广告主厂商层次,运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对张伯伦在其名著《垄断竞争理论》中分析模型予数量化的表述,并吸收了

布坎南 1942 年对张伯伦模型扩展后得出的有益结论而在广告经济学领域首次建立了著名的广告主厂商广告预算投资模型(又称多尔夫曼——斯坦纳均衡条件),这一模型的意义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即在广告经济学领域首次严格地引入了现代数理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方法。

(4)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之父 J·S·贝恩(Bain) 1956 年在提出其著名的进入壁垒理论时并没忘记广告在阻止生产要素跨行业市场流动上所充当的不光彩角色(当然在广告经济学正式立户之后,对广告的进入壁垒作用的“权威”观点同样受到了挑战),贝恩的这一开创性研究不仅为经济学,而且为产业组织理论和广告经济学的研究设定了新的课题,对广告经济学来说,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广告经济学的第二部分框架——广告的市场层次影响。(5) 韦伯(Weber)、弗克纳(Feclhner) 1958 年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入了广告的经济分析之中,就实际的广告投资强度和消费者的可感知强度间的关系提出了所谓广告的心理物理定律,为广告经济学中有关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理论研究引入了新的分析方法。尽管这一方法直到现在尚未在广告经济学领域获得充分的应用,但却为广告经济学中有关消费者与广告间关系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先例。实际上,有关这一方面的系统研究,只是在 1980 年才由利本斯坦完成的消费者反应理论和相应的消费者行为理论。

广告经济学前期发展中的第二个重要时间是本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它也是实现广告经济学完整的三结构层次体系的最重要时期,除了微观厂商层次在 50 年代完成了其基本内容结构并在 60—70 年代得到进一步的扩充之外,广告经济学的“市场”层次和“福利分析”层次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

1. 市场层次的发展

这个市场是指广告行业市场的研究发展,它包括同产品广告主厂商构成的市场;广告商所处的市场,即所谓狭义的广告行业市场;广告媒介主所在的媒介市场。

应当承认,广告经济学这一层次内容的发展大部分得益于产业组织理论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迅猛发展。这部分的研究以中观的产业市场层次为核心,以市场的竞争格局为突破口来研究广告行为对市场结构、市场竞争、市场垄断、厂商利润等的影响。

必须指出,广告经济学,当然也包括产业组织理论的这一核心研究内容的确立始于张伯伦对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两大分支学派——演绎派和经验学派研究的折衷或调和。张伯伦考察了发达国家不同产业间的理论联系并检验了每种产业的结构、产出、价格、集中度、利润、广告等后得出的结论,为以后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梅森和贝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从而产生了产业组织理论学科中著名的“结构——行为——绩效”关系的可检验模式这一理论和方法的核心。

可以这么说,新古典学派以及稍后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所谓的“内部市场条件”上,它包括实际竞争的程度和产业市场内部厂商市场势力的大小,它分结构和行为两大类:市场结构、进入壁垒、市场集中、需求弹性、时滞效应、产品差异、价格策略、成本差异、信息缺陷和市场各种串谋行为等,而贝恩的经典著作《产业组织》,在 1959 年奠定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使用的方法或上述市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顺序是从市场结构变量出发,通过手段(或市场中的各种厂商行为)达到经济的效果,显然,广告促销就包含在这手段的中间层次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广告经济学市场篇,有相当的部分正是遵循这一结构——行为层次的理论和方法讨论诸如集中度、进入壁垒、规模经济等对广告行为及厂商间的广告竞争所产生的影响,而另一部分则循着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以芝加哥大学的布朗森教授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分析方法,一些广告经济学家受新古典经济学经验学派的熏染,把厂商的广告行为作为分析的中心,研究的是广告对市场集中、进入壁垒、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厂商利润、产品促销的作用和影响。由

于这一学派起步较晚,再加上以谢勒为代表的,更强调市场行为重要作用的新结构主义学派对传统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改进,使广告经济学在市场研究的方法上仍以结构学派为主流。

既然这里论及的是广告经济学有关市场研究领域的进展,因此我们就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广告经济学在产业市场理论方面的主要发展点:(1)传统的经济观点认为,广告竞争强度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应当存在着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在60年代遭到统计上的否定挑战之后(如泰尔瑟)便在广告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曼·默勒则是此线性相关假说的忠诚卫士,直到1971年,随着道格拉斯·F·格里尔提出其著名的二次函数相关假说,才使广告导致集中和集中产生广告竞争有了一个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定论;(2)1967年,库曼诺和威尔森在广告经济学领域实质性地推动了贝恩早在50年代就提出的广告进入壁垒的理论。他们以逻辑推理、理性假定和细致的实证检验方法,从广告促销与广告主利润率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和发展了广告经济学中的广告进入壁垒理论,而韦斯、帕尔达及贝恩本人更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与准确性,从而不仅推动了广告经济学的发展,还促进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3)1976年兰宾就广告的阈限效应及广告收益的递减规律提出了他的理论模型,使原来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张伯伦模型中广告宣传将致销售收益不断递增的结论得到了修正,使其更符合市场的现实,而其模型更重大的意义主要在于客观、全面地提出了广告的规模经济非线性效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广告经济学的可应用基础及其在市场营销实务中的指导作用。(4)由于直接涉及到政策管制,特别是税收管理的标准确定和实践操作,因此对于广告主厂商,主要是广告主厂商的利润率高度的影响许多年来一直是个争论激烈的敏感课题,库曼诺和威尔森的研究对广告经济学界同样有着权威性的影响,而纳尔森则从信息经济学和需求弹性的角度在1974年提出了他不同于

库——威线性模型的非线性广告强度——利润率相关模型,在所有的这一专题研究中,其意义最主要的在于对广告费用和投资性质的认定上,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广告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及推论在实践中的财务管理和政策管制应用上仍是困难重重,以至成了广告经济学中悬而未决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难题。(5)对于广告的竞争性作用的讨论,实际上与传统的价格竞争理论一样长久,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其促进市场竞争的作用是为经济学家们所一致公认的,但随着垄断经济现象的出现,对广告的竞争性作用的认识出现了泾渭分明的分野,即竞争作用和垄断作用两种长期对立的观点,且一直未见分晓,直到60年代末信息经济学的被引入广告经济学,才使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了初步的结论。特别是为80年代广告经济学领域的寡头市场广告竞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

必须指出,广告经济学在这一时期的实质性进展除主要得益于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成果之外,以尼尔森为代表的,将60年代信息经济学动态流量分析方法在广告经济学中的引进和市场学领域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广告经济学广告产品理论中的成功应用也对广告经济学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只是相对说来没有如产业组织理论的“贡献”那样受到足够的重视罢了。

2. 福利分析层次的发展

对于广告行为的福利经济分析,实际上在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只是受当时社会共识的制约和广告业本身尚未发展到如今日的地步的缘故,因此对于广告促销的福利分析光有片言只语的肯定结论而无否定的声音。尽管马歇尔在本世纪初曾经提出了劝诱性广告这一敏感问题,但较为系统地用二分法来讨论广告行为福利性质的研究要首推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庇古。1920年底古第一次将广告区分为信息广告和竞争性广告两大类的成果,标志着广告“福利分析”这一框架层次的萌生。其后,经济学界对广告的信息性、劝导性、欺骗性的经济道德性质争

论不断;对广告的促进竞争和阻碍竞争的争论从本世纪 50 年代起可谓浪潮迭起,其中的代表如贝克曼;对广告主厂商利润收益公正性的论断持续到现在仍无定论,但所有的这些讨论基本上还是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与规范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

广告经济学的福利分析层次的大体形成时间是在本世纪 50 年代,且主流是对广告商业活动的频繁发难。最初,N·卡尔多重新提出广告过度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随后纷纷参与进来,他们从消费者的权益、效用、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与最佳配置的角度大量地探讨、研究着广告的福利经济性质,以及到了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连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哈耶克、格雷泽也被“拉”了进来。

对官方的广告管制活动进行系统的福利经济分析主要得益于产业组织理论和其后的管制经济学(**Economics of Regulation**)的发展。本世纪 70 年代,产业组织理论开始将研究的目标部分地转向了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这在美国表现得尤甚。当时,产业组织理论(在英国则被称之为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Economics**)研究涉及的公共政策包括私营化或国有化、公用事业等自然垄断的管制,财政补贴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广告管制活动等。

正是在相邻学科的推动下,广告经济学自 80 年代开始形成了对广告的系统福利分析的小小浪潮,其研究的方法除继续沿用传统的规范分析方法之外,专用于公共政策分析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和个别成本、社会成本的概念也被引入了广告经济学,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经济学家中,较有影响的有邓肯、里基、A·库特索依埃尼斯、诺曼、F·

M·费雪、夏皮罗。必须指出的是,80 年代对广告福利分析层次的强化还缘于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完善广告经济学学科体系动机的驱使,如里基等。

到了 80 年代,广告经济学的形成条件——内容、方法、体系应当说是基本发展成熟了。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他们的成果了,这当中尽管有一些经济学家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将其书名直接定名为广告经济学,而只是定以“广告的经济分析”、“广告营销的经济学”、“广告的经济性质”、“广告的经济作用”。但毕竟广告经济学还是最终名正言顺地出笼了。其中最著名的有先行一步的施马伦塞的《广告经济学》(1972 年)及后来的《广告与市场结构》(1980 年)、邓肯·里基的《广告经济学》(1981 年)、库特索依埃尼斯的《非价格决策》(1982 年)、阿尔、法里斯的《广告的争计》(1981 年)。

但广告经济学形成之后并未停止它的学术进展,经济学家们仍在对这一相对新且有趣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着大量的研究和检验,例如,关于寡占市场的广告竞争与串谋的模型;关于广告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行业进入壁垒,关于价格与广告的市场均衡;广告管制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问题、双占寡头最小、最大产品差异度、寡头均衡下的广告促销等等,因此时至 90 年代,广告经济学在庞大的经济学家家族中稳占一席之地并不断扩展其发展的态势,将如同广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与势头一样,势不可挡。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广东清远经济开发 试验区发展战略浅谈

□ 崔 河

一、试验区发展现状

广东省清远经济开发试验区成立于1991年9月,1992年11月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至1994年底止,已完成3.5平方公里的开发,铺设了8.9公里区内道路,架设了一万伏双回路输电线路,开通了通往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的程控电话和传真网络,铺设了日流量16万吨的淡水系统,建成了一批第三产业配套设施。批准注册企业199家,投资总额达32.8亿元,建成投产企业有81家。初步形成了有汽车制造、纺织、印染、制衣、建材、化工、电子、食品等行业在内的工业区域。1994年区内完成工业总产值6.4亿元,利润6300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当前发展的机遇

关于发展机遇分两个方面来论述。

(一)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背景是东西方关系的解冻,世界两极格局的崩溃,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与影响已超越了政治、区域的界限。整个市场正向多元化、国际化推进。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具相互依赖性。1994年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额高达3万亿美元,中国超过了一千亿美元。世界经济贸易发展趋势的第二个特征是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航天工程标志的第四次新技术革命不断地冲击着和改变着原有的产业结构,“朝阳工业”不断涌现。先进发

达国家为有效地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加强国际竞争,纷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那些技术不平相对较低的“夕阳产业”转移到经济与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去,从而腾出资金、人才去发展高技术“朝阳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实现自己的产业发展也积极地接受发达国家、地区转移出来的较高层次的产业。发展趋势的第三个特征是世界区域性经济的新崛起。例如,北美经济贸易区、亚洲经济贸易区的形成。尤其是太平洋地区已成为近20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已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65%以上。

(二)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一是表现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拓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完成,各项改革措施不断得到落实,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逐步扩大,开放的层次转向深入,引进利用外资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趋势的第二个特征是我国经济增长连续多年居于世界前列,国际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在先行发展的几个沿海地区,已实现了脱贫并正向小康和现代化方向迈进。在深圳、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已出现向内地地区的产业性结构转移。此外,“九七”香港的回归,台湾向大陆地区投资的增加,我国关贸缔约国地位的日近恢复,无疑给清远经济开发试验区和同类的地区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

三、面临的挑战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机遇和挑战常

常是伴随着的。试验区在过去几年,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便面对急剧变化的经济浪潮,面对瞬息变化的市场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挑战仍将是巨大而又严峻的。严峻的挑战,一是表现在观念上,新形势、新发展需要观念更新,传统的唯书、唯上、甘当配角的发展观,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更多情况下,已成为发展的阻力。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具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有敏锐的市场经济触觉、有坚毅不拔的进取精神、有持之以恒的质量效益观念。在制定发展规划上,要求敢于思前人之不敢思,做前人之未能做。第二个挑战是发展的挑战,发展是人类优化生存空间的需要,在当今世界经济大潮中,在有限的资源环境里,谁先发展起来,谁就占有主动,就能在经济竞争格局中占有优势,谁发展慢了,或没有胆量去发展,谁就难免被动挨打。第三个挑战是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以及资金、人才、科学技术的挑战。试验区就目前产业结构来看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规模性产业比例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少;第三产业发民缓慢,农副产品深加工、资源深加工呈滞后状态。此外,作为经济发展“血液”的资金严重短缺,好些项目出现较大的资金缺口,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缺乏。在现有技术管理人员中,存在着知识结构不全和知识老化的现象。在理顺机构、企业管理水平、产品质量效益等方面,与先进发达地区相比,亦有着较大的差距。

四、试验区现有优势和发展战略

谈过制约因素,再谈谈现时具有的优势和发展战略。

(一) 较优越的地理位置,较良好的交通条件

清远经济开发试验区位于清远市区南端7公里,计划开发面积为19平方公里,现首期已开发面积为3.5平方公里,全部实现了“五通一平”。试验区东傍107国道,西接北江河道,南以北江支流大燕海为界,北连横荷镇百嘉新区。区内交通便利,到广州走107国道上广花高速公路为58公里,到银盏火车站为8公里,到花都国际机场为

35公里,到北江中心码头8公里。根据市里新作出的规划,占地面积70平方公里的横荷镇亦将划入试验区管理范围。

(二) 较丰富的地区物产资源

清远具有较丰富的地区物产资源,耕地有85万亩,林地有上千万亩,矿产资源有煤、铁、钨、铅、锌、硫磺、高岭土、硅灰石等。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系统和发达的北江水系为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很有利的条件。

(三) 经济建设已初具规模

开发试验区建区三年多来,在基本设施建设、生活设施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区内办企业,已有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区内从管委会到属下各企业,几年来亦已培养出一批懂业务、懂技术的专业管理技术人员。

(四) 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国内到国外的广泛支持

清远经济开发试验区是全国首个以扶贫解困为主要目标的开发区,在试验区城乡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朱镕基、田纪云、廖汉生、王首道、宋平、谢非、杨汝岱等曾先后到试验区视察或听取汇报。几年来,前来投资的外商亦日渐增加。

(五) 发展战略的制定

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挑战,试验区如何权衡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科学地制定出本区的发展战略,根据上面所作的分析,我认为较合适的发展战略为工业赶超型内外结合发展战略,该战略突出工业兴区,突出内外结合,突出赶超型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将工业赶超型内外结合发展战略具体化,可进一步定义为:梯度服务、聚能辐射、走“大工业、大市场、大流通、大交通”道路,争取用15年的时间,将试验区建成拥有20万人口的南国明珠卫星城。

“梯度服务”是强调当今世界性产业结构梯度转移的主动承递和双向性服务,为置身国际大都市外围层及城市边缘层的角色作出定位,“聚能辐射”是突出自身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强调经济逐渐走向国际化。

在制定产业分战略上,要确立“高、大、优、外”四原则。“高”是指规划起点要高,产业结构层次要高,产品档次要高;“大”是指生产经营规模要大,技术成份要大,整体效益、联动效应要大,要在大的基础上来带动“小”;“优”是指有利于优化投资环境,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布局,优化产品质量;“外”是指生产经营方式要向外向化、国际化靠拢。在产业结构上,要抓住三个重点予以发展。一是发展大工业,支柱性工业,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当前要争取多办“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争取上几个规模性支柱工业项目。二是发展以专业市场为核心的第三产业。通过专业市场建设,带动起诸如服务、运输、流通、信息咨询、房地产、旅游等第三产业群。三是在试验区扩区后,要配合促进本地区规模农业、城廓型商品农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缩小贫富悬殊减轻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有利于促进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六) 关于战略实施的几个具体问题

(1) 资金对策

资金短缺是试验区今后发展不可避免的一大制约因素,在新一轮发展中,采取什么办法引进资金,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可选择的对策是:1. 以发展促引资。这是我省好几个先行发展区域的成功经验。要充分利用当前世界性产业转移提供的机会,积极完善投资环境“筑巢引凤”吸引外来资金。2. 主动出击,拓展招商引资渠道。主动出击,包括加大宣传、公关、招商力度,瞄准外商、外资财团,吸引他们前来投资。对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以及外国在华投资银行的贷款也应积极争取,对深圳、珠江三角洲等先进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要积极联系,主动承递。对到开发区办企业的县、区、部门,要加强扶持。要加强与银行的沟通联系,争取得到银行的更大支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尽快建立并完善区内金融机构,如建立和完善区信用社,以利于拓展各项金融业务,促进资金融通。

(2) 关于高起点规划

高起点规划是竞争性发展的需要。作为高起点规划,试验区一定要理顺当前管理体制;将横荷镇并入试验区有利于统一规划,集中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二是制订规划时,要注意规划的整体性、现实性和适度超前性,要在规划科学性的前提下,树立规划的权威性。三是制订规划时要注意平衡好各产业的发展,处理好速度和比例问题。

(3) 关于沿“边”开发

沿“边”开发,是试验区扩区后较合适的发展方式。沿“边”一是沿江,二是沿路,三沿城区。沿江着重发展资源转换型规模工业,并推动内河航运业的发展;沿路、沿城着重发展加工业、第三产业。对新区腹地地带,狮子湖附近可发展旅游业,在狮子湖一带的低矮丘陵区,可吸引外商兴建庄园式农庄或庄园住宅群。

(4) 重视科技、信息与人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进步,是试验区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牢牢树立“科技兴区、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要把科技进步贯穿于发展的各个环节。要重视信息这一重要“战略资源”,加强对经济、科技、市场等信息的收集、整理、筛选、利用,积极将它转化为生产力。要真正树立起“人才是企业之本”的观念,形成有利于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人才的机制。要善于借用“外脑”,加强与有关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联系,及时捕捉有价值信息,引进先进技术、项目与人才。

(5) 关于支柱产业与规模经济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个区域都需要有自己相对投资小、费用低、效益高,能发挥区域特长的优势产业,而这类产业最终将成为全区经济的支柱。作为支柱产业,要具有一定的规模,规模过少成不了气候,也不利于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利于企业走向国际化,不利于在经济大潮中冲浪。试验区发展规模支柱产业,目前可供选择的有建材、陶瓷、造纸、纺织、食品副食品加工,造纸项目尤可作为优先选择。

作者单位:清远金泰企业集团公司

责任编辑:石 成

论朱熹哲学体系诸范畴的理论价值

□梅焕庭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博大恢宏的哲学思想,包含着一个系统的范畴体系。只有了解朱熹如何阐发诸范畴的内涵,才能对朱熹哲学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本文仅从朱熹的范畴体系中,选择理、气、性、欲四个范畴作为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理”的本义,在中国哲学史上通常指条理、准则。如《说文》释“理”为“治玉也”。孟子则从伦理学的角度将“理”与“义”并联,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①但不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荀况、韩非讲“理”,既有条理的意思又有规律的含义。荀况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②韩非认为:“理者,成物之文也。”^③他们均赋予“理”以哲学范畴的意义。秦汉至南北朝,各家各派对“理”这一范畴的使用比较宽泛,但基本还是沿用战国时期的观点,仍没有把“理”作为他们体系的主要范畴。到了唐代,佛教华严宗才将“理”提升为其神秘主义哲学体系的主要范畴,认为“事”依赖于“理”而存在,“事”为“理”所派生,这就把“理”看成是精神的本体,但还不是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把“理”作为哲学体系最高范畴始于二程。他们说:“天下只有一个理。”^④这个“理”是他们“自家体贴出来”^⑤的唯一真实存在的本体,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没有“存亡加减”,^⑥从此,“理”代替“天”的地位,成为派生万物的绝对精神,为理学奠定了基础。

朱熹沿袭了二程的思想路线,并且对“理”的内涵作了根本性的充实和完备,使

“理”成为反映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的哲学范畴。第一,在朱熹看来,“太极只是一个理字。”^⑦“道即理之谓也。”^⑧从而把“理”、“太极”、“道”结合起来,使三者在其体系中既处在平等的地位,又各有侧重,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异而实同的范畴。第二,朱熹在界定“理”作为宇宙本体时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⑨所以,“理”是宇宙唯一的最高的永恒存在。除此之外,“理”在朱熹的体系里还包含另外两层意义:一是“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⑩即“理便是仁、义、礼、智。”^⑪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伦理;二是“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⑫此“理”显然是指事物运动所遵循的秩序,即规律性。由此可见,朱熹将分属不同范畴的规律和伦理糅合成为一个范畴。第三,这个本体的“理”,自身处在特殊的地位,“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⑬但它却保持“所以然”^⑭的权威,成为自然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第四,朱熹强调:“理之一字不可以有无论。”^⑮它先于天地、先于人和物而存在,“无所适而不在。”^⑯即使“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⑰所以,“理”是超乎时间与空间的,“上而无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⑱因之,它具有自然之理的特征。以上四点,不完全概括朱熹在充实、完备“理”的内涵方面所作的论证,但至少能窥见朱熹在深化“理”范畴方面比前人有新的创意:第一,“理”虽然被朱熹建构的唯心主义体系所包裹,但它绝不是毫

无具体内涵的抽象,而是一个多层次的、含义殊异、理论上论证缜密的一个范畴,它的出现,对于促进儒学哲理化的进程,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第二,“理”被伦理诠释后,便日益世俗化,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形成指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长幼等社会关系的准则,对协调各阶层的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有其积极的意义。第三,朱熹在论述“理”的特征时,特别强调“理”是天下万物的“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①⑨}这是对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第四,朱熹巧妙地把“理”、“太极”和“道”三个范畴融为一体,借以削除被周敦颐刻意安放在“太极”头上的“无极”,从而,使“理”能升华为宇宙的本体,这是朱熹在儒学哲理化过程中所作的一项最重要的理论建构,为儒家的伦理学哲学提供了本体论的哲学根据,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更趋完善。

二

“气”是中国哲学又一个古老而重要的范畴,在不同学术流派的思想家的体系里,其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老子》论证“道”化生万物时说:“冲气以为和”,认为只有冲其气才能达到中和的状态。孟子强调理性精神的作用,提出“养吾浩然之气。”^{②⑩}这种气是与义道相结合而产生的。荀子认为,人与自然物一样都是由“气”构成,所以,人的知觉意识乃至仁义道德因气而后有。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②⑪}到了汉代,王充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②⑫}的观点,形成了元气自然论。王充之后的刘禹锡、柳宗元均对元气自然论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至北宋,张载才把元气自然论推上元气本体论的阶段。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②⑬}这就肯定宇宙的本体是气,这是张载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

朱熹广泛综合前人的思想资料,把“气化论”纳入其哲学体系,使“气”范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一,对“气”的本质属性,朱熹作了详尽的论述。他说:“天地之间,一

气而已,”^{②⑭}“天地间无非气。”^{②⑮}揭示了“气”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东西。这种充满天地间的“气”,在宇宙空间“运转流通,略无停间”,^{②⑯}“流行不息。”^{②⑰}这都说明“气”的运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气”表现出升降、屈伸、聚散等不同的形态,因而,它能“凝结造作”,^{②⑱}便能生出许多万物。第二,“气”化生万物的过程,朱熹把它看成是阴阳二气相对立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他说:“天地只是一气,便自分阴阳,缘有阴阳两气相感化生万物。”^{②⑲}又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③⑩}所以,阴阳二气便成为“造化之本。”^{③⑪}第三,朱熹早年从“理本论”出发,主张理气无先后,他说:“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③⑫}又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③⑬}两者虽然不可分离,但有本末之分,所以理本气末的思想,经常困扰着朱熹。他说:“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③⑭}又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③⑮}强调“气”是“理”化生万物不可缺少的材料,这样理气关系便成了上下相贯的本末关系。到了晚年,朱熹逐步悟出理先气后的思想。据《朱子语类》卷一记载:“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这就是从宇宙本原上推,必定先有理,而后又是气。所以朱熹说:“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③⑯}所以,“理”便被安放在“气”之先的位置上,成为宇宙的本原。由是观之,“气”范畴伴随着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也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第一,这个“所以然”的“理”,它本身是寂然不动的,那末,它是怎样派生出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呢?朱熹以“气”为中介,把“理”——“物”逻辑地联系和沟通起来,使“理”借助“气”而派生万物,从而,克服其体系的矛盾。第二,由于纳入气化万物的学说,揭示出“气便自分阴阳。”^{③⑰}“无一物不有阴阳”^{③⑱}的矛盾思想。他说:“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③⑲}不论是自然界或社会毫不例外地分为阴阳两个对立面,“一中自有对。”^{④①}而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相对,“二又各自为对。”^{④②}即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对立的双方各自包含着对立,这就使他的哲学体系存在着自发

的辩证法因素。第三,朱熹不仅揭示阴阳二气之间的对立,而且也看到阴阳二气之间“相感”的一面。他说:“阴阳之理,有合处,有分处。”^{④2}这种对立统一的作用,正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事物发展的源泉。这一点,表现了朱熹力图说明万物产生的道理,从而使朱熹哲学体系中其自发的辩证法因素闪耀出难得的光辉。第四,朱熹探讨理气关系,提出两组相互矛盾的命题,即清醒的“理气无先后”说和谰妄的“理在气先”说,把“理”和“气”区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并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揭示本质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根据,触及到把人类认知的目标放到世界最高层次规律的探讨问题上,无疑是人类认识深化的反映。如果朱熹坚持他理气观中最有价值的“理未尝离乎气”^{④3}的思想,把握住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那么,朱熹就有可能逐步接近真理。遗憾的是,他在阐释理与气的关系时,“如人跨马相似”,^{④4}“有是理,方有这物事。”^{④5}从而道出了朱熹理气观的实质,至此,朱熹理气观中的那些清醒的成分终于被谰妄的部分所淹没了,这一深刻的理论思维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去总结。

三

“性”是为探讨人性理论问题而出现的一个范畴。在中国古典哲学史上,无论那一种人性理论,都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然而,就其总体来说,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性学说的内容也不断在丰富和发展。

孔子首先提出人性有同异变化的主张。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④6}把“性”和“习”区分开来。战国时期的告不害提出“生之谓性”、“食色之性”的主张,把饮食男女看成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生理方面的要求,所以,告不害得出“性无善无不善”^{④7}的结论。孟子不同意把人性理解为人类的生理本能,从而系统提出人性善理论的见解。他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④8}只要尽心、知性而后达到知天的境界。荀况认为人的本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嫉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④9}如果顺从人的自然属性,就“必出于争夺”。^{⑤0}所以,荀况指出:“人之性恶明矣”。^{⑤1}两汉至隋唐,从人性善恶的争辩转而去探

讨人性产生的根源。董仲舒认为:“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⑤2}据此,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其“性”与“情”的比重是各不相同的,于是,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唐代的韩愈基本上继承董仲舒的思想。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⑤3}同样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在这基础上,李翱指出:一个人要恢复、扩充生来就有的善良的本性,就要“灭情复性”。这种主张成为宋明理学所谓性与天道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张载力图用气化论去说明人性,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前者至善,后者是恶的来源。据此,张载反对追求“气质之性”,要求人人返回本然的善性,即“天地之性”,这就是,“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⑤4}二程受张载思想的影响,指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⑤5}这个主张与张载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说,他们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先验道德论的人性学说,为“理欲之辨”提供了理论依据。

朱熹在继承张载、二程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上述诸家学说,并用他的“理一分殊”说贯串起来,构成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朱熹以其渊博的知识,纵横议论,评判各家。朱熹认为,告不害的“生之谓性”主张,是“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⑤6}所以告不害的思想“最无状”,^{⑤7}即最不像样。对孟子的“性善论”,朱熹评论说:只“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⑤8}对孟子的“性恶论”,朱熹斥责它“只见得不好底”。^{⑤9}其过失就在于论气不论性。总之,对先秦时期“性善”和“性恶”之争,朱熹认为“只是说梦”,^{⑥0}没有什么新意。韩愈自言其“性三品”说是纠正荀孟之偏执,而在朱熹看来,“韩子所言,却是说得稍近……然惜其言之不尽。”^{⑥1}朱熹最为尊崇的是张载和二程,认为他们“发明千古圣贤之意”、“有功于圣门”。^{⑥2}据此,朱熹认为人性有两种:一是“天命之性”,是从世界本原“理”中来的,即人生就有仁义礼智至善的本性;二是“气质之性”,是从构成身体的“气”中来的。气有偏有驳,而且还受物欲所蔽,所以“气质之性”亦有善有不善。第二,“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既相杂又相依。他说:“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

无安顿处。”^③所以，“性”不能离开气而存在。反之，“气质之性”也赖于“天命之性”。他说：“如有天地之性，便有气质，若以天命之性为根于心，则气质之性，又安顿在何处。”^④这种相依关系，并不是辩证的统一，而是一种互相联系的杂拌关系。第三，朱熹还从所谓“心”的体用关系去论述上面的主张。他认为：“心有体用。”^⑤“心”之体是指“天命之性”，即“天理”；“心”之用是指“心”发动而产生出来的情绪，即情欲。前者称“性”，后者叫“情”，两者均统一于“心”，是“心”的体和用。这些论证，与其先行者的思想相比较，就更为精致。首先，朱熹虽然承继张载的思想，因袭张载的用语，但是，他的解释与张载截然不同。张载体系里的“天地之性”，是指世界本原的物质性的“气”的根本属性。而朱熹体系里的“天命之性”则专指绝对精神性的“理”。其次，朱熹不仅把人性问题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去论证：“性者，万物之原。”^⑥而且还强调通过“读书穷理”、^⑦“用功克治”，^⑧促使“气质之性”发生变化，以达到圣贤的境界。再次，朱熹用“心”的体用关系去论证“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并进一步引伸到情欲关系中去，从而，使他的人性学说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并成为完整的封建伦理道德观。

四

“欲”与“理”是一对道德伦理范畴，在历史上曾吸引一代又一代哲人的关注和论争。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⑨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君子是不去享受的，所以，“君子谋道不谋食”。^⑩主张以一种道德规范去限制人们的欲望。孟子极力推崇仁义和鄙薄利欲，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⑪荀况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认为“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⑫因此，要因势利导，使人们的欲望既有节制又有满足。到了两汉，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两种属性，人也有“贪”和“仁”两种品质。历史上圣人制“礼”的目的，就在于防止贪性的发生，所以董仲舒主张人不能不讲物欲，但最好还是节欲。王充考察了历史上的治乱和人民生活关系，提出“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⑬的主张，否定了董仲舒“节欲”而

“防乱”的观点。魏晋时期的王弼，主张人们去除争欲之心，对一切东西无所祈求。王弼这些思想后来被佛教进一步吹胀，把人民正当的物质需求也说成是罪恶的根源。佛教这些思想对宋明理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至北宋，二程把历史上这些争论归纳为“天理人欲之辨”，并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论模式。

朱熹继承传统儒家以理节欲的思想，同时也吸收诸家道德伦理思想中一些资料，形成自己特有的理欲观。第一，“欲”在朱熹体系里是指人维护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欲求：“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合当如此者”^⑭便是欲。这种“欲”，是发自于“情”，他说：“欲是从情发出来底。”^⑮因之，人的物质欲求来源于人的生理本能，与生俱有，天理所容。朱熹说“饮食，男女，固出于性。”^⑯又说：“饮食者，天理也。”^⑰所以，朱熹认为“此欲岂能无”。^⑱第二，“人欲”也称“物欲”，是指超越于“天理”所规定的范围，而去追求物质享受。如“或好饮酒，或好财货，或好声色，或好便宜如此之类，皆物欲也。”^⑲所以，“人欲者，此心这疾病。”^⑳即心有毛病，为“物欲所昏”。^㉑如果对人欲不加克制，任其恶性膨胀，其心变“私”、变“邪”，就会丧失道德理性，败坏心灵。第三，理与欲的关系。朱熹一方面认为理与欲是同出于心，它们相存相依，他说：“人欲中自有个天理。”^㉒所以，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是联结在一起的，于是，朱熹明确提出：“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㉓另一方面，从道德的角度去论述“理”与“欲”这对范畴时，朱熹则强调两者的对立。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㉔又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㉕因此，人们要“明天理，灭人欲。”^㉖恪守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第四，在朱熹体系里以“理”和“欲”相对应的范畴，就是“道心”和“人心”。朱熹说：“人心，便是饥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饥而思食后，思量当食与不当食；寒而思衣后，思量当着与不当着，这便是道心。”^㉗又说：“人心亦只是一个，知觉从饥食渴饮，便是人心。知觉从君臣父子处，便是道心。”^㉘这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而且存在着通向邪恶的可能，所以，必须由“道心”主宰“人心”。朱熹提出：“必使道心常为一

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⑳也就是用道德原则“道心”来节制“人心”的私欲，这显然是一种扬理抑欲的节欲观。这种节欲观的意义在于：第一，朱熹把“欲”和“人欲”区分开来，是很有针对性的。宋代贫富悬殊、贵贱迥别，广大饥民求温饱而不得，怎么能求“美味”呢？因此“欲”是为求生存，符合“天理”。而那些达官贵人，一味追求“美味”的“口腹之欲”，就必须严加克治，无疑表现了历史的人民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同样具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第二，朱熹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活动，其目的在于强调“道心”节制“人心”。如果“人心”节制“道心”，就会产生人欲横流，“入于邪恶”^㉑而不能自拔。为此朱熹提出“敬字工夫”，^㉒时刻省察自己的行为。朱熹说：“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滞。”^㉓此是朱熹理欲观的要旨，很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朱熹把中国哲学史上这几个范畴进行系统的、严密的理论论证，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构建了一个逻辑结构完整的理学体系，使儒学的理论思维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在此后六七百年时间里，对其后继者产生很大的影响，推动了逻辑思维的展开和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发展，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①④⑦《孟子·告子上》

②《荀子·解蔽》

③《韩非子·解老》

④《二程遗书》卷一八

⑤《二程外书》卷一二

⑥《二程遗书》卷二

⑦⑫⑬⑰⑲⑳㉑㉒㉓㉔㉕《朱子语类》卷一

⑧《周子全书》卷七

⑨⑩⑮《读大纪》《朱文公文集》

⑪⑯《朱子语类》卷三

⑭《朱子语类》卷四九

⑮《朱子全书》卷四九

⑯《朱子语类》卷一五

⑰《朱子四书或问》《大学或问》卷一

⑱《孟子·公孙丑上》

㉑《荀子·王制》

㉒《论衡·自然》

㉓《正蒙·乾称》

㉔㉕《朱子语类》卷九五

㉖《朱子语类》卷五二

㉗《朱子语类》卷一一六

㉘《朱子语类》卷六九

㉙《答黄道夫》《朱文公文集》

㉚《答赵致道》《朱文公文集》

㉛《朱子语类》卷五三

㉜㉝《朱子语类》卷六五

㉞㉟㊱㊲㊳《朱子语类》卷九四

㊴㊵㊶㊷㊸《朱子语类》卷一三

㊹《论语·阳货》

㊺《孟子·尽心上》

㊻㊼㊽《荀子·性恶》

㊾《春秋繁露·玉杯》

㊿《原性·韩昌黎集》

㊿《正蒙·诚明》

㊿《二程遗书》卷六

㊿《孟子集注》卷一一

㊿《朱子语类》卷五九

㊿㊿㊿㊿㊿㊿㊿㊿《朱子语类》卷四

㊿㊿《朱子语类》卷五

㊿《朱子语类辑略》卷一

㊿《答王子合》《朱文公文集》

㊿㊿《论语·里仁》

㊿《孟子·梁惠王上》

㊿《荀子·荣辱》

㊿《论衡·问孔》

㊿《孟子或问》卷一一

㊿《朱子语类》卷一二六

㊿《甲寅拟上封事》《朱文公文集》

㊿《孟子集注》卷五

㊿《朱子语类》卷二三

㊿㊿《朱子语类》卷一二

㊿㊿㊿《朱子语类》卷七八

㊿《中庸章句序》

㊿《宋史道学传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 生

中国百年一词的嬗变

——“百科全书”定义问题

□钟少华

探索中国“百科全书”定义问题，通过梳理它的来龙去脉，思考一下中国文化出了什么问题，笔者认为很有意义和价值。“百科全书”一词在百年前来到中国，并非“中体”所生，因而词意内涵应该干净，以中国人的聪明，只要认真去看看，给出一个“名正言顺”的定义，应该容易做到；此外，本研究是以文化学为本，一个专用词的嬗变过程，就是文化演进的过程，百年一词的嬗变过程，就是民族百年文化演进的一种轨迹。

（一）百科全书概念传入中国

中国和日本古代没有“百科全书”这个概念，而在20世纪的中国读书人，恐怕没有不知道有百科全书的了。但是“百科全书”是什么？对于百年间的中国人来说，是相当模糊的各种各样的印象。这个史实很难解释，但它存在，并且还纠缠着中国民族的文化素质，这里特作一些探讨。

西方百科全书源远流长。“百科全书”的词源出于古希腊文化，其词意观念也出于希腊。(Enkyklios Paideia)其词的原意，是指系统的知识，包容一切学术的内容，并非单指一本书。所以有人把古罗马普林尼(Pliny)著的《博物史》等书列为早期人类百科全书之一。把“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作为专门书名，首见于1541年，是林格尔保(J. F. Ringelberg)刊行于巴塞尔的书；1559年，德国作家斯卡里兹(P. Scalich)也写有一本。自此到18世纪中叶，欧洲出版相当数量的《百科全书》和《辞

典》，形式各异，名称各异，但内容和编排体例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东方最早鼓吹百科全书的人，是日本学者西周先生，他在1870年讲学中，将“Encyclopaedia”翻译为“百学连环”，他的讲义就称为《百学连环讲义》。由于他的鼓吹，给日本文化吹进了一股新风。在西周之前的1811年，日本学者就已经开始翻译西方的百科全书，定名《厚生新编》，但由于该书迟至1937年才出版，当时没有社会文化效应。而在西周讲学后3年的1873年，日文翻译的《百科全书》第一部就出版了，该书是由当时日本文部省编译局长箕作麟祥负责指导，组织洋学者55人，翻译英国占弗儿兄弟编著：《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第4版。到1880年全部出版，共20册92篇1600页，以文部省名义发行。此书在当时日本掀起了巨大的科学启蒙热情，几年间就再版多次。

当时中国对邻居日本的文化变化，相当不重视。一直要等到中日武化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走上改革之路，中国的改革家康有为，在19世纪末带头鼓吹维新变法，在他的众多的活动中，包括在1897年发表的《日本书目志》一书。他的意图，写在序言中：“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①康先生为学习人类新知识，为中国人捉摸出一条学习捷径，即把西方新知识成果当做可以挤出的

牛奶,而日本人老实实在地挤牛奶,那么中国人只要去喝现成的牛奶,就可以获得人类知识的新精华了。这里姑且不论他的设想在百年来成绩如何?也难怪他想得出来,因为总比“宁死不食周黍”要好得多了。他也总算看到“泰西诸学”是变革成功的关键。他的学生梁启超加以评论道:“今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吾师南海先生,早喟喟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为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②梁先生把翻译新书当做中国自强的第一策,这种见解很了不起,可惜空谷足音,百年来的中国人们把译书和文化交流安放在很次要的地位,反倒觉得民族自强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在这本《日本书目志》中,康先生除了把各种百科全书及辞书介绍20余种外,还把上面提到的日本翻译的《百科全书》92篇,按单行本分列名,每本上面写《百科全书XXXX》。如此强调“百科全书”概念,可惜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中国人注意到了,更可惜到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百科全书”条目中,还是硬说:“百科全书概念是在20世纪才传到中国的。”^③康先生有知,一定会很失望。

自19世纪末年到1911年,是中国新文化相对繁荣的时期,一方面是封建体制行将解体;一方面是世界人类各种知识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相化合、相纠缠,卷起汹涌大浪,形成全新的难以定名的知识群体。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管制中国知识分子千年的科举制,被干脆地取消了,代之以考试新知识的“时务策论”,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为取士程式。这样一来,成百万的知识分子不能再依赖旧的四书五经去应付考试,不能再依赖各种类书提供的旧知识作文字游戏了,只有到书商为他们提供的匆忙编成的百科全书及辞书中找答案。据作者了解,清朝末年出版以西方新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总数在3000—4000部以上,其中百科及辞书有40部左右。(以下总的简称为百科辞书)^④后来在30年代、80年代,中国又有两次出版工具书的高峰。

(二) 清末时期的见解

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监督严复,他醉心于新名词,但对百科全书,却要到1907年,才发表一篇文章介绍。他写道:“百科全书者,西文曰婴塞骨罗辟氏亚,正译当曰智环,或云学郭。盖以一部之书,包罗万有。举古今字内凡人伦思想之所及,为学术,为艺能,为天官,为地志,为各国传人,为宗教神闕。下至草木、禽兽、虫鱼、药物、器饰、玩好,皆于是书焉。元元本本,殚见浹闻。录而著之,以资考检。泱泱浩瀚,靡所不该。唐乎参乎,真人慧之渊海,而物理之圆枢哉。……西哲有云,自古迄今,凡人类之理想,如银铛然,无中断而特起者;又如网目然,必联系而交相资。此诚见事理之会通,可谓不刊之论也已。……学者家置一编,备考览,则不出户可以周知天下。上至国家政法兵商之大,下至一名一物之微,皆可以开卷了然,究终本始。夫岂特馈贫之粮,益智之囊已哉。惜乎,吾国之《图书集成》,徒为充栋之书,而不足媲其利用也。”^⑤

上海约翰书院教习,钦点译科进士颜惠庆,也在1907年写道:“百科全书者,……用集政界学界军界农工商界,暨乎实业美术图画歌舞,与凡游戏运动,一切科学之大成。俾从事于诸学者,知所率由,得所归宿。盖书为西国所仅见,尤为中国所罕闻,而实不可少焉者也。……方今中国自知贫弱,改官制、变科举、立学堂、实行新政,以期训致于富强,亦既率循泰西科学矣。……安见往日之退化,不将于此成为进化也哉。况中国地大物博,灵秀所钟。既得导师,造就多士。以科学为贤才根柢,以贤才为国家命脉。天荒既破,景运聿新,又何患富强隆盛,不英国若也。则夫是书即作中国进化券观亦可也。……百科全书深造诸科学之堂奥,而显有门径之可寻。故英首辅之言,谓求学者苟置是书,可减省无穷之劳悴,盖用少许精神,即能获多许粹美;而诸名流强思力索以得之者,亦可遽其隐贻。……是书与中国类书,类而不类,不类而类。不类者此为有用,彼为无用;类者同资参考也。”^⑥

《申报》在1907年刊有评论道:“英籍

中之有百科全书，犹中籍之有图书集成也。所以称为百科者，其目则分历史、文学、医学、卫生、哲理、心理、理财、政治、制造、工商学、宗教神学，及律例、人类、博言、地理、风俗、迷信、美术、传记、音乐、戏曲各门。其著者，皆欧美知名专门士。其字数则都四千万言，其项目则二万六千种。”⑦

郑绍谦在给1903年出版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写序，其中写道：“夫百科全书，东邦巨籍也，亚欧菁英于斯荟萃。今发见于中国，则东西文明之程度，虽未足以尽其蕴，固已有学皆臻，无科不备，可以研精，可以互证，向学之士，始无遗憾矣。”⑧

以上四位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他们都向中国推荐传统缺乏的百科全书，他们都有百科全书的正确概念，明白其分类及编辑特点，并且与中国传统类书作了区分；他们更大声疾呼在中国现代化开始时，引进百科全书的重要性。但是他们都没有给百科全书下清楚的定义，以与其他图书区分。更没有人登高一呼，建议为中华民族编一本百科全书。只有严复对“百科全书”的译名采用了“智环”一词，颇与37年前的日本西周用的译名相近。“智环”一词很美，但也象严老先生辛苦挖掘其他许多词一样，没有为民族所共识。

早在1897年，思想家梁启超对“名物书”作一种介绍，他写道：“名物书。西人有书一种，此土译者，命之为典。其最备者，至数十巨册，以二十六字母编次，古今万国名物皆具焉。故既通文法者，据此编以读一切书，罔有窒矣。中土历古未有是书，杨氏方言，意盖近之。今宜用其意，尽取天下之事物，悉行编定，以助学者翻检之用。……大抵官制地理两事，最为繁博，其余各门，殆易易耳。学者既通文法，明大义，苟得此书，则可以读尽群书，无不能解者。”⑨据这段文字看，有点象是讲辞典，但他写的是“字典”，所以不好引用。

到1911年，东吴大学教授黄摩西，一位天才的南社诗人，他编写出版一部《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书中对“词书”条目，给出如下义界：“排列词类一定次序，而解释

其意义用法之书籍，与字书略异。盖字书逐字解释，而此则已成词类也。有普通词书、专门词书及对译词书等。或称词典、词汇。我国向无此名，而类书性质与相近。而东西洋人，其名每与字典、字书相混。”⑩文中对字典、词典的区分很清楚，可惜书中没有对“百科全书”下定义。

总之，清末时期的中国学者对百科辞书的宣传，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也有清楚的认识，尤其强调百科辞书的时代效应。但是，他们都没有给这种新工具书下一个清楚的定义，他们既没有翻查西方或日本所用的现成定义，他们更没有在百忙中想到自己下定义。这似乎是小事，但本质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不求甚解”所造成的模糊。

（三）民国时期的见解

10—40年代的中华文化，已经基本与全人类现代文化相接轨，曾经出版一批工具书，其中也有李石曾等人在鼓吹百科全书的用处，也有中国人编写出版《日用百科全书》、《少年百科全书》、《中华百科辞典》等。如果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前一部百科其实是资料汇编，连“百科全书”本身都不在条目中，即名实不符，更没有给出定义。

“百科全书”的义界，在民国年间流行的辞书中，有一些介绍。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中，义界如下：“百科全书：Encyclopadia。搜罗重要学说，分门别类，用简明之文载之，便检查者，即辞典也。又一种取程度体裁相类之科学书若干种，汇刊为一编，或亦以百科全书名之，实即丛书也。”⑪该书中有“辞典”、“词典”的条目。这种义界，把百科全书等同辞典、等同丛书，在今天看是很不准确的。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中，义界如下：“百科全书：Encyclopadia。包罗各种知识，分门别目，依一定顺序排列，以便参考之书。亦称百科辞典。”⑫而对“辞典”则义界如下：“搜集各类学问中之单字片语及重要学说，逐一解释，以备检查者，曰辞典。”⑬这种对于百科全书的义界，今天看还是模糊。不过，总比《新辞典》中用的义界要强得多。《新辞典》中的义界如下：“百科全书：

包括一切部门的学术的丛书。”^⑭这种义界显然不妥，还有有名的《教育大辞书》中，“百科全书”是重要条目，但文中只是对百科全书史作了介绍，没有给出义界。^⑮反倒是，在《重编日用百科全书》的“例言”中，给出了初步条件：“日用百科全书，既为供给一般人士之普通读物，则其本身至少须具备‘完备’、‘简明’、‘实用’三条件。”^⑯可惜这三条件本身也是说不明白的。

总之，民国年间的新文化运动高潮，给中华民族带来现代化的新景象，管他“中体”也吧，“西体”也吧，中国人从中学习到空前多的知识。“拿来主义”是得到民众拥护的思想和行动，可惜也掺杂着消化不良症。本来中国知识分子最爱讲“名不正则言不顺”，但实践起来却是马马虎虎。小小一个“百科全书”名词的解释，就是证明。本来工具书的最强作用就是把清晰的概念传给民众，成为一种文化标准。如果给出错误的概念，将遗害无穷。前辈太不负责任了。当年就有人看到这一点，陆尔奎先生就说过：“尝言一国文化，当与其辞书相比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⑰中国作为传统文化大国，对待新名词概念如此麻木，孔夫子如在世，该说“不仁”了吧？

（四）当代的见解

8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经过种种风浪，又快步走向现代化的世界浪潮，大量百科辞书的出版就是鲜明标志，连工具书的工具书都出版了一批。可惜的是，在如此美好的文化大事业中，中国人的老毛病又犯了，本文不打算讨论辞书的粗制滥造问题，还是以“百科全书”这个概念来分析。说奇怪也不奇怪，近十几年来宣传上成为“中国第一”的一些巨大部头百科辞书，在概念上实在难说比30年代进步了多少。这里选几部在广告上最大张旗鼓宣传的辞书为例：

1985年，台湾三民书局编写出版的《大辞典》，其“百科全书”条目中的义界如下：“工具书的一种。包罗各种知识，依据字母或笔划顺序予以汇集成编；也有对一门或数门知识作全面性而深入的探讨，然后把这些知识以字画顺序予以编纂成书的。”^⑱把知

识顺序汇编，就叫“百科全书”？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今天的读者究竟被搞清楚了还是搞糊涂了？天知道。

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编译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十卷本出版，其“百科全书”义界如下：“用简明方式介绍各门类知识的工具书。百科全书往往还包含其他各类工具书（如人名录、词典、地图集等）的成分，并附有参考书目和索引。”^⑲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来讲，真是简而不明。该条目内有“东方的百科全书”小条目，由于该书前言中写得明白，中国方面负责撰写纯属中国的条目，并且该书不附录条目撰写人的姓名，所以不知道该条目从何而来？至于“东方的百科全书”小条目内，本人曾经写出7条意见以商榷，也可见概念不准确会带来多么大的麻烦。现录如下：

（1）“东方的百科全书”条目中，自然应该介绍中国百科全书史，但是没有介绍，而是偷梁换柱地用中国类书史代替了。读者难以理解这样作的意图是什么？

（2）“东方的百科全书”标题下，头一句是：“中国编撰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有2000年的历史。”第二句是：“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百科全书，类书基本上是……。”这两句话就互相矛盾，既然承认类书不同于百科全书，硬给类书加上“百科全书性质”就显得故意含糊其词。只要是百科全书，本质就相同，无论西方或东方。至于百科全书与类书如何区别？读者是无法从条目中得到答案的。想含糊地以类书代替百科全书，以便大讲光荣的两千年历史；又怕读者认为作者连类书与百科全书也分不清楚。这样的写法是不妥当的。

（3）第三句：“类书基本上有重要文献的选辑，分类编排，主要是供仕途举子采缀参考而编，……”这个类书义界颇不严密，回避了类书与百科全书的基本区别，连张涤华先生指出类书有“兼收众籍，不主一家。”^⑳这个特点也回避了。……

（4）条目中介绍类书时，又写出几句结语：“《玉海》，是一部重要的百科著作”；

“明初编成的《永乐大典》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佩文韵府》及其补篇《韵府拾遗》是中国文学百科全书”等等。明明前面总述为类书，这几部书也确是类书，撰写人又反倒称之为百科全书。这样会使概念更模糊。

(5) 条目中写道：“中国第一部现代百科词典是民国初年陆尔奎主编的《辞源》(1915)。”这句话也要商榷。本人不能肯定哪一部书足以称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百科词典”，但是在1903年以前，汪荣宝、叶瀚合编的《新尔雅》，肯定可以候选；还有1907年曾朴、徐念慈合编的《博物大词典》，也应该考虑；还有1911年黄摩西教授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等，肯定都是中国现代百科词典型的书籍，时间早于《辞源》。

(6) 条目中还有一句话：“《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包罗了中国的全部文化遗产。”这话未免太武断了，中国的全部文化遗产远不是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所能包涵的。

(7) 条目的第二段介绍日本百科全书，硬说日本《现代类型的百科全书》出于1926年以后。”此话差错太大，本人所见日本“现代类型的百科全书”第一部出现在1873年，到1920年以前，日本已经有现代类型百科辞书250部以上了。^②

以上一个条目中如此多的差错，说明现代著名两大家百科全书出版社在自己专长方面都会把握不住，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错误。

1990年，华夏出版社的《中国百科大辞典》出版，其“百科全书”条目义界如下：“以辞典形式编排的多种学科知识内容的大型工具书。其编排需搜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科专门术语、重要名词，分列条目，并加以详细的叙述和说明。”^③这种以“辞典形式”来义界百科全书，说明条目撰写人自己就没有费神去搞清楚概念。

1993年，宣传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现代综合性百科全书”一版出齐了，副总编金常政在书中为百科全书义界：“概要记述人类一切门类知识或某一门类全部知识的完备

的工具书。……中文‘百科全书’一词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百科全书的主要作用是供人们查检必要的知识和事实资料，其完备性在于它几乎包容了各种工具书的成分，囊括了各方面的知识。此外，百科全书还具有扩大读者知识视野和帮助人们系统求知的教育作用。……百科全书在结构上的主要特点，是以条目为主体，全面系统地介绍知识。”^④中国人经过100年的文化进步，在一个词的定义上，还是令人失望的。这部费了国家许多功力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上的定义，比前人下的定义，只有一点是新鲜的，即百科全书“几乎包容了各种工具书的成分”，隐含了百科全书是工具书之王的意思。但如果问都有什么“成分”？还是付之阙如。而且，本文前面已经证明，中文“百科全书”一词是在19世纪末就传入中国了。

那么，就没有一个中国人给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定义吗？不是，197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姜椿芳就写道：“百科全书则是用条目的形式，编成一篇一篇文章，把各种知识、事物、人物原原本本地加以叙述，特别是把最新知识作系统的全面的介绍。”^⑤以此作概念是合适的，清楚明白。首先说明条目是一篇篇文章，就排除了文摘和一堆资料；要“原原本本地加以叙述”，就是每篇文章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排除弄虚作假；还要“最新知识”，这是百科全书的生命力所在，排除旧知识。这三个特点，在前面所列的“义界”中，基本没有提到。不过，本人不明白，姜椿芳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任总编，由于他在1987年病逝，他的崇实思想在1993年的书中就被取消了，反过来以旧代新，以模糊代精确，以落后代先进，究竟有什么原因？

本人经过考虑，决定不再提出自己的百科全书义界，而是采用姜椿芳的义界，除了纪念姜老之外，他的义界对本人用在近代中日百科全书研究中已经够了。

总之，百年时光，一个民族对一个专用名词说过够多的定义，但总是不够准确，看来是非不能也，实似不为也。为什么似不为呢？如果去问那些历年下定义的人，恐怕问

题更复杂,更不清楚。笔者认为,关键在民族文化素质。写的人,马马虎虎去写;读的人,马马虎虎去读,还互相传抄,欣赏古代传抄秘本的方式,费百年的时光,实在有问题。

笔者曾经提出文化标准问题,百科全书本来就是提供文化新标准的功能,但我们居然把许多概念本身模糊化,百年不变,恐怕一些百科全书就会成为妨碍新文化发展的工具。但愿这是杞人忧天吧。

改变这一点并不难,因为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改一些概念的定义。讲究博大精深,本来就是我国民族所宣传的优点,以达到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要求。办法之一,笔者建议,将每年的新出现词语,汇编成一部《当年新词语词典》,一年一部,连续出版。几年就会有小成吧。

①见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序,无出版项,中华书局重印本第4册,P3050。又见《时务报》第45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

②见梁启超文:“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同见《时务报》45册,同①,P3047。

③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百科全书”条目撰写人金常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月一版,P6。

④参见拙文:“西方科技东流书刊目录(1607—1911)”,刊法国《欧华学报》第二辑,欧洲华人学会出版,1987年1月,P131—140。清末科技书约有1800种。

⑤见《大英百科全书评论》,无出版项,估计为商务印书馆印,1907年出版。严复文见P1—2。

⑥同⑤,P5—7。

⑦同⑤,P15。

⑧见《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序,范迪吉等

编,会文学社,1903年出版。

⑨见梁启超文:“论幼学”,载《饮冰室文集·丁酉集》,P17—18。

⑩见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申集,上海国学扶轮社,宣统三年(1911),P404。

⑪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10月一版,1935年5月二五版,午集,P108。

⑫见《辞海》,中华书局,1948年再版本,P935。

⑬同⑫,P1310。

⑭见筱铮等编:《新辞典》,裕民印刷厂,1947年1月一版,1947年10月再版,P92。

⑮见唐钺等编《教育大辞书》,商务印书馆,1934年5月一版,6月三版,P416。

⑯见《重编日用百科全书》例言,商务印书馆,1934年5月一版,6月三版。

⑰见吴则虞著:《中国工具书使用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一版,P27。

⑱见《大辞典》,台湾三民书局编,1985年8月一版,P3222。

⑲见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一版,P511。

⑳见张涤华著:《类书流别》(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9月,P4。

㉑参见拙文:“清末百科全书新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卷,1990年,P91—92。

㉒见《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一版,P393。

㉓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月一版,P6—7。条目撰写人金常政。

㉔见姜椿芳文:“为什么要出版中国百科全书?”载《百科知识》1979年1期,代发刊词,P1。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

责任编辑:冯生

世界民族大迁徙中的客家先民南渐新论

□ 谭元亨

客家人第一次(?)大迁徙,是在4世纪初至5世纪之间整整一个世纪,说第一次也许太武断了一点,因为一部中国史,几乎是一部北方蛮族南侵、入主中原的历史,原来中原的文明士族,无不“北望长安”而嗟叹。不过,作为最大规模的迁徙,自然是“五胡乱华”之际,所以史书才有最明确的记载,说“第一次”也不为过。

问题在于,这次民族的大迁徙,我国的学者们历来只注视东亚这片大陆,而不曾扩大自己的视野,放眼于整个欧亚大陆。

无独有偶,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有一个民族大迁徙的记载——而且就发生在西亚与欧洲。其发生时间,完全与东亚的民族大迁徙一样,无论是起始还是终结,都几乎一致,顶多只差几年时间。

无疑,影响历史大进程的,首要的毕竟是自然因素;而政治、经济诸因素过去虽被说成是第一位的,但细究起来,还是不得不退居其次。某些政治、经济因素本身就是自然因素所变易而来,只是在历史上作为显性因子而已。

4世纪整个世界的民族大迁徙亦是如此,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社会格局。而首要的肇因却是:欧亚大草原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迫使在那里世代生存的匈奴人南侵与西进。

于是,北匈奴人骑着战马,越过了欧亚大草原,从中亚经里海进入了顿河、第聂伯河流域,征服了阿兰人、东哥特人,紧接着,又横扫了黑海北边的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则横渡了多瑙河,摧毁了罗马军团,末了,竟

攻克了罗马古城,劫掠了三天三夜,……在这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古罗马文明寿终正寝,漫长、蒙昧的中世纪千年黑暗王国降临了。

与此同时,在东亚,八王之乱后,便是五胡乱华。同样是匈奴人——在这边是南匈奴人,也离开了故土,出兵攻陷洛阳,不数年,又尽取幽州、并州等地,紧接着,南取豫州,徙都邺城,控制了淮北,整个中原已落他手。而东胡族鲜卑,在匈奴衰落后,长驱直入,尽得青、冀、幽、并、荆、徐、司、豫诸州。氐羌族,则趁机占据关、陇,驱兵东进,复胜鲜卑,西取凉州,南临淮水……

那边,是北匈奴、阿兰人、哥特人……

这边,是南匈奴、鲜卑人、氐羌人……

那边,古罗马文明万劫不复。

这边,华夏文明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请注意:笔者在这里使用了“严峻考验”的字眼!

五胡乱华,东亚民族大迁徙,便是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大规模南移——而这次大迁徙的结局,却与欧洲古罗马文明覆灭的结局大为迥异了!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古罗马文明的覆灭。

在这次覆灭之前五、六百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揭开了罗马帝国在东欧及小亚细亚的历史,它从一个城邦发展为世界大国。希腊文明似乎被蛮族扑灭了,连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其《通史》一书中都不得不说:“我认为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人们都在探讨,罗马人为什么能在不到53年的时间内几乎使得全部有人居住的世界服从于他

们的统治。”

但是，罗马征服了希腊化的帝国，而希腊文化却同化掉了罗马。优秀的希腊文明支配了罗马人的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希腊语竟成了有识阶层的语言。罗马作家用希腊文创作，罗马史学家用希腊语作史……总而言之，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反过来征服了征服者。这也是中国人常津津乐道的华夏文明的同化能力，与清代有某种相似。

然而，这亦延续有上千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却未能再一次同化公元3、4世纪民族大迁徙中摧毁了古罗马帝国的蛮族。从此，古希腊罗马文明寿终正寝，列入世界被消灭的文明系列之中。

人们也许以古罗马晚期的腐败、淫乱、没落等内部机制的老化为由，说明这一消亡的必然性。但是，纵观全人类历史，高度发达的文明似乎都与腐化堕落同步，中国的两汉文明，到晋朝业已腐朽得可以了，纵欲享乐，苟且偷安，荒于酒色，不恤政事——这史书上的记载已够多的了，恐怕比古罗马晚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号称文明鼎盛的民族，由于其无可避免的腐朽，终究要为野蛮民族所战胜。难怪恩格斯说过，一个文明而腐败的民族需要野蛮民族给其注进青春的血液。

但是，华夏文明并不曾象古罗马文明一样一朝覆灭，相反，却延续下来了，一次又一次同化了南侵的蛮族。所以，光以内部腐朽机制为由断言文明的覆灭，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从地缘历史上而言，当蛮族打到了西欧及小亚细亚，古罗马文明是否没有退路了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有不同，例如，当罗马帝国权势达到顶峰之际，埃及作为一个特殊的希腊化国家，在一百多年里仍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中世纪蛮族统治下，古罗马就没可能保留任何一小块“飞地”么？

请注意，“飞地”之意义！

无疑，历史上的古罗马，没有这样的“飞地”，或者说，历史没有给予它这个机会。

而中国呢？

曾被一度描绘为瘴疠之地、鬼气森森的中国南方，却一次又一次成为了客家先民躲避战乱的天然屏障，成为了古代文明一块又一块的“飞地”——那么，客家人上千年迁徙的意义，就应当在这里寻找：正是这种大规模、而且是作为上层知识分子——衣冠士族的迁徙，使得有可能中断甚至覆灭的华夏文明得以维系与延续。

这个结论似乎下得太早。

而且，作为华夏文明的维系与延续，有着众多的历史原因，那么，作为客家先民的南迁，是否能作为这众多的历史原因之一，甚至作为其中重要的原因，光凭此还不足为据，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论证与分析。

我们首先还得从“飞地”论证起。

所谓“飞地”，在这里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民族的精华部分，在巨大的战乱或灾祸面前，不至于被彻底摧毁，至少有所保存，从而在灾难以后，继续辐射出它文明的热力，使四邻受到影响，得到开化，从而又重新恢复其活力，蓬蓬勃勃地重新振兴起来。中国话说的“火种”的意义可以说相近，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埃及作为古希腊文明的“飞地”保存有上百年，在古罗马为希腊文明完全同化后才消失，不能不承认其具备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南方，作为中原士族避难的“飞地”，便形成了古汉族不可摧毁的“火种”，在大难以后，又重新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与征服者的征服路线相反，开始了反征服。以软性的反征服克服了硬性的刀光血影的征服。

也就是说，蛮族完全摧毁了古罗马文明，使其片甲不留之际，蛮族，却未能完全摧毁华夏文明。其有力的证据是，作为汉族的一支先进的民系，在战乱中大规模南迁，保存了自身众多辉煌的文明成就，找到了自己的“飞地”。这支民系，便是客家——这正是客家人对华夏文明的杰出贡献。

当然，未被摧毁的尚不仅仅是民系，还有其它。但如果缺乏一个民系的实体，其文明的精神成果也就难得以保存。虚幻的寄托毕竟不足以构成历史。凭此，我们不难发现，秦汉时尚是偏僻的江淮一带，经过六朝，尤

其是东晋及宋、齐、梁、陈之南朝四代约三百年的振兴,农业、运输、通商、矿业等等,均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再往后,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开始以北方、中原居多,而几经大迁徙之后,便逐渐南移,由北多南少,至南北均等,到最后,则南方居多了——试数数唐、宋、明、清的历史文化名人,便一目了然。从此“江南多才子”便成了不可移易的历史事实。

如果说,南下避乱得的是“飞地”,文明的重新勃发、扩展,就不是一角“飞地”的问题,整个江南成了经济、文化的中心,到现当代则更为明显。因此,绝不可以低估“飞地”的辐射作用——也就是作为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的作用。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前面已经提过,文明与腐朽每每是同步的,所以,野蛮战胜文明则是因为腐败的内应,而野蛮一旦为文明同化,亦会迅速地腐败下去。这点,朱熹亦有所论及,他在批注《诗经·北风》中就一反他人的解释,认为“卫国以淫乱亡国,未闻其有威虐之政”。当然,这一解释与他力主严刑苛法不无关系,但毕竟道出了一番真理。亡国者,皆内乱也。内乱者,无不因国中淫乱、国君昏庸……作为客家先民,晋代的衣冠士族,当然是亲历了晋代士族的荒淫、腐败与没落。所以他们才汲取了历史的教训,为了维系这一民系的延续,形成了其独有的传统,即重耕耘、重教育、耕读传家;讲节俭、讲勤奋,尤其是轻浮财、薄商贾——当然,这已有了偏执之处了,既维系了自身却又限制了自身,可这种“卧薪尝胆”的自新精神,却是非常可贵的。客家人千年迁徙的长旅中,去弱图强,其面临的残酷的打击绝非别的民系可以比拟,不形成这样的传统,早就在历史上寂灭了。

一千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正是那种有可能导致一个民族灭亡的恶劣环境,包括自然灾害、战乱等等,在客家先民来说,却变成了对他们的严峻的考验——这种视灾

难、不测、厄运为考验的独特的民族心理,使得这支民系具有一种坚忍的生存精神,忍辱负重而不自暴自弃,在逆境中不是分崩离析而是增强了凝聚力,进一步塑造了自身的性格与完成了自身的形象。

历史学家总是不断地证明,维系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他们以往共同光荣的伟大的历史与传统。而现在,这一理论,却已渐渐显得陈旧过时了,新的史著已经在证明,存在的生命力,不是凝聚于过去而是寄托于未来,对于未来可靠的保证。对于客家先民来说,无疑,其迁葬的习俗,目的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将来,堪輿术剔除其迷信的一面,正可以看到这种民系的心理寄托所在。当然,重族谱的记载,尤其是以郡望自矜,似乎是一种贵族意识在作怪,但其指向却还是在于未来——教后世子孙不要辱没了祖宗。在远离故土的上千年的迁徙中,历尽了千磨万劫,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大动荡、大转折中一度扬起了生命烈焰的民系,对其来说,更重要的是未来而不是历史的证明——大迁徙所要寻找的不正是未来的发展么?九葬九迁,十葬万年,连祖先的尸骨也一样护着后代去寻找未来。由此,形成了客家人不保守、好开拓的更鲜明的特征。

所以,维持这一民系的最大的凝聚力,则是在于这个民系对未来不竭的追求,这不仅成为历史的骄傲,而且成为未来的骄傲——这对一个民系性格的浇铸,无疑是有着巨大的热力以及成型作用的。

唯一纵贯了从中原到岭南、直到台湾等地如此辽阔的中国故土、而今竟已散播于全世界的客家人,在其艰辛的、漫长的迁徙史上,早就应成为世界及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重大聚焦点,所以,业已引起了海内外历史学、人类学专家们高度的关注。他们正是华夏文明伟大的代表性民系,是华夏文明最重要也是最杰出的维系者。光凭他们上千年来始终能保住自己的“民系边界”及作为中原望族的认同感上,不仅是中国史,而且在世界史上,都已成为了奇迹。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历史奇迹。

更没有人可低估其在未来的辉煌!

奇迹正在于,在古罗马文明为蛮族灭绝的同时,同样是同一个蛮族的入侵,华夏文明却没有绝灭,竟随中原望族的南渡形成“客家”民系而在江南、岭南得以延续,华夏文明才没有同与之齐名的另世界三大文明一齐归于覆灭的命运,很大一部分的功劳,不能不归于此民系的保存、迁徙、发展与崛起……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当今世界上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的一个热点——犹太人的研究。

著名学者阿巴·埃班在其《犹太史》中写道:“许多民族即使暂时为异族统治,在自己的国土上依然会保持民族独立性。但是,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流亡中如此顽强地维护自己民族和宗教的特性,从中汲取力量并重新站起来。散居异乡仍能忠于自己民族的这种非凡力量是犹太民族所独具的。这正是犹太民族无与伦比之处。”

我们不妨以客家人作比较。

作为犹太人在全世界伤心的遭遇则不必复述了。客家人在异乡,一度被视为“獠獠”受歧视,以至导致1856年粤西客家人的大流血,造成死亡、逃亡逾半百万的惨剧,迄今仍记忆犹新。

我们还可以发现,客家人重礼教、重文化尤其重家族伦理诸方面,同样存在于犹太民族当中——这对于流浪的民族或民系,是必不可少的内聚力,关于这点,应当有另一

篇文章详细加以阐述,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了。只是请注意的,并不是所有民族都着重这几点的,只是在客家人和犹太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客家人的个性,他们的开拓精神,他们每每持的激进观念,他们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等等,我们均可以从犹太人身上发现对应之处。

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也同犹太人在面临数次历史大灾难之后,每每能重新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一样,甚至站得比以前更高,焕然一新。客家近代的历史文化名人之多,绝不会比犹太人逊色多少。

我们还可以作出更多的比较。

研究世界史的大学者们都说:不了解犹太人,就无法了解世界。

那么,我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也能理直气壮地说:不了解客家人,就无法了解中国与世界。

总而言之,在古罗马希腊文明最后覆灭之际,华夏文明亦面临同一命运,但其最终未曾覆灭并延续至今,相当一部分功劳应归于民族的大迁徙,包括客家人南下,当然,这与这支民系的传统、整体性格……等方面密切相关。承认这一伟大的历史功绩,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史研究的又一深化。

作者单位:广州师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郭林

孙中山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岭南地区或岭南华侨文化圈内度过的,岭南文化对孙中山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然而,到目前为止,孙中山的思维模式和岭南文化对孙中山的影响这两个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史学界广泛的注意。研究孙中山个性、思想和活动的学者,在确定孙中山的文化归属时,总是不加思索地强调孙中山的西化倾向或儒化特征。事实上,岭南文化作为孙中山的母体文化最初出现在孙中山的心理屏幕上,孙中山感知世界的方式,对人对己对事对物的态度,对社会对人生对命运的体验,以及实践活动的具体方式方法,也就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岭南文化的胎记。也就是说,是岭南文化赋予了孙中山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以及思维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或者说孙中山是在岭南文化的直接启蒙和影响下开始思维和学会思维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岭南文化与孙中山的思维模式这个问题。

首先,岭南文化是孙中山思维模式朝着开放思维模式方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岭南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开放、多元、实用是它的主要特征。不断地吐故纳新和新陈代谢,更是岭南文化的内在机理。多元文化决定了岭南人思维路向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文化的实用性和开放性,又决定了人们认识上的直观性和实体性。孙中山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开放、活跃变动的多元文化的氛围里,自然耳濡目染和心领神会,在学习、生活、活动和交往中体认到了开放、明亮、通达、融汇、吸纳、交

流、学习和变动的真实价值与现实意义,意识到了封闭、单一、孤立、保守、排斥、限制、束缚、禁锢、冥顽、刻板和党同伐异、

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意识、专制思想的危害,懂得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集思广益、包罗万象、集百家之长补己之短的道理,明白了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和忍让的意义,领悟到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成事在人,谋事在天”,“胜败乃兵家常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类名言的底蕴,养成了自信自谦、开朗明丽、真诚坦率、热情侠义、乐观进取、灵活机敏、幽默风趣的性格,学会了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独立思考、勇于任事、否定过去、面向未来的待人处事的本领。所有这些习得性的言行,又无不是开放思维的间接或直接的体现。岭南文化赋予孙中山开放思维模式就是在这些关于人生、社会、自我、事业、思想、观念、行为等方面得到再现和高扬的。

正因为是在岭南文化的薰陶濡染中不自觉地、也别无选择地承继了岭南人的这种开放思维模式,所以,在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的追求上,孙中山没有停留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和“学而优则仕”这个定格上,而是随着时势的变易不断地调整和更新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人生追求,象大多数岭南

人一样并没有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唯一的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而是根据时势的变易

岭南文化与孙中山的思维模式

□胡波

和客观社会条件,以及个人的兴趣爱好去灵活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和谋生手段,正如他自己所言“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在兴趣爱好上,孙中山也不象大多数中国人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是一任性灵舒身展臂,听其在广阔的空间里挥挥洒洒,他自己就曾回忆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①在对待西方和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孙中山也不象那些正统的士大夫们那样采取拒绝、否定的态度,而是象大多数岭南的知识阶层那样本能地作出了开放开明的选择。孙中山在1897年就表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②并指出“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③“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④“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以前的旧东西,……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⑤甚至为了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他还提倡引进外资、设备、技术、人才,实行开放主义。在建国立国主张上,孙中山的态度仍然是“开放主义”的。在他看来,集天下之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原则。其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是开放思维的结晶。在革命实践活动过程中,孙中山的开放思维模式更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炼和陶冶。其革命方略的制定,思想主张的形成,革命力量的聚集,革命组织的建设,革命战争的进行,外交活动的展开,无不流淌着孙中山那开放思维的汗水。在内审国情,外察世界形势的同时,孙中山不断地探索,也不断地吸收各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寻找救中国的最佳方案。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是少数几个人就可以完成得了的,需要千千万万的爱国

志士们的共同努力和海外关心或同情中国革命的民主人士的支持。为了赢得更广泛的支持,结成反对清政府的统一战线,孙中山甚至不遗余力地与西方各所谓强国政府频频接触。在孙中山的周围也的确拥着千千万万数不清的追随者、同情者和支持者。在那个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的特殊时期,有了孙中山这样一个超越省界、国界和文化类型的具有开放意识的领导人,中国的旧三民主义革命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具有开放思维的人必然具有平等思想和自由意识,也必然拥有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对人对自己,孙中山少有成见,即使免不了受先入为主和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他亦能随感觉和事实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态度,重新认识他人和自己。如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先是怀疑,继则信任,后则反对就是明显的例证。对同志,孙中山也很少象当时革命党中大部分人那样,感情上带有地域观念的非理性色彩,而是不分地域、不分南北东西、不分同乡故旧和亲戚朋友,一律以“人尽其才”为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抱陈见,不有意地搞宗派,拉山头,平等意识和自由思想在他这里既有了生命的依托,又得到了高扬的机会。

诚然,孙中山的开放思维及其特点的形成,与他所受的西式教育、海外生活经历和个性心理有关,但与岭南开放型的人文风貌和放达舒展式的自然景观似乎关系更加密切。孙中山后来所受的西式教育和海外生活经历至多也只是对这种早期形成的思维胚胎起着增加养分和通经活络的强化刺激作用。明显的事实是在孙中山出生的头几年里,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思维活动和思维模式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状态下接受他所属文化圈内的长辈和大龄人的“言传身教”和“社会教化”而开始孕育生发的。岭南文化对孙中山思维模式影响的这种情形,在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身上同样发生过。这也是为什么在近代,岭南人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内地更多的更有才智的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岭南文化对孙中山发散式思维模式的形成起了铺垫和推动作用。

如大多数人所指出的那样,岭南人,尤其是近代岭南人的思维模式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发散式思维,也即是沿着各种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寻求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以求得答案的思维模式。通过发散思维,人们可以提出种种新的假设、新的构想,打破旧框框,别出新裁。从思维的向度上来说,发散式思维是多维多元的思维模式。岭南人在思维模式上具有这一特点当然与他们所处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对外文化交流等得天独厚的因素有关。

作为岭南人中的一员,孙中山毫无疑问地继承了这一思维传统,甚至可以肯定,岭南人多视角、多向度、多侧面、灵活地处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难题的思维模式,对于幼小的孙中山来说,其印象或许是极其深刻持久的。因为,一方面岭南人为了改变生活的苦境,掏空了心思去想挣钱的举措和谋生手段、途径和方式的多样化,也许在无声无息之中使孙中山受到启发和激励,这一点,我们只要从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和“上李鸿章书”中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所提的一些主张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另一方面,岭南人处世精明、办事灵活、为人乖巧、行动敏捷、见识广博,善于适应环境,爱变会变和求新求异的风格,孙中山从小就耳闻目睹,甚至习染成癖。今天我们虽然找不到孙中山在此方面的直接表述和充分说明,但这种影响的痕迹我们从孙中山一生的言谈举止中是可以寻到蛛丝马迹的。在如何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问题上,孙中山虽曾一度试图借助他心目中的所谓“英雄”、“大人物”、“当权者”、“开明人士”的“开明”、“激进”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把他们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云梯,但他毕竟没有陷得太深,没有将命运的赌注押在这些“先知先觉”的大人物身上。他在上书李鸿章的同时也作好了下一步的打算。其组建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这一举措,就很耐人寻味。同样,岭南人办事处世机灵敏捷和注重实效的品质,也注定了孙中山不可能停留在某一思维路向上,他的每一次冲刺和跳跃,都必定越上一个新的台阶。同盟会的成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不断完善,建国方略的制定,改

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组织北伐等等,几乎每一次试跳,都跨越了新的高度。所以,孙中山也始终是他的时代的弄潮儿。

发散式思维模式,必然与超前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具有发散思维模式的人,其言行自然超越于他人之上。孙中山无疑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人。他既不沿着传统的老路缓步行进,又不轻易地放过传统中的精华;既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又不轻易草率地抛弃百家之言,总是在学习、接受和消化他人的东西的同时,有意识地寻找自己思考问题的方法方式。就是在学习别人的长处之时,孙中山也很少不加分析地模仿,而是在经过一番研究和比较之后才决定取舍的对象。他在1920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就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欧洲的时候,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⑥其民生主义的创立,就是在既摘西方文明之善果,又避西方文明进化之恶果,既改变中国所患之贫,又防止富了之后可能出现的不均的原则下精心构思的。就是其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理论主张,也与大多数革命党人和上层社会的精英们的认识有所不同,与洛克、孟德斯鸠、托马斯·潘恩等早期西方民主和民权主义理论家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的“五权宪法”,就不是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而是在更合乎国情世情的条件下对三权分立模式的一种超越。^⑦其“实业计划”亦是在汲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养分的同时,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的一种突破。正是因为孙中山从岭南文化中汲取了许多养分,从自己的同乡——岭南人那儿学会了求异思维,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他那个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时代永不退色的“明星”。

当然,发散式思维模式的形成并非完全受益于岭南文化。在接受岭南文化熏陶的同时,孙中山还与东西方各国的文化有过较密切的接触,所受影响亦很明显。但我们也要看到,人的思维训练是从小开始的,思维中的最基本的东西是在青少年时代习得的。文

化语言、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等最早被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纳入了自己的思维和认知体系之中,它们既影响主体的思维模式,又无形之中成为主体思维和认识对象的一部分。后来的学习和实践活动固然使早期的思维模式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也是极其缓慢和极为有限的,它甚至只能成为前认知图式的补充说明。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化潮水般涌来时不慌不忙地迎接挑战,乐观自信地对待本土文化,巧妙灵活地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加工包装变成自己的东西,无疑与岭南文化赋予他的思维模式有关。如果没有岭南文化的滋润哺育和岭南人发散思维模式的长期影响,孙中山的早期言行和后来的举措就难于理解。准确地说,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只是在客观上强化了孙中山的发散式思维模式。过分地强调西学对孙中山的影响,重而言之就是割断历史,否认人不同的成长阶段间的内在逻辑发展关系。

再其次,岭南文化孕育了孙中山的逆反思维模式。

岭南人思考问题与大多数其它地区的中国人有所不同,总是与常规相反,逆向思维。在语言表达、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岭南人均与其他地区的人有很大的差别,总是给人一种反向颠倒的感觉。岭南人这种逆反式的思维习惯正是通过日常生活、语言、思想观念、社会规范等途径传承给孙中山的。首先是语言的传承对孙中山的思维模式产生深远影响。正如申小龙所说的那样:“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包括自然界与社会、文化与价值、历史与未来)之间联系的根本纽带。人按照他的语言形式来接受世界。这种接受形式决定了他的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从语言中看到的客观世界已非纯粹的客观世界(包括施事的意识、功利的意识、模糊的意识等)。语言本质上不是一种与人的主体相分离的客观形式系统,而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语言带给人一种对于世界的特定的态度的关系。当人们掌握自己的母语时,也就同时接受了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的价值意义。”^⑧应该说,粤语作为孙中山的母语,对孙中山的思维,尤其是逆反式思维的影响是毫无

疑问的。其次是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孙中山长时期在岭南地区和岭南华侨文化圈中生活和交往,思维所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除了岭南人求新求异的言行予孙中山潜移默化的影响外,则是岭南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和行为表现所蕴含的求新求异这种逆反思维的逻辑规律本身也成为孙中山思维认识的对象,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孙中山主观上也会积极地与这种求异思维(逆反思维)产生认同。因此,岭南人的逆反思维,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孙中山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所以,逆反思维是孙中山思维的一大特点。这种求新求异的思维模式,虽然使孙中山的思维主张常常因与大众截然相反而被冷落和反对,但正因为孙中山具备逆向思维这一思维品质,所以才有可能打破地域、文化、语言和心理上的障碍,实现自我超越。在救亡图存的道路、方式和方法上,孙中山就没有走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康梁维新变法运动也是求新求异思维的一种表现),而是相反地提出了从下而上的革命排满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救国方案;在人们的排外情绪不断高涨时,他却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甚至主动与东西方列强结好消怨;在革命党人内部普遍认为袁世凯不可信的声浪中,孙中山却一反常态,北上与袁世凯共商国是;在革命不可为,感到前途暗淡渺茫之时,孙中山却相反地从失败和挫折的低潮中看到了革命成功的有利形势和美好前景;在大多数革命党人对会党持有极大的偏见时,孙中山却认为会党是一股可以依靠的力量,主动地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当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力否定而大力提倡全盘西化之时,孙中山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有益的东西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当大多数中国人受“知易行难”的思想影响而无所作为时,孙中山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当人们对共产党怀有敌意和持反对态度时,孙中山却在积极地谋求国共合作。种种现象表明,孙中山的逆反思维也使孙中山不至于被表面的现象或假象所迷惑,具有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非凡的能力。

最后,岭南文化是孙中山系统思维模式

形成的最初土壤。

鲁迅曾说南方人机灵狡猾，“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对其过于机灵狡猾的品质不以为然。但就思维的特点上看，南方人（当然也包括岭南人）的这种人格特质与他们的系统思维有关。南方人的思维是一种网络状思维模式，即系统思维。它与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那种带有笼统性、模糊性、静态性不同，在观察思考问题时，注重从事物的联系性、发展变动性、客观实用性等方面去作系统的分析研究，从而把事物的真、善、美和用统一起来。

孙中山就是一个具有系统思维的人。在对国情的认识上，孙中山就不象许多传统士大夫甚至新型的知识分子那样，孤立静止、片面绝对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而是全面、整体、联系和发展地去体认和把握。把中国的问题放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的同时，他还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国民心理等问题作了比较实事求是、全面整体的分析研究。在确定武装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目标后，孙中山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如成立兴中会、同盟会，争取海外华侨、联络会党、策反新军、团结知识界，创办报刊、鼓动革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野心，一切显得有条不紊。在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孙中山的系统思维模式及其特点也充分地显示出来。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五权宪法主张、建国方略、知难行易学说，以及现代化构想等，都带有明显的系统思维特点。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就直接提出“用系统的方法，指导其事。”^④他自觉地运用了系统思维方法去揭示经济建设系统内在的逻辑层次，主张“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式采机器，又统一而固有之”，^⑤以“两种革命并举”为经济建设的总体策略思想，故孙中山所言的经济建设既是物质生产建设，又是新的经济制度的建设。具体便是，既要实现工业革命，振兴实业，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又要实行土地、资本的国有化，进行新的经济制度的建设，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物质生产建设；既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建设的整体系统工程，进行整体性构思，

全面规划；又从微观上设计出各个项目的具体规划，揭示整体中各个组成部分间的内在联系。《实业计划》提出的系统的完整的经济建设蓝图，便是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的整体性的集中表现。不过，我们不要忽视了孙中山系统思维的岭南文化渊源，混淆“整体思维”、辩证法与“系统思维”之间的区别。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和整体思维，注重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是一种整体性的直观法则，而缺乏严密的逻辑实证和科学的有序的运思方法，直观性、模糊性、笼统性较为明显。系统思维则不同，它强调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家庭与国家、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等彼此之间的对立与统一、联系与独立、变化与发展的内在关系，偏重逻辑性、整体性、联系性、动态性和精确性。岭南人的系统思维常有中国传统思维的辩证特点，又有自己的思维个性。这是我们要首先弄清楚的。孙中山的系统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和整体性思维有所不同，它带有更多的实证性，变动性，但同时与近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思维方法又有所不同，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思维更重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更重视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而孙中山的系统思维在宏观上的探索方面还欠深入，整体联系性和局部相对独立性都不太明显。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孙中山的系统思维与现代哲学、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思想等同起来。孙中山的思维模式从总体上看，还是岭南文化式的。

①②③《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86、281页。

④⑤《孙中山选集》第690、78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第2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刘兴华：《孙中山思想论稿》第101—10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⑧申小龙：《语言的人文性与东方功能型研究》，载《北方论丛》1988年第2期。

⑨⑩《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4、250页。

作者单位：中山市孙文学院
责任编辑：郭林

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 与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

——戊戌变法时期女学思想探析

□杨 晓

“女学”本身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动态的历史范畴。在历史上,学者们运用这一概念的内涵不尽相同。《礼记·内则》中说:“女学事以共衣食”。说明社会分工决定女子教育的内容与方式,由此产生了最原始的女学概念。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演变,当代学者们运用的女学概念,多为“女性学”,即研究女性行为的学说,包括女性个体行为和女性群体行为。本文意在通过对戊戌变法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女学思想的分析,揭示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与近代女子教育兴起的历史原因及其社会价值;探讨中国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社会地位提高与社会变革和教育发展的关系,以阐明教育在解放妇女,改变妇女生存方式,提高妇女生活质量中的独特意义。

一、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

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发生在戊戌变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女学思想及其实践,清晰地反映出中国传统女学终结的社会历史原因,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变革所导致女学思想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必然性。

(一) 女学产生与“女教遂绝”的历史际遇。

研究女学产生,首先无法回避的是残酷的历史事实。文明社会产生之后,女性先于男性陷入奴隶状态,对女性的贬低,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是一个共性问题。当男女的自然差异,在生产、战争等社会活动中逐

渐转换为一种社会差别时,女学的产生就如同男权社会的建立一样不可避免了。

“在野蛮时代,女权特别优越;未开化时代,女子地位仍然极高。”(《杨贤江教育文集》第439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畜牧与农业的生产劳动中,男子胜于女子,形成了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别,同时也就形成了男女的差别教育,进一步导致独立女学的产生。然而,由于社会分工,形成了女性社会角色家庭化倾向,女性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逐渐偏离,女性与学校教育也越离越远。继之产生了“女学独立,女教遂绝”的矛盾现象。对此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深入分析。

1891年,宋恕在《变通篇·开化章第四》中痛斥:“赤县,秦前学校最盛,男女无不知书,秦后频遭惨劫,劫余之族,日以昏愚。”“愚民之主皆以绝女学为要义,故秦一统,汉继之,而赤县女学遂绝。”

1899年,经元善在《劝女子读书说》一文中也说:“上古无不读书之女子也,三百篇,闾巷妇人之作居半也。是以中垒列传,有取于静女,兰台续史,特进乎大家。前徽不沫。可按而稽。自后世以文章取士,仍谓无女状元科,遂至沈痼之疾,无以砭箴,迄于今日,民志日愚,国势日蹙。”

女学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在封建社会日趋完善之时,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空疏无用的文风,以及排除女性的科举制度等封建文化,又成为制约女子受教育的主要因素。传统女学本身就是性

别歧视,男权统治的产物。女子的教育状况,因与其社会地位相关,女子与教育“绝缘”的历史便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三代之后,特别是秦以后中国女子教育走向了低谷,造成了越演越烈的悲剧性的女性人生命运。那么,封建社会是如何把中国女子置身于这样一种悲惨境地的呢?传统女学的形成发展,与女子同教育绝缘的怪圈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二)以德为本的封建女学体系构成及其异化。

何为中国传统女学?郑观应在《女教》一文中概括:“中古女学诸书,失传已久。自片语散见六经诸子外,以班昭《女诫》为最先,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女训》、《闾范》、《女范》各有发明,近世蓝鹿洲采辑经史子集为妇人法式者,谓之《女学》,颇称详赡。”这些历代女学著述,又成为历代的女子教科书。梁启超说:“宫中宗室,古经厘其规纲;德音容工,昏义程其课目。”即:妇德(指妇女应具备的德行)、妇言(指妇女的言语)、妇容(指妇女的服饰打扮、举止仪态)、妇工(指妇女所作纺织、缝纫等事),构成以德为本的女学体系。这种女学体系在清代发展到了高峰,出现了从通俗的《女儿经》,到权威的《内则衍义》等一系列女学典籍。清代贺瑞麟新编《女儿经》中说:“女儿经,女儿经,女儿经要女儿听,第一件,习德行;第二件,修女容;第三件,谨女言;第四件,勤女工。”利用三字经的形式,对以德为本的女学体系,进行简明概括,以便于民间记诵和传世。在《内则衍义》序言中强调:“谨案《内则》所载,皆闺门之内,起敬起孝,兴仁兴让之事。而首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谓之此乃王后世子所躬心得,而可为民法者,故不言布教,而言降德也。”可见,以德为本是统治阶级推行女学的终极目的,而这种“德”是以是否能维系封建等级秩序为准绳的。因此它的前题是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为什么封建社会如此推崇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女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女学体系,而社会上的女子学校教育

却荡然无存呢?

陈炽在《妇学》中指出:“三代以上所由大化翔洽,而贤哲笃生也。后世妇学失传,其秀颖知文者,或转为女德累,遂因噎废食,禁不令读书识字,至骄佚偏僻,任性妄为。”(《庸书》外篇卷下)指出封建社会强化“女德”,反而阻碍了女子受教育。郑观应明确指出传统偏见对女子教育的制约:“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的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工亦无专师,其贤者而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女教》)揭示出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学观,把女才与女德严格对立起来,是女子不就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封建社会中,所谓女才往往被局限于闲情致意,风流邪僻方面,因此女才被视为恶魔,与女德对立起来。“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其为男子,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能指之浮浪之子,靡论妇人。”历史上对“才女”这种不恰当的规范,强化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偏见。

康同薇认为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空疏腐化,造成女性追求的也必然是虚华邪僻的东西。“女才”与“女德”的对立,是封建文化自身弊病的反映,其连锁反应便是限制女子受文化教育这种“因噎废食”的极端做法。经元善更尖锐地指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实质是,凭借女性的愚昧无知,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梁启超从两方面驳斥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陈词滥调,其一,女才本应体现对内开阔心胸视野,对外有利生计,近代女学首先要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女学观。其二,妇女无知无识,才是败坏道德,家庭内外不和睦的真正原因。只有使妇女受到相应的教育,了解天下大事,才能形成崇高的精神境界,才能与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启蒙思想家们,从理论上揭示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女学观的谬误所在,并指出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国女子无知无识,不学无术。这正是以德为本的封建女学异化的一

种反映,这种异化使女子远离教育,得不到系统文化知识的熏陶,更日益加深了“女子天生无能”的偏见,人为地拉开男女之间在各方面的差距,使中国妇女千百年来一直处于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

(三) 中国传统女学的基本特征及其衰落。

根据戊戌变法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传统女学的界定,中国传统女学的基本框架由女学观、女学内容、女子教育三大部分构成,三者之间相互制约。女学观决定了女学内容,限制了女子教育。这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宗法制度把女性置于一切社会活动的从属地位,以维系男权统治绝对权威的结果,由此形成了封建社会传统女学的三大特征:

其一,女学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它是女学观、女学内容、女子教育的一种相互矛盾的混合体。是一种建立在相对停滞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意识形态。

其二,女学沦为封建宗法制度的附庸。女性服从男性,作为封建社会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三大部分之一,成为维系封建宗法关系的纽带,女学以三从四德为核心,成为宗法制度的文化根基。

其三,女学的传播,对女性而言,主要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基本脱离学校教育的轨道。而对男性来说,则在多种形式的教育中,强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夫唱妇随”的传统偏见。

在封建社会女学的熏陶与渲染下,中国女性突出的特征是人格依附性,寻求人身依附成为女性生存选择的主要方式。因此其对女性的教育更多地是一种束缚,而不是一种发展。时至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远远落后的状况已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当外国资本主义挟着军舰和大炮,披着宗教的外衣涌入中国之时,中国女性的愚昧与虔诚,面临着更大的危险。“西人在我通商之地,分割之境,皆设学校教堂,以教我女子。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无志甚矣。”(《女学利弊说》)中国女子教育的弱势,已成为西方列强从精神上

奴役中华民族的可乘之机。所以,当近代工业社会改革即将到来之际,这种以束缚女性服从男性,服从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近代女子教育思想也应运而生。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率先“兴东土二千年绝学,造中华二百兆美材。”(《万国公报》第125册1899年6月)

二、戊戌变法时期女学思想体系的构建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风雨飘摇之中,中国传统女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小生产的没落与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要求人的素质发生相应的变化,与之相应的教育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以德为本的传统女学,受到了近代工业化思想的极大冲击而赋予了新的内容。

(一) 自养、自知、自强的女学宗旨。

当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中国大地勃兴之时,“以妇学为治天下所学事”的启蒙思想家作为政治群体已开始影响着一代人。“自张其军,以提倡同类”的女中豪杰,也一马当先奋力冲决着封建网罗。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呼唤,使妇女应该自养、自知成为人们呼吁改革女学、倡明女子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提倡女子教育,首先是对人性的一种自然回归,这种回归以走出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走向大生产的工业社会背景为前提。然后才是人格层次上的社会自觉,这种自觉以抛弃传统观念,形成近代意识,促进女性近代化为目的。

严复明确指出中国妇女必须自强是社会发展内化为新的女性特征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这一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他说:“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故使中国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人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

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首先明确提出“自养、自知、自强”为提倡女学的宗旨,与今天人们提倡妇女应“自立、自尊、自强”是一致的。换言之,近百年前,人们对女性人格独立的特征已经产生了基本共识。这种以否定女性人格依附性为目标的人格独立,是对男权文化的一种自觉挑战。人格依附与人格独立是传统女学与近代女学的分水岭;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所形成的不同女性人格特征;是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在人格层次上的本质区别。

(二) 男女平等的女学内容。

男女平等是近代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改变女性人格依附性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女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与传统女学思想中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是尖锐对立的。

男女平等的思想究竟源于何处?戊戌时期启蒙思想家们的论述涉及两方面。

其一,强调中国传统学说中就存在男女平等概念。1896年,陈炽在《妇学》中说:“《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古人立教,男女并重,未尝有偏倚于其间也。”康同薇说:“是故孔佛之道,男女平等,孔子编诗,则首关雎,传礼则详内则,大义昭然,至可信据。”(《女学利弊说》)梁启超也说:“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创设女学堂启》)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传统学说中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长期桎梏下,被扭曲、被淹没了。

其二,指出男女平等思想是近代西方走向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论女学》)“男女平权,美国斯甚。女学布饩,日本以强。兴国民智,靡不始此。”(《创设女学堂启》)同样,今日中国要重新强盛起来,也必然要从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重视女子教育做起,“今而欲为起化之渐,行道之先,必自女教始。”

为了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现

象,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男女不平等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偏见直接相关,是封建主义压制的结果。康同薇通过比较印度与美国对待女子的不同态度来强调这一观点。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更痛斥男女不平等是封建主义压制的结果。其次,他们进一步论证,男女在教育上平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不同于禽兽,不是靠自然本能,而取决于后天的学习。男女即同为人类,虽有性别差异,并不具有优劣之分,同样享受教育权是天经地义的。至于男女的性别差异,仅仅导致男女在学习不同学科方面各有所长而已。“西人格致家之言曰,言算学、格致等虚理,妇人恒不如男子;由此虚理而施诸实事,以成为医学、制造等专门之业,则男子恒不如妇人。然则男女之于学,各有所长,非有轩輊。”数千年来女子难以建功立业、展其所长,是因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原故。如果让妇女与男子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根据女性的特点,则“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梁启超《论女学》)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不知人有两画,具左右阴阳之义,非男子名人,而女子不得名人也。男女既同为人,即可以同参天地,同立三才。”(劝女子读书说)

男女平等作为戊戌变法时期女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受到重视,并直接反映到兴建女子教育的具体过程中。《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立学之意,义主平等。”也就是说,兴办女学,首先就要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那么,在实践中该从何做起呢?

(三) 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女学风范。

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格局,加之传统的观念习俗,使中国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所有的活动几乎都被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

梁启超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妇女必须走

出家门，走向社会的社会原因之外，还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角度论证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必要性。他说：“学也者，匪直晨夕伏案，对卷伊吾而已。师友讲学，以开其智，中外游历，以增其才，数者相辅，然后学乃成。今中国之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所以，女子欲学有所成，必定要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严复提出了阅世思想。“虽然，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今日既兴女学，效法泰西，然犹不使之增广见闻，则有学堂与无学堂等。不见村学究之日事咿唔，而一无所用乎？读书不阅世，直如此耳。今倘有人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发明妇人应出门之故，庶几风气渐开矣。”（《论沪上创兴女学堂》）这种思想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开明女士们的响应。

在上海女子学校兴建之前，部分上层家庭中的妇女，几次集会讨论兴建女学的问题，蒋毓芳女士曾即席赋诗：“转移风气苦心殚，巾帼须眉一例看。此日开基诚不易，他年踵起自何难。”“经营缔造辟新基，巾帼英才吐气时。学贯中西臻美备，四方闺秀萃于斯。”预示着“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女学风范，将从此改变女性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使她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之间，施展抱负，贡献于社会。

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这种新的女学风范，是对传统女学的大胆改革，是社会历史

发展的一大进步。无疑，在近代中国兴办女子教育，是女子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家们，以“独掌埋河”的勇气，开始了兴办女学的事业，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倡而明之，推而广之。”以“振二千年之颓风，拯二兆人之吁命”。他们坚信：“同心并胆，坚忍不挠，期以十稔，中国女学可遍寰宇。”（《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第3页）

女子接受教育的确启迪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几年之后，受过教育的开明女性，便表现出不依附于男性及男权社会的自我解放思想。在1906年《广东移风女学校序言》中明确提出“故今日我二百兆之养面如盲如聋如醉者，咎不在男之压制，而在女之放弃自由。往者康同薇君女史曾论缠足之害，女子亟宜自革，余亦尝著论女子亟宜自立。盖皆愤女权之不振，发我类之精神。然欲振女权，先兴女学。女学兴而后有知识，有精神，有才力。”反映出对教育在解放中国女性中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

正是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使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成为事实。女革命家秋瑾，女报人陈撷芬等，都是近代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纵观近百年来的历史，当中国妇女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之时，她们在各行各业中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这就是教育对女性发展、女性社会价值实现的独特意义。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系
责任编辑：郭林

抓紧编辑出版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陈晓东

要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必须掌握更多的史料,为此,抓紧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分必要和迫切。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史学会在范文澜、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的主持下,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编辑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丛刊》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等12个专题,共75册,约2600万字,由神州国光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武汉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北洋军阀》成书最晚,由两种版本组成,即来新夏编的1895—1911年部分,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1912—1928年部分,六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出版)。《丛刊》的编辑出版,堪称中国史学界一大盛事。这部近代通史型的史料集,系统、翔实地辑录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史料,查找方便,为史学工作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免去了许多搜检之劳;《丛刊》中的一些史料,取自珍本、抄本、孤本,这些罕见的史料公诸于世,成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财富;《丛刊》还译收了一些外国档案和私人著述,更为史学工作者所欢迎。四十年来,《丛刊》成了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必备书,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

然而,《丛刊》绝大部分专题成书较早(12种专题中有10种成书于50、6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大量的新史料被发掘、

整理出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翻译了不少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外国史料。这样,《丛刊》原有的12个专题,已不能充分反映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全过程。如关于清末立宪运动,过去认为该运动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相呼应,反对革命,是一场反动的改良运动,《丛刊》无此专题。现在这种片面的认识得到了纠正。清末,中国的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升时期,其政治上的左翼,主张以革命手段倾覆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国,固然值得肯定;而其政治上的右翼,主张用和平的方法,促使清政府进行根本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同样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有利于中国近代化,因此亦需肯定。革命派与立宪派间虽有矛盾,但彼此不是阶级敌人,而是资产阶级内部政治上的两翼,双方只是在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中国的方式和程度上有异。立宪运动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不可混为一谈。前者由资产阶级立宪派发起,他们真心实意地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且力图进展得快些,以济时艰;而后者由清政府主持,虽然这也是一种有益的改革,但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的心不诚,而且步履踟蹰,远远满足不了资产阶级的需要。随时局的发展,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变得无法调和,终于顺应潮流,倒向革命派一边,与之形成合力,推倒了满清王朝。立宪运动对清末的政治改革、中国资产阶级的壮大及辛亥革命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故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者逐渐增多,需要了解有关史料。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为适应史学发展之需,1986年决定在《丛刊》的基

基础上,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以下简称《续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续编》的第一批专题五种,已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其中《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辛亥革命》为《丛刊》原有专题,拟在原来的基础上补充增辑;《立宪运动》为新列专题(由胡绳武主编),将辑录《丛刊》所未收的这方面的重要史料。

但是,《续编》的出版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第一批专题已开始面世的,仅为戚其章主编的《中日战争》(共11册,1989年始出第一册,至1991年,已出至第三册)。其他四种均未出版,有的刚刚在组织编写力量,做些筹备工作。为了适应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需,得设法加快《续编》的编辑出版速度。

首先,应提高对史料整理工作的认识。诚然,史料不等于史学,史料工作是历史研究的初级阶段,从史料上升到史学则为历史研究的高级阶段,但两者乃有机联系的整体,史料为史学的准备,史学是史料研究的必然结果。史学的基础在于史料,论从史出,从这一角度出发,史料工作是第一位的,首先应予以重视。为使《续编》早日编成出版,需要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去搜集、整理、选择、节录、标点、校勘、注释、翻译史料,扎扎实实地工作。

其次,应增加资金投入。编纂《续编》,参编人员需查阅、复印、誊写大量资料,还要一定数量的差旅费及会议经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虽下拨了经费,但数量有限。有的专题编纂组,所需资料尚未查阅、复印毕,经费已告罄。为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宜酌情增拨《续编》的编纂经费。此外,还需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据报载,北京经民间自筹资金,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拟每年资助出版若干部史学学术著作,

汇成《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同时资助开展专题学术研究。该出版基金,可否考虑将《续编》列入资助对象。出版学术著作常亏本,出版史料汇编则亏得更多。中华书局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局出发,承担起出版《续编》的任务,令史家赞叹。但为了减少亏损,据悉该出版社亦准备大幅度压缩未出专题的字数,已出版的《中日战争》,后出的分册亦较先出的分册减少了印数。史料收集得愈多,对史学研究愈有利,若因利润关系,忍痛割爱,少收史料,少印册数,实在可惜。鉴此,国家有关部门不仅应向编纂组增拨经费,亦应向出版单位发放出版津贴。对于中华书局,则望其进一步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发扬热心出版学术、古籍图书的好传统,按原计划出版,尽力使《续编》内容丰富些,流传得广些,从而发挥更大作用。

再者,档案馆、图书馆应积极支持《续编》的编纂。档案馆、较大图书馆的古籍部,乃史料的渊藪,一些档案馆、图书馆,派员参加了《续编》的编纂,以充分利用馆藏资料。但编纂人员中,有些并非来自档案馆、图书馆,他们查阅馆藏资料常有困难。所以,档案馆、图书馆对《续编》资料搜集工作应提供某些方便。

翻阅5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论著,注释中说明所引史料出自《丛刊》某某专题者,比比皆是,可见《丛刊》作用之大。《续编》将能起到《丛刊》的同样作用,成为史家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广泛征引的史料来源。我们企盼着在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下,经编纂人员和出版单位的艰辛努力,《续编》的各个专题能及早问世,为史学研究大厦奠下新的基石。

作者单位:苏州铁道师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郭林

论妈祖信俗的性质及

中国学术与宗教的多元互化发展

□ (澳门)·谭世宝

一、略评有关妈祖信俗的性质的歧见论争

关于妈祖信俗的宗教属性及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分歧较多、争论较大。例如：李露露《妈祖信仰》说：

妈祖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海神，也是万能之神。但是，她属于什么宗教？具有什么性质呢？目前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种认为属于佛教，一种认为属于道教，一种认为是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合一。从某些现象上看，三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她又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民间信仰，但她深受佛教、道教、巫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①

其实，上述观点包括李露露的看法，都未能正确全面地反映妈祖信俗的真相。依笔者浅见，妈祖信俗自产生之时起，就是一种不断超越地区、阶层、宗教乃至民族局限的多面体、多功能的信仰，因为不同宗教、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乃至不同种族的人，都先后参予这一信俗的创造与发展的过程，因而在不同的方面给妈祖打上自己的印记，同时又可把妈祖请入不同的宗教和不同性质的庙宇中。因此，我们可以就某一或某些庙宇的宗教及社会性质来具体分析它或它们供奉的妈祖的属性，但不可以把这样归纳出来的部分妈祖的性质当作全部妈祖的性质。例

如，说妈祖只“是一种民间信仰”的观点，就是既不符合妈祖神像曾分别为儒道佛三教的殿宇接纳的事实，更不符合妈祖自宋迄清皆受地方官府以及中央朝廷的尊崇和引导的事实。其实，反映妈祖信俗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的各种例证，已为不少学者引述过。但是，要正确认识这些例证及其蕴藏的结论，就必须同时对中国学术与宗教的多元混合发展的历史进程，有一较为全面正确的认识。笔者认为，妈祖信俗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是由先秦至唐宋，中国学术思想与宗教文化的多元互化发展的结果。我们既可以通过对整个历史进程的总体认识来给妈祖信俗一个正确的定位，亦可以通过对妈祖信俗之研究来矫正对历史进程的总体偏见。因此，研究妈祖信俗，不能只局限于妈祖出生以后的时代，而必须广泛联系妈祖以前的中国学术与宗教的发展史。

二、简述陈寅恪对儒道释三教关系的分析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指出：

……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修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之追补者也。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

周卫元高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七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②

以上之论,正确指出了“自晋迄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的基本事实。虽然,各教都有或明或暗,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异教某些成分,总之都有因互相影响而产生变化,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但是,三教的主体分别及鼎立是始终存在的。尽管历代都有人主张三教合一,甚至创立三教乃至多教合一的教派,但实际上大都是假的三教或多教合一——以旧的某一教为基础兼并其他教。现代有的学者在谈论儒释道三教合一时,往往惑于假象而不能说明以上实质。而陈寅恪的高明深刻之处,就在于既肯定三教始终分立的事实,同时又扼要地指出了三教互相影响变化的原因过程。他指出:

……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犹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其先导。……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

示者也。③

自宋代开始产生的妈祖信俗,之所以形成前述三教皆参预其创造与发展的复杂局面,陈寅恪的正确观点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解秘的钥匙。反之,妈祖信俗也为我们理解陈寅恪理论的深义,提供了一系列的最佳典型例证。一方面,是来自印度但是至唐宋时已经相当中国化的佛教,通过参预源于中国的妈祖信俗的创造与发展,使自己变得更中国化和通俗化;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则仍然在坚持本民族及本教地位的情况下,仿照和吸收了佛教及另一教的一些形式与方法,创造出具有一定的异教色彩,但又确是本国本教所崇奉的女神。下面,就分别对一些例子作专题讨论分析。

三、三教同预妈祖信俗例析

(一) 儒家政教对妈祖的尊崇及祭礼

宋代新儒学乃儒学自魏晋衰落以后的一大复兴,如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指出:“……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④从宋初名相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便已揭开了以新儒学为主导的宋代政治学术新局面。故此,妈祖能从小岛渔民所崇拜的偶像,变为朝廷所钦定尊崇的保国安民的女神,主要就是得力于儒家士大夫官僚们的大力倡导。属于儒家政教系统的拜神自有一套异于佛道二教的祭仪、祭品以及祭器。现征引有关文献证据举例略析如下:

(1) 宋绍兴十四~三十年(1144—60),陈宓撰“白湖顺济庙重建寝殿【上梁文】”云:

……伏愿上梁之后,神人安妥,年谷顺成。无风鱼之灾,士有云龙之庆。春秋载祀,来千里之牲牢,亿万斯年,报九重之宠命。

⑤

今案:查陈宓传载《宋史》卷四〇八,其人乃理学大师名儒朱熹之入室弟子,自少受朱熹器异。后历任地方及朝官,常兼任儒家官学及私学之职掌,在儒学界很有声望,遗著有《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抄读》等。

后被追赠为“直龙图阁”。故其集称《龙图陈公文集》。上引文中的“春秋载祀，来千里之牲牢”，表明对妈祖的祭礼是儒家传统的用家畜牺牲来献祭。

(2) 宋绍熙三年(1192)，楼钥撰“兴化军莆田县顺济庙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封灵惠妃【制诰】”云：

敕：明神之祠，率加以爵。妇人之爵，莫及于妃。倘非灵响之著闻，岂得恩荣之特异。具某神壶彝素飨，庙食愈彰。居白湖而镇鲸海之滨，服朱衣而护鸡林之使。舟车所至，香火日严。告赐便蕃，既极小君之宠；祷祈昭答，遂超侯国之封。仍灵惠之旧称，示褒崇之新渥，其只朕命，益利吾民。^⑥楼钥也是著名的儒家文士官僚，其记载于《宋史》卷三九五。今观上引楼氏为皇帝所撰封妈祖为“灵惠妃”的敕文，是站在儒家的政治宗教立场上，代表皇帝向妈祖神发出诰命的。目的是要妈祖继续为效忠皇命、保国安民而显灵。

(3) 刘克庄《到任谒诸庙之一——谒圣妃庙》云：

某持节至广，广人事妃，无异于莆。盖妃之威灵远矣。某，妃之邑子也。属时虞，惕然恐惧。妃其显扶馭相，使某上不辱君命，下不貽亲忧，它日有以见鲁卫之士。妃之赐。敢告。^⑦

今案：刘克庄曾就学于名儒真德秀，观上引之祷祝文，向“圣妃”（妈祖）所求为使自己“上不辱君命，下不貽亲忧，它日有以见鲁卫之士。”纯从儒家的忠君孝亲传统观念出发，可谓儒家官僚士大夫个人拜妈祖的一个典型事例。

(4)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封《护国明著天妃诏》云：

制曰：惟昔有国，祀为大事。……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尔为护国明著天妃。……尔其服兹新命，以孚祐我黎民；阴相我国家；则神之享祀有荣，永世无极矣！^⑧

此诏令表明元室继承发展宋朝的政策，对天妃（妈祖）的进一步尊崇，仍是属于中国历代皇朝的祀神传统，目的依然是要神继续承

担保国安民的责任。

(5) 至顺二年(1331)柳贯撰《敕赐天妃庙新祭器记》云：

……遣省臣率漕府官僚，以一元大武，致天子盛祀之命，荐于天妃。得吉卜而后行。……将祀之夕，会平章政事易释董阿公，入觐道吴，因请公莅荐裸，翼日公齐沐入庙，跪奠惟寅。顾见尊罍笾豆，践列参差。……公奏事次，请更造天妃庙祭器如式，以昭神贶。……新制祭器为品十二……^⑨

上文中的祭仪、祭品以及祭器，都是儒家传统那一套。所谓“一元大武”乃儒家所指献祭用的一头牛，典出《礼记·曲礼》下云：“凡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而“裸”、“奠”都是儒家的祭仪，指以酒食献祭。而“尊、罍”乃盛酒之祭器，“笾、豆”乃盛果品肉食之祭器。为天妃所新制的祭器共有十二品，可见其是按儒家有关礼制而设。

(6) 至正十三年(1353)周伯琦撰《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云：

……按礼曰：圣王之制祭祀也，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又曰：有天下者祭百神。祈报之道，祀典所崇。惟天惟大，而海拟之，惟海大而神司之。尊以天妃，崇莫并焉。……^⑩

以上所引“礼曰”之文，原载于《礼记·祭法》。原文曰：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由此可见，由帝王官府所倡导的妈祖祭祀，其主流本属于儒家政教的礼治体系的传统。

(二) 道佛二教对妈祖信俗的参预和发展

道佛二教对于异教之神灵偶像，向来便有既排斥又吸纳的两种倾向，只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在帝王的兼容并蓄的主流政策调控下，宋元以后道佛二教互相吸纳、互相渗透日趋普遍，而且两教对儒家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两教也有把儒家神化的人物吸纳到本教的寺庙，或者直接参预或代替儒家官僚士大夫建造或管理有关寺庙。例如，关羽本

为忠义化身之儒将而受历代帝王官府所代表的儒家礼教所推崇。^⑪但相传自隋天台智者大师推崇关羽为佛教的护法神之后,中国也就有很多佛教寺院把关羽请来充当守护神了。道教对关羽与佛教不同之处,就是可以把关羽作为单独崇拜的一尊神,既可在道观中单独设一关帝殿,也可单独建一属于道教的关帝庙。当然,也有本属于儒家的关圣庙而归道士或道徒管理。又如观音,有不少研究者都先入为主地只说观音是属于佛教的。但认真深入分析,便知宋元以来的观音主要分属三个系统:其一,是属于中国化的佛教观音,由原来的印度男性形象变为中国的女性形象。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终究仍在佛教的系统内。其二,是属于道教系统的,在道观中享有专殿供奉,具有原非印度佛教观音所有的神通和功能,如送子等。目前在香港,多有把佛及观音请进道观供奉的现象。在道观中的佛及观音,显然已不能说是佛教的,只能说是属于道教系统的。其三,是属于非佛非道的其他民间宗教系统,由非佛非道的其他民间宗教人士建立和掌管的庙堂供奉。例如,香港、澳门等地区的一些观音庙即属此类。

儒、道、佛三教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一个典型就表现在妈祖信俗的发展演变中。早在元代的史料,便有道佛二教之人参预儒家官僚主导的崇拜妈祖的活动工作中。由道士参预儒家主持的祭祀,这在《元史·祭祀志·岳镇海渚》中有明确记载。原文如下:

岳镇海渚代祀,自中统二年始。凡十有九处,分五道。……道遣使二人。集贤院奏遣汉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中统初,遣道士或副以汉官。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帝谓中书省臣言曰:“五岳四渚祠事,……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祠事者……”^⑫

虽然有关天妃的祭祀是另外记在《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内,只说有关祭祀由“平江官漕司及本府官用柔毛酒醴便服行事”。^⑬但依上引“岳镇海渚”之例,可推知妈祖天妃之祭祀,亦可以有非儒家官僚的宗教之人参预。因为正如元人程端学所说:

“(对天妃的)岁时遣使致祭,牲币礼秩,与岳渚并隆,著在祀典。”^⑭今试举若干例证于下:

(1) 至元二十七年(1290)宋渤撰《顺济圣妃庙记略》云:

……宋咸淳中,三山陈珩提举华亭市舶,议徙新之。属其从事费裕经画,礼致道师黄德文奉香火。……^⑮

上文的“道师黄德文”当是被礼聘为掌管香火道教大师。

(2) 明成化十七年(1481)丘潜撰《天妃宫碑》云:

……京师旧有庙,在都城之巽隅大通桥之西。景泰辛未,住持道士丘然源援引南京例,请升为宫。……^⑯

妈祖庙或天妃宫由道士掌管,至明代当为相当普遍的现象。自永乐七至十年之间(1409-12),已有道教中人所撰《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行世。^⑰大陆现存的妈祖庙天后宫仍有不少是由道教掌管的。^⑱台湾有关妈祖天后的庙宫也多由道教中人掌管。而李露露说:“台湾鹿耳门妈祖庙、赤嵌天后宫等处,均由僧人主持,世代相传。”^⑲这大概只是根据一些旧文献记载而作的判断,至少目前鹿耳门的妈祖庙都是由道教或世俗之人掌管,并无僧人预事,则为本人亲访所知也。

(3) 开庆元年(1259)李丑父撰《灵惠妃庙记》有“守僧与祀”一语,^⑳表明其时不但有佛教僧人为天妃守庙,而且参预了该庙对天妃的“血食”之祭祀。又泰定四年(1327)黄向撰《天妃庙迎神曲》云:“先是,因前代之旧,寓祠于报国寺庑下”。^㉑至正十三年(1353)周伯琦撰《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云:“守者复奉神象旅寄天宁寺”,“时督工者,天宁寺沙门大明孜”。^㉒约至正十五年(1355)危素撰《河东大直沽天妃宫碑记》提及先后由吴僧庆福、智本及福聚等人主持和维修扩建。^㉓由僧人住持妈祖庙或天后宫,必然要面对一个矛盾,就是佛教的素食戒律与妈祖的牺牲血祭的冲突。结果无非三种:其一,是容许矛盾存在,僧人自持素食,任由他人以血肉祭品拜神。其二,是

僧人受妈祖的祭品影响,放弃素食之戒。其三,是妈祖受僧人的控制,只能享受素食之供品。至于其他与妈祖崇拜相关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占卜打卦求签等方术,亦随之进入这类僧人住持的佛寺与妈祖庙,产生同样的矛盾共存或互化的情况。

(4) 在澳门的妈祖庙及天后宫,情况也相当复杂。如现在的妈祖阁庙,据说初名天妃庙。^{②④}该庙很早就由与普济禅院有关的一个宗派的和尚住持。^{②⑤}而且现在仍由普济禅院的方丈释机修兼管妈阁。又莲峰庙内设天后殿,^{②⑥}则是佛教兼容奉妈祖的另一方式。至于其他天后古庙、天后宫、关帝天后古庙以及望厦康真君庙内的天后圣母殿等等,则是属于儒、道或其他民间宗教信仰系统的遗传。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妈祖信俗起于民间,而倡行于朝廷官府,主导于儒家礼祭,而分行于道佛以及其他民间宗教。因此,其源流演变异常错综复杂,非一篇小文所能完全讲清。本文只是想确定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关妈祖的信俗历来就是任人参预,随人发展的,并无某人、某教予以专利垄断,更无所谓正邪真伪之争。因此,我们对于具体的

妈祖或天后等等,只能根据其主持者及崇拜的方式等来具体分析判断其性质。决不能先入为主地断言妈祖是“非佛非道的神。”简而言之,在佛寺里的妈祖就是佛教的神,在道观里的妈祖就是道教的神,如此类推,当无误会。

(承姜伯勤先生提供《妈祖信仰之研究》,及郑炜明先生提供《妈祖信仰》予本人作研究参考,在此谨表谢意!)

①⑧⑨见《妈祖信仰》41、43—44、4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

②③④《金明馆丛稿二篇》250—251、251—252、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转引自李献璋《妈祖信仰之研究》(资料篇)4—5、5、9、14、24、28、17、14、44、34—38、10、21、28—29、31页,日本东京泰山文物社,1979年。

⑩黄朴文《关公崇拜与儒学文化》,载《齐鲁文化》1994年1期。

⑫⑬《二十五史》第9册74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⑭⑮⑯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6、16—17、7页,澳门基金会,1994年。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郭 林

[编者按]“教育储蓄”办学,是在我省深化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它的提出和初步试验,体现了广东教育工作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胆探索办学新路子的创造精神。这一办学新形式涉及教育投入体制、教育经营管理体制及运作机制等一系列改革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人说它是“教育投资体制的重大改革”,对我国贫困的教育将引入巨大的“造血功能”;也有人持怀疑看法,还有人从经济、法律及政策可行性上提出了许多问题。这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试验,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回答。为此,本刊与广州现代教科中心在1995年7月28日共同组织了一次有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者参加的关于“教育储蓄”办学的专题讨论会。本期编发这次讨论的论文两篇,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教育储蓄金”收费方式 是有效增加教育投入的新路子

□陈忠联 吴颖民

谢非同志在1994年11月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代表省委、省政府郑重宣布,要把广东建设成为教育强省。这是广东再造新优势,迈向21世纪的战略决策。

把广东建设成为教育强省,关键是要发挥广东经济的优势,从教育投入的机制上寻求新的思路,在筹措教育经费上实行“财税费社产基借贷储”并举,开源节流并重的政策,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使教育投入既有“输血”功能,又有“造血”功能。为教育的超前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源。我们认为,普遍推广“教育储蓄金”这一独特的收费方式,是有效地增加教育投入的一条新路子。这种收费方式,用家长为子女的教育专项存款利息支付学生在校费用,学生毕业或离校时,学校将其存入的本金全部退还给家长,但不再向家长支付利息。“教育储蓄金”的存款标准是按各县、市教育部门当年规定的学校收费标准的10倍,在年度学校

交费时一次性存入县、市教育基金或政府规定的部门。“教育储蓄金”的收费方式可以增加教育投入,因为“教育储蓄金”能集中家长的闲散资金,以巨额资金投入经营,其产生的经济规模效应,能大幅度提高经营利润。简单地说,投资1000元所产生的利润率与投资10亿元所产生的利润率是显然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公立学校推广这种收费方式,既无大的风险又有丰厚的利润,因为公立学校不用拿“教育储蓄金”来投资建校;而采用“教育储蓄金”收费方式的民办学校,要花40%到60%的“教育储蓄金”的本金来投资建校,每年还要用剩余的资金的20%利润拨给学校作为日常开支。例如我省中、小学生的收费每个学生平均一年(两个学期)应收费(杂费)为200元,改为“教育储蓄金”收费方式的话,则应存款2000元;全省有1200万中小學生,共可收集到240亿元的巨额资金。倘若资金的年回报率有20%,除了可以拿出24亿元拨给学校作

为学生费用外,还有24亿元用作全省的教育投入,这笔投入相当于1994年我省教育总投入的四分之一。1994年全省教育总投入为94.62亿元。^①退一步说,考虑到我省还有部分地区相对比较贫困,不宜采用“教育储蓄金”的方式交费,哪怕只有600万中小学生采用“教育储蓄金”的方式交费,则每年全省仍可增加12亿元的教育投入。这该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教育投入啊!(到1994年底,全省各地筹集的教育基金总额才13亿多元)。又如广州市的学校假如规定每个学生的应收费(杂费)为每年150元,代收费(书本费、服装费等)为200元,共计350元,广州市目前有100万学生,每人按存入“教育储蓄金”3500元计算,可筹资35亿元,这35亿元投入广州大都市的建设,一般地说可产生20%的利润,这样每年可获得利润7亿元,除拨给学校10%,政府还有10%(3.5亿元)的利润用来增加教育投入。这种收费方式,对于资金匮乏,投入不足的教育事业来说,无疑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新路。

那么,家长是否能够承受和接受“教育储蓄金”这种收费方式呢?我们认为,有条件的家庭可将应收费和代收费都采用这种方式,也可将应收费采用这种收费方式,代收费采用原来的交费方式;没有条件的仍按原收费方式。根据广东省统计局1995年3月15日发表的统计公报,1994年全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587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82元,城镇职工工资平均7104元,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40.39亿元,人均存款4000多元。我们认为,从全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和存款情况看,学生家长给孩子上学一次性存入2000元左右的“教育储蓄金”是可以承受得起的。况且学生毕业时将本金退还,所消费的只是利息,而家长将这笔钱存入银行,第一年能够支付子女上学的杂费,第二年的利息就未必能够支付子女上学的杂费了,因为我国通胀率一般高于银行居民存款利息。家长一次性存入一笔“教育

储蓄金”,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中学从初一到初三,从高一到高三,不用拿钱交费,这样可以使家长消除对学校收费涨价的顾虑,并且得到实惠,而政府则可以利用经济规模效应来消化因涨价所增加的费用。政府可根据不同地区采取存20元、200元、2000元不等的标准收取“教育储蓄金”。所以,只要不是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的地区都可实行这种收费方式。

实行“教育储蓄金”收费方式是否违反国家金融政策和收费规定?根据国务院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只要是政府行为的教育集资,这是允许的。广东省政府1994年66号文《广东省教育收费管理条例》已将教育储蓄金列为教育收费的方式之一,具体标准由物价部门和教育部门核准。因此这种收费方式完全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在运作上,政府可将这笔“教育储蓄金”用在急需上马而经济效益好的项目上,如修高速公路、建公路桥、旧城改造、投入大规模的汽车工业等,也可交银行运作。

“教育储蓄金”的收费方式是教育与产业结合的一种全新探讨,也是教育需求、经济规律、社会心理相结合的产物,它使教育收费自身具备了“造血”功能,一改过去等待“输血”维持的窘境,为增加教育投入提供了新的途径。

我们建议政府组织教育、金融、物价、法律、心理学专家一起调查研究,论证这种收费方式是否可行;也可在某个经济不发达的县试点,两种收费方式并存,由家长自愿选择,取得经验后再总结推广。我们相信,在公立学校推广这种“教育储蓄金”的收费方式,必将有效地、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投入,为我省早日建成教育强省作出重大贡献。

1995年3月18日于广州

①见广东省统计局《1994统计年鉴》

作者单位:英豪学校

责任编辑:陶原珂

教育投资入股：

教育大投入与大发展的新选择

□《教育产业与教育市场研究》课题组（李季执笔）

建立教育的共同投资体制就是要形成一种全社会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参与教育投资、共同承担教育经费、共同分享教育投资利益的多主体、多层次教育投资格局。这种投资体制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投资主体和投资来源：（1）以地方政府和国家企业集体为投资主体的财政性拨款；（2）以社会公众、受教育者家庭或个人为投资主体的教育投资入股；（3）以教育部门和学校为主体的教育产业收入；（4）以社会团体或个人为投资主体的社会捐资、集资办学。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财政拨款”、“教育产业”和“捐资集资”、“投资入股”四大渠道的较理想比例结构为4：1：1：4。按1994年的理想投资标准，财政性拨款应为15.5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22.17%），教育投资入股15.5亿元，教育产业和社会捐资、集资合为7.76亿元。前面三种措施，笔者已有专文论述，以下着重探讨教育投资入股问题。

教育投资入股是指以发行教育股票（或债券）形式筹措教育经费的一种形式，是把社会闲散资金引入教育投资的一种手段。教育投资入股者既是投资主体，又是利益主体，是教育股权或学校产权的当然拥有者。教育投资主体可以是政府和教育部门及所属企业，可以是受教育者的家庭或个人，也可以是学校教师或社会公众。教育投资入股实行“谁投资谁受益”、投资与效益相挂钩的原则。投资主体享有以其投入资本的多少来取得部分效益（包括教育消费享受和教育经营所获利润）的权利和剩余索取权，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在操作意义上，教育投资入股有两种基本形式：教育发展股和学位股。教育发展股以股份形式引入教育投资来开发、经营教育产业或利润较丰厚而又急需上马的基本建设项目，如黄金地段校产校舍开发、开办现代化学校、组建教育产业集团、修建高速公路及城市改造项目等。学位股以学位信托形式入股，信托金用作教育经营或利润较大、风险较小的商业贷款和投资，以其利润或利息部分来维持学位信托股持有者子女在学期间的教育消费（主要是学杂费）。

教育发展股的具体操作方法：（1）组建教育企业集团公司，开发具有优势的教育产业及项目，如教育出版物、学生餐饮与服装等市场广阔的项目。教育企业集团隶属市教委，以保证其运作的宏观调控性和规模效益。（2）向社会公开发售教育发展股票或教育债券。（3）所筹得资金用作效益明显而又急需上马的教育产业开发项目或社会基本建设项目。

学位股的具体操作方式：（1）建立教育（学校）学位信托制度；（2）确定各级各类学校学位信托金的标准及学位数。信托金标准依据学生当年在学的各种费用（主要是学杂费和代收费），学校教育质量及办学条件、规模、档次及社会生活水平情况等综合因素来确定。计算公式为：学位信托标准=学生当年在学人均费用×10至15（10至15的等级取舍据学校等级类别和社会生活水平情况而定）。

根据这一公式，广州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约140万人，年人均在学费用为

1000元,学校等级平均值为12。即一个学位股的信托金额为 $1000\text{元} \times 12 = 12000\text{元}$ 。按此计算,全广州市可收取学位信托金为 $140 \times 12000 = 168\text{亿元}$ 。将此168亿元资金投入教育经营、商业贷款和投资或城市建设工程。以20%的利润率计算,可得33.6亿元。其中一半用作学生在学费用,另一半用作教育投资。即每年可增加16.8亿元教育经费。有这样一笔巨额教育经费的补充,再加上政府财政性拨款和教育产业收入与社会捐资集资办学三大渠道若能按4:1:1的比例投入,“以大投入促教育大发展”的战略构想可望成为现实,教育现代化可望如期实现。

据广州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状况、生活水平,以及我们对广州市2000多名不同阶层及收入水平的市民的抽样调查等情况看,实行教育投资入股是必要的和可行的。随着广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战略目标和方案的制定,科教兴市、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市是一条必由之路。教育在广州社会经济发展中战略地位的确立,唤起了市民对教育发展的关注和支持,也激发了社会对开发和投资教育产业与教育市场的兴趣和信心。在我们的调查中,有占70.43%的市民表示赞同通过开发教育产业和教育投资市场来促进广州教育的迅速发展。

以受教育者家庭或个人为投资主体的学位股是解决教育投资不足问题的一种新选择。第一,学位股的主要运作原理是把市民(主要是家长)闲散的资金或消费引导到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上来。由于学生数量大,能筹集到巨额资金用作经营,从而产生规模效益,以获得比银行利息更高的经营利润来消化通货膨胀的损失和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第二,从受教育者家庭的经济情况看,学位股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据统计,广州市1994年人均年生活费收入7000多元,至1995年六月份城市居民人均存款12639元。按一个学位信托股12000元标准,大部分家庭(包括核心家庭及一般收入水平以上家庭)完全有能力负担一个子女的

学位股金。况且这笔学位信托金消费的仅是其利息部分,子女受教育期满后可退回本金或可转让学位。第三,从家长对子女教育消费、教育投资观念和意愿上看,学位股有较强的心理承担力。据调查,78.5%的家长认为“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是必要的、应该的”。其中68.6%的家长认为子女教育投资可占家庭年总收入的10%—20%,34%的家长在存款中有意识地考虑了子女受教育的费用。第四,家长普遍有“希望通过家庭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来保证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的意愿和教育需求。79.18%的家长明确表示愿意多负担子女的教育费,但学校必须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保证孩子的全面发展为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学位信托制度的实行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可行的。当然,学位股的推行,也受到部分家长的反对。阻力主要来自对“免费义务教育”、“教育平等”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在我们的调查中,有32.4%的家长认为,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家长不应该承担教育费用。所以,从义务教育的性质来说,学位信托制度应当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要增大学位信托制度的可行性,必须首先做好市民教育消费观念、教育投资观念的引导工作。

为使这一投资形式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应的配套措施。

1. 建立多元化办学新体制和多元化教育(学校)产权体系。

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形成和建立是广州教育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由国家包揽办学的单一办学体制不可能产生教育(学校)产权多元化和公众教育投资入股的客观要求,只有形成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多元化办学,包括政府办学、社会办学、企业办学、集体办学、个人办学、与境外合作办学等格局,教育(学校)产权多元化才有基础,公众教育投资入股才能成为社会的客观需要和市民的自觉行为及教育意识。

2. 建立教育投资入股的操作体系。教育投资入股能否顺利实施,除了取决于教育行政决策及市民意愿外,最关键的是有没有

规范化、专业化的运行机制和操作体系。教育投资入股是教育投资走向社会化、市场化的交汇点、结合点。因此,一方面,作为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要给予有关政策上的支持和保护,特别是在金融政策上给予更灵活的政策倾斜;另一方面,作为教育投资入股的组织和实施机构,要切实研究国家及地方的经济及金融政策,尽快建立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需要相适应和与教育投资入股制度相适应的操作体系。

3. 建立教育投资效益回报机制和风险回避机制。教育投资与教育效益回报相统一是实行教育投资入股的重要原则,是教育投资主体的意愿和投资信心之所在,因此,要研究和建立教育投资效益回报机制和风险回避机制。(1)建立高效益的教育企业集团,在教育资金经营运作上保证较高的利息回报率和减少投资风险。(2)建立各级各类学

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监督与回报机制。学位股投资者要求回报的投资效益,最根本的是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以保证子女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质量回报机制的建立较之经济利益回报机制的建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迫切性。(3)建立教育投资入股风险回避机制。公众教育投资入股基金含教育发展股及学位股基金的经营与运作,包括资金投向、投资结构、经营项目等方面,要尽最大可能将投资风险减少到最小程度,并按一定比例(10%—15%)将部分资金存入银行为减少投资风险保障基金,以增强公众对教育投资入股的信心。(4)建立教育股票交易市场、股权转让市场,真正使公众教育投资入股走上市场化,规范化、社会化的轨道。

作者单位: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中国抗战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页

——抗战初期广州文学活动的一个轮廓

□ 邓国伟

抗战初期的广州文学，从抗战爆发（1937年7月7日）至广州沦陷（1938年10月21日），其来龙去脉，可以前后伸延而分三个发展阶段来描述：一、抗战爆发前后广州文学的基本态势；二、从《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1938年1月1日）起至广州沦陷前夕，广州作为全国战时文学中心之一的情形；三、沦陷后在粤作家的走向和文学走势。这一时期的广州文学活动，乃是中国抗战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广东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但直至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研究成果还非常少。在现代文学史著述中，甚至在《中国抗战文艺史》的专书中，都还留下空白。这大抵是由于资料缺乏，也由于这个研究课题有较强的地域性，有待于广东的研究界去作出努力。而这段被战火硝烟笼罩住的历史，其迁流变幻性的表现也实在不容易做出条分缕析的描述。

（一）

30年代初，广州文学在全国左翼文学运动大潮影响下迅速发展起来。尽管那时上海流行的多种文学形态在广州都有追随者，但那时的文学青年多是在抗日救亡形势的推动下投身文学队伍的，从1932至1933年文学昂奋的时期看，广州的文学运动主要是左翼文学运动。1932年，广州有“普罗作家同盟”（又称“广州文艺社”）和“新诗歌会”的成立；1933年3月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这时期的进步文学团体还有“绿天社”、“火

花社”、“一般艺术社”、“抗日剧社”、“前卫戏剧作家联盟”等等。出版的文艺刊物相当多，有欧阳山主编的《广州文艺》、《光荣》，饶彰风、杜埃主编的《天皇星》、《南音》，温流主编的《绿天》，鸥外鸥主编的《诗群众》，潘皮凡主编的《新文艺评论》等等。这些都显示了广东文学的新的生机，但其时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这些组织及其活动大都难以坚持。欧阳山论及《广州文艺》的文章说：“事实上到了一九三三年八月——恰好满了一年，我的这种工作就停止了。我们的文学活动被认为政治性质的活动……于是同伴们逃的逃，死的死，坐牢的坐牢，草明也离开广州到上海去。只留下一大批充满热情的穷学生在广州……”^①至1934年1月，“广州文总”被破坏，左翼文学运动大都转入秘密状态。

直至抗战爆发前夕，广州的文学运动才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其标志是1936年10月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艺协”）的成立。这个协会是在20个文化团体联合组成的“文艺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筹备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协会下设诗歌组、小说组、戏剧组、歌咏组、版画组、美术组等，广泛地展开了抗战文艺活动。其中尤以诗歌组的活动最引人注目。有温流、黄宁婴、陈芦荻、陈残云、李育中、鸥外鸥、黄鲁等一群年青的诗人活跃在诗坛上。至1937年初，这些年青的诗人们成立了“广州诗坛社”，出版《广州诗坛》和《诗场》等诗刊。抗战爆发后，蒲风和雷石榆回到广州接手编辑，改刊名为《中国诗坛》，使广州诗歌界更与全国

抗战文学大潮汇合。戏剧方面,其时有由广东文艺家协会、广东戏剧协会、前锋剧社主办的《抗战戏剧》月刊出版。艺协剧团也有大量抗战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活动。至于诗歌方面的成绩,茅盾于1938年初曾撰文评述说:“在广州,最近出现了不少歌咏这大时代的诗歌。单举我们所读过的,已有蒲风的《抗战三部曲》,黄宁婴的《九月的太阳》,青鸟的《奴隶的歌》,雷石榆的《国际纵队》,零零的《时代进行曲》,温流的《最后的吼声》,克锋的《赴战壮歌》,都凡七种,而散见于各报各定期刊尚未结集单行者,或已结集而未出版如雷石榆之近作《华南我保卫你》,尚不能计数。”^②

以上可见广州文学在抗战前后自身发展和繁荣的大致情势。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沦陷,迁徙性的文学大量投入广州,则正由于有了这个基础而使广东文学与全国抗战文学迅速合流,并有了意义深远的更大发展。

(二)

上海“8·13”抗战之后,北方和上海的作家陆续向内地转移。因那时国民党南京政府顺沿长江迁都重庆,在武汉作一时期的停留,武汉便成了抗战初期的“战时首都”,也自然成了文艺上的中心。武汉之外,作家们选择的另一个转移路向便是广州和香港。香港在那时还几乎没有形成“文坛”,选择香港主要出于战时避难的考虑,而广州既已有较好的文学发展的基础。自然地就成了战时文学的一个重要据点,为中国抗战文学提供了一个缓冲、持续和继续向前发展的环境。自1938年初开始,大批全国性的刊物转移到广州出版,或在广州创刊发行。大批著名作家到粤,或穿梭往来于武汉—广州—香港之间,为抗战文学活动奔走。这使广州文坛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壮美的文学景观,因而也成就了与汉口相呼应的战时文学中心的地位。

先看看文学刊物方面的情况。《救亡日报》是外地刊物迁移到广州的先行者。该报

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一直到广州沦陷前夕,在广州出版的时间大约十个月。这是抗战时期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在广州复刊后,该刊与广州文学界关系甚为密切,夏衍和郭沫若都直接参与广州文学活动。该报复刊当月,即登载陈残云诗作《火的赞美》《中国在歌颂中》和《致陕北诸友》三篇,芦荻诗作《我仰望你壮大的翅膀》一篇,黄鲁诗作《祈战的歌》一篇。在十个月中,《救亡日报》的副刊“文化岗位”是广州作家大量发表作品的一个阵地,主要作者有蒲风、陈残云、芦荻、周钢鸣、林焕平、司马文森、雷石榆、李育中、可非、克锋、林英强等等。该报又不断报导广州文学活动的消息。是年7月20日并曾以“附刊”的形式出版广东文学学会主编的《抗战文学》专刊,载有欧阳山、草明、李育中、钢鸣、芜军等人的文章。

《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汇集了全国文学界精英的影响最大的全国性的文学期刊,茅盾主编,1938年4月16日在广州创刊和印刷发行。其时茅盾在香港居留(4月至10月),负责该刊的编辑工作。茅盾对广东作家指导甚多,丘东平、于逢、林焕平等其时都曾直接得到过他的扶助。在这个著名的刊物上,广州作家以大量高水平的创作展现了与全国文学界融成一体成熟的风采。有不少作家的起步与成名,都与这份刊物有关系。在这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主要有杜埃、钢鸣、李育中、林焕平;发表小说的主要有欧阳山、草明、华嘉、于逢、黄谷柳。报告文学方面影响巨大的是司马文森多期连载的《粤北散记》;诗歌方面则有陈残云、黄宁婴、征军、韩北屏等人的作品,陈残云早期最优秀的诗作大致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剧本方面,欧阳山用广州方言写对白的三幕剧《敌人》也在该刊分三期连载。除了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用“文阵广播”的专栏登载作家来信,发布作家信息。广州作家就有蒲风、草明、陈残云、雷石榆、李育中、于逢、胡危舟、司马文森、华嘉等人的信件在这刊物中得到保存,至今成为非常宝贵的史料。

另一著名刊物是巴金主编的《烽火》。这原是30年代中期上海几个大型文学期刊(“文学”、“文丛”、“中流”、“译文”)在战时的联合刊物,自第13期(1938年5月1日)起迁广州出版,改为旬刊,出至10月停刊。在广州共出8期。该刊从第15期起登载广州作家的作品,并不断报导广州情形。如署名“燕军”的《广州受难了》及时报导了日机轰炸广州的惨状。在这刊物上发表诗文的有征军、芜军、司马文森和李育中等。

同时在广州出版的还有靳以主编的《文丛》半月刊。此刊与广州作家的关系相对较少。此外,广州原有的刊物也不少,以诗歌和戏剧刊物较为活跃。此时期由蒲风和雷石榆主编,而实际上由黄宁婴等人主持编务的《中国诗坛》进入最兴盛的时期,社员发展到一百多人,刊物有寄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诗人的稿件。在广东本土,则梅县等地曾另设分社,可见一时之盛。

(三)

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之后,广州于稍后成立了“文协广州分会”。据《抗战文艺》一卷四期载,当时“文协”由王平陵、楼适夷与正在广州的夏衍联系,“并指定钟天心、胡春冰、祝秀侠、夏衍为筹备委员”,筹组成立广州分会。分会成立后,设立“文艺通讯员总站”,举办“五月文艺通讯员竞赛”,积极开展文艺通讯员活动。据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称:“最先建立文艺通讯员组织的是广州文协分会,在它还称‘广东文学会’时即开展了这种活动,不几天内就发展了三四百个通讯员。”文协广州分会的机关刊物,是《战时文学》,由胡春冰主编。文协分会还组织了各种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其中有《文艺阵地》一卷第11期记载的“献金文艺晚会”。“‘献金文艺晚会’举行于八月十八日晚上,广东文学会号召文艺工作者在伟大的广州各界民众献金的一周间‘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售券所得,即作为献金。”晚

会上演出了夏衍特为这活动创作的独幕剧《赎罪》,并有“欧阳山创作剧本朗唱——就是《敌人》三幕剧的一段”;“这样的‘文艺晚会’在中国是第一次,无论在献金运动上,在文艺运动上,都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文协分会还经常举行文学座谈会,讨论理论和创作等问题。

此外,中国诗坛社的活动贯穿了这个时期^③,此时尤其活跃。据1938年2月24日《救亡日报》报导,《中国诗坛》发行量大增,拟“征求一千册基本定户”;在诗坛社同人中,组织诗歌朗诵班和诗画展览;“凡遇纪念日或示威巡行全体社员参加”;“必要时在报上”出特刊。据陈残云和陈芦荻等人回忆,那时郭沫若和巴金均曾与中国诗坛社成员一起,参加过游行活动。雷石榆《“诗歌日”的回忆及展望》(载《战歌》二卷一期)记述1938年5月24日中国诗坛社的一次诗歌朗诵活动:“在本社的厅里,各人练习着朗诵自己的作品,或忙着把短诗写上几十幅漫画上,……我们完毕了播音演说和朗诵,就开始把诗画钉贴在会场的四壁,这时冒雨而来的来宾比本社同人还多”。在此之前,中国诗坛社的朗诵活动早已举行过多次,故1938年3月17日《救亡日报》上又有朱白水的文章说:“看了第九期的《七月》里面的登载,知道了汉口和延安才在举行第一次,但在我们广州,却已听过多次了。”他指出当时最受欢迎的朗诵节目是胡危舟朗诵黄宁婴的《中国,坚韧的弹簧》。

有关来粤作家在广州活动的记载主要起自1938年。是年1月2日,郭沫若出席了在广州太平餐馆举行的新年文艺座谈会,中心议题是文化界统一问题及一年来文艺运动的检讨。会上,议定了筹组广东艺术工作者协会的事项。参加座谈会的有祝秀侠、林林、林焕平、蒲风、黄鲁、湛小岑、姚非厂、杨邨人、陈达人等50余人。1月4日,沪、港、粤文化界同人又在广州新亚酒店举行聚餐会,郭沫若、茅盾、夏衍都出席了这次聚会,广州作家有欧阳山、草明、林焕平等人参加。茅盾讲话后,欧阳山报告了广东文化界情况,从“党政军”、“妇联会”、“市

抗会”、一直讲到刚成立的“文教”紧张工作的情形。他又以作为主人的广东人的立场,指出广东人做事有浮燥空虚的毛病,希望南来的“文化先进”们,给广东人以援助,使之变得沉实。

在南来作家中,茅盾与广东作家的关系较为密切。是年四月,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茅盾撰文介绍由广东作家参与集体创作的中篇小说《给予者》,认为这是抗战小说中不可不读的佳作。又据《救亡日报》1938年5月4日记载:“广东文学会所办抗战文艺讲座十四日讲,定于今日下午三时在丰宁路女青年会举行,讲题为《文艺批评的建设问题》,讲者为茅盾先生。”此外,在1938年3月1日的《救亡日报》上,还有一则很有史料价值的记录,题为《文艺座谈会开会讨论战时文艺工作问题,茅盾等发表具体意见》。这次座谈会是2月27日举行的,讨论战时文艺工作纲领及文学大众化与中国化两个问题。茅盾和白薇一同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茅盾建议“广州文艺工作者与武汉的文艺工作者互相交换意见,以推进战时的文艺工作。”随后是白薇讲述她冒险从北平南来的经过。在整个抗战时期及其后,茅盾与广东文学运动的关系甚为密切,限于本文叙述范围,暂不赘说。

郭沫若、巴金、夏衍、楼适夷、袁水拍、靳以、蒋锡金、何家槐、柳倩、钟敬文等全国著名作家,同一时期也在广州的文坛上留下过意义深远的足迹。郭沫若与广州诗人有较多的交往。光从《中国诗坛》反映的情况看,他与广州诗人们一起参加过示威游行,曾为刊物撰写诗作《血肉的长城》,又曾为诗人温流的逝世撰写《悼词》云:“你的早逝,不仅是中国诗坛的损失,同时是中国抗战战线上的损失。抗敌的军号,缺少了你这位俊秀的吹手,使我们几觉着寂寞。”可以说,在抗战初期,以蒲风为首的广州众多的青年诗人,都受到过郭沫若的影响或鼓舞。巴金在广州编的《烽火》虽然还保持着上海刊物的模样,但他对广州的文学活动也是颇多关注的。他参与过广州文学青年的游行,也在刊物上发表广州作家的作品,在敌机滥

炸广州的一段艰难日子中,他撰写了《给一个敬爱的友人(三)》的文章,记下了真切的感受,并发出了深沉的呐喊。

(四)

广州10月沦陷后,上述广州文学界在广州的活动随之结束,活动地域有了变化,但仍在异地延续和发展着。

《文艺阵地》二卷四期记载道:“广州沦陷后,所有在那边的文艺工作者,大概已随大军安全退出。”这是广州作为战时短暂的文化中心已经失落的信号。其时,在粤作家大抵在经过一段颠沛流离之后,又在三个方向上重新聚集:即广东的韶关、曲江,广西的桂林和香港。

退出广州后,一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巴金、夏衍和广东文学会的黄宁婴、李育中、陈芦荻等人,取道梧州而至桂林;适夷、锡金、征军绕道到香港;欧阳山、草明、于逢、蒲风、陈残云、胡危舟、黄谷柳跟随部队,参加随军工作团,行踪甚为变幻,甚至一度有蒲风已遇敌殉难的误传。其时九二二团随军工作团团长黄显骧就曾写信云:“同工作失散的同志至今未知下落者有欧阳山、草明、蒲风、许介、唐鹰、陈其桢、黄忠惠、谭述祖八位,据传说蒲风大约是追踪温流去了。”④后来知道欧阳山、草明辗转到了桂林(1939年初到达重庆),陈残云经连县到了韶关(随后到桂林),蒲风回到家乡梅县。

韶关和曲江这时成了广东抗战文学的一个新据点。首先是戏剧活动仍很活跃。当时广州的几个话剧团体(艺协剧团、蓝白剧社、锋社)均在曲江,在粤北地区坚持演出。至1939年初,到韶关的文化人不少。据陈残云当时(2月3日)在韶关写的信说:“卅一晚曾举行一次艺术座谈会,到会人数四十余人,内分四个部门,每部推定负责人,计文艺部柳倩,漫画部新波,戏剧部赵如林,歌咏部孙慎,另负责总务三人:何家槐、钟敬文、宋寒衣。以后经常举行座谈会,及推进文化工作,打算最短期出版刊物,建立战地文化。”5月4日信又说:“刻暂寄住曲江

‘记者学会’，……曾告诉你与柳倩兄等出版诗刊《歌手》，因印刷困难，起码要到衡阳，不得不搁住。……此间文化事业颇活跃，刊物除《新华南》外，有刻在付印之《持久战》及妇新运会办的《新妇女》，书店有四间……市面亦繁盛，比往昔广州差不了多少。”⑤稍后，李育中的信描述该地文艺情况也颇为具体：曲江文协于1940年2月21日成立，“《文艺新地》即出创刊号，……经常有文艺座谈会，最近一连串讨论各部门的民族形式问题。文艺通讯运动拟把它复活，这可以与港文协遥相呼应。还有一点可喜的消息，许崇清负责的战区编纂委员会要文协派出几位作者到战地写作小说戏剧，家槐、敬文、如琳都将去，我也想补一名，大约半月后成行，这是别个战区所没有的，是一好现象。”⑥由此，我们对于曲江那时作为文学据点的情形已大致可以了解。此外，曲江那时还有文艺刊物《小战报》出版，稍后则又有芜军等人主编的诗刊《诗站》出版。

第二个走向是桂林。广州和武汉沦陷后，作家多转移到桂林。其时由广州到桂林去的作家，有不少是中国诗坛社的成员，1939年5月1日，黄宁婴、芦荻、李育中、胡危舟等人在桂林出版《中国诗坛》复刊号（新一号），至1940年12月共出6期，记录了广东作家在桂活动的主要成绩。另有周为、胡明树、婴子创刊《诗》（1939年6月），司马文森创办《文艺生活》（1941年9月），胡危舟、阳太阳创办《诗创作》（1941年6月），华嘉、周行计划创刊《大地》（未能出版，后华嘉于1942年7月创办《种子》）等。此外，陈芦荻主编《广西日报》的文艺副刊《漓水》，楼栖和紫风在《广西日

报》当记者；林林主编《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等。同时期在桂林的广东作家还有于逢、易巩、周钢鸣、黄新波等。

第三个走向是香港。据《文艺阵地》五卷一期的报导，“抗战以后，首先是几家‘外江’报纸南迁，重新在此出版”，有《申报》、《大公报》、《立报》等，另有《星岛日报》、《侨南日报》。这些报纸均设副刊，主编副刊者如杨刚、萧乾、茅盾、叶灵凤、戴望舒等多是“文协香港分会”会员。“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于1939年3月26日，主持者是许地山、适夷、刘思慕、叶灵凤、戴望舒。会刊为《文协周刊》，由袁水拍、黄绳主编。“文协香港分会”成立后，曾努力推动香港文艺界与内地文艺界的联系，发动纪念抗战的文章义卖运动，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及文艺界肃奸运动，又揭起了“推进华南通俗文艺运动”的旗帜，并发动文艺通讯竞赛，组织了香港和九龙的文艺通讯部，先后成立了惠州、台山、中山的文通支部。“文协”又于1939年6月起举办多次文艺讲习会，有力地推动了香港文艺的发展。

①《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载《抗战文艺》1941年第7卷第1期。

②《这时代的诗歌》，载《救亡日报》1938年1月26日第4版。

③我曾与陈颂声合撰《中国诗坛社与华南的新诗歌运动》一文，载于1984年《学术研究》第3期内，可以参看。

④据《文艺阵地》一卷5期。

⑤⑥据《文艺阵地》二卷10期；三卷1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中国抗战流亡文学简论

□殷国明 王 平

战争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等生活面貌,也改变人的精神,改变文学的进程,创造新的文学机遇和流向。如果说第二次大战曾经造就了一种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流亡文学潮流,那么,中国抗日流亡文学无疑是其中光辉灿烂的一章。从难忘的九·一八开始,随着日本侵略军铁蹄所到,中国一批又一批作家被迫离开故土,他们从东北到北平,从北平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又分散到西安、重庆、桂林,又从桂林到广州、香港乃至东南亚地区,如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流亡文学潮流,形成了中国一次文化大交融和大转换,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

一

中国抗战流亡文学源起于“九·一八”事变,首先踏上流亡之路的正是东北的一群作家,他们先后从东北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逃出,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一个特殊流派“东北作家群”。其中萧军、萧红、李辉英、舒群、罗烽、端木蕻良、骆宾基、孙陵、白朗等许多作家都是经历过亡省的痛苦,在长期的流亡迁徙中进行创作的。

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故土沦陷是促使他们创作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原因,而流亡生活则增加其创作的感情力度。例如李辉英就曾在1935年《丰年·白序》中谈到:“从前,我是迷恋着‘文艺作品是给人作消遣的’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总是美酒,女人——一句话,在享受上兜圈子,可是,紧跟着‘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蹂躏了我的故乡,‘一·二八’沪战,沪战的炮火又摧毁了我的学校,这使我不但要遥

领着三省亡家的头衔,同时又失去了上海求知居住的地方。我彷徨,我恐慌,我悲哀,我更气愤,终至,激起了我反抗暴力的情绪!‘醒醒罢,把你的小说笔锋改改方向不行吗?’我醒了,从昏沉的梦中惊醒了,自己这样问自己,‘你该把这种抒写闲情逸致的笔调,转为反抗你的敌人的武器!’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九·一八”之后,他很快写出了象《最后一课》那样的反帝抗日小说,表现了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同胞的屈辱生活及其反抗情绪,不久,他在丁玲的鼓励下,又写出了十万字的小小说《万宝山》,受到当时茅盾的注意。这些虽然不能算精致完美的小说作品,但其中透露出作者激愤的情感却是真实感人的,抗战期间,李辉英出的短篇小说集《夜袭》《火花》,长篇小说《松花江上》等,都带着激励抗战,颂扬民族战斗精神的激情。这种激情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迸发出来的,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识和人性的危机感,这正是东北作家群最重要的创作特色之一。侵略者的暴行,把人性、人的尊严推向了最残酷的境地,制造了血肉横飞的人生悲剧。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呼兰河边》、《狱》,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白朗的《轮下》、《生与死》等都是有一种悲剧氛围中展示人生的。在这些作品中,这种悲剧意味是实现于生和死的风水岭上,用血,用生命的毁灭,用青春的残酷烧铸的。伴随这种悲剧意识的是发自内心沉痛而又急切的倾吐和呐喊。例如,我们在罗烽的《呼兰河边》中就看到这种悲剧的情景,在侵略者的刺刀下,小牛和它的主人牧童被胡乱捉来,然后在草丛中留下自己的尸

体。在毫无声息之中，生命遭受了最大的轻蔑和戕害。作者把人生最残酷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唤起民族自救的热情。这种悲剧意识因为是在作者亲历的生活中滋长起来的，所以非常自然，而又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萧红是东北流亡作家的典型，她的大部分写作生涯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遗憾的是，一直到她逝世那年（1942），都没能够看到故乡的收复。1934年逃出哈尔滨之前，她已经尝到了流浪生活的滋味，当她后来的情人萧军第一次看见她时，她被关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冰冷的房间里，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此后，她经历了抗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悲剧的时刻：“九·一八”事变时，萧红正在哈尔滨，在这里度过了几年艰苦的斗争生活；“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争发生时，萧红正在上海，亲睹日军的侵略，于是撤到内地；紧接着日军进攻华北，萧红正好在山西临汾，不得不回到武汉；日军进攻武汉，萧红等又逃到大后方重庆；1939年初日军开始轰炸重庆，萧红又飞往香港，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萧红不久含恨而亡。在这种流亡生活中，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距离自己的家乡更远一步，都意味着心灵上一次重创。

其实，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东北作家群的雏形已出现于“九·一八”之后的东北文坛上。较之内地，西洋文化很早就由西伯利亚铁路输入东北了，由于日、德、俄等各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东北成为多种文化汇合的一个区域。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东北文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大批白俄贵族流落东北，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由于这些原因，在东北一些大城市，例如哈尔滨、长春等，是具有比较好的文化艺术基础的，已有一批文人在文坛上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些作家很快聚集起来，用自己的笔进行最后的反抗，例如萧红、萧军、白朗、舒群，还有孙陵、杨朔、金人（张君悌）、铁弦（张全欣）等。当时，他们在哈尔滨开设“明月饭店”作为作家据点，白朗主编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孙陵主编长春大同报副刊，发表一些表示抗日情绪的作品。直到后来在东北无法立足才先后转移内地，这种报刊自然而然地把一些作家联结在一起。

《生死场》的出版，把萧红的名字，也把东北作家群的气势扩展到内地的文坛。《生死场》是萧红在流亡中写成的，它携裹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掠过荒凉、沾满血迹的土地，来到了人们中间。在这篇作品中，诉诸人们感官的是死了的小孩躺在旷野的小庙前，是杆头晒着在蒸气里的肠索，是腥气，是血污构成的意象。在沉重的悲剧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日积月累的，压抑着的反抗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现实，也来自于作者本身。苦难和挫折、血光和剑影、荒漠和风雪，赋予了萧红一种男子汉的气概，赋予了她的作品一种悲壮的阳刚之美。她知道，人们经过了乞求已不再需要乞求了；经过呻吟已不能继续呻吟；经过忍耐，已无法再忍耐，要站立在世界上更需要原始和雄强的力量，需要男子汉的热血和气概。这种粗犷的雄性的气质贯串在整个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之中。萧军《八月的乡村》中的铁鹰队长、李七嫂，舒群《誓言》中的杨三愣，白朗《伊瓦鲁河畔》中的贾德，端木蕻良《遥远的风沙》中的煤黑子等都带着这种刚烈强悍的品性。

二

作家的流亡和迁徙造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次历史大流动，形成了多个临时性的文学中心。除了重庆、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香港等大都市都一度聚集了很多作家之外，桂林也在中国抗战流亡文学中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

显然，是历史给了桂林这样一个机会，使它成了一个文学名都。1938年10月，武汉告急，由京沪等地撤留武汉的作家，又分三路退往后方，其中一路顺粤汉路南下，往长沙、桂林。时隔月余，广州突然沦陷，留广州的作家纷纷逃往桂林。当年底，长沙大火，又把留集长沙的作家引向桂林。1941年，太平洋战争，上海孤岛和香港被占，沪港作家也陆续流向内地，先汇集桂林，其中一大部分蛰居下来。该二地区的出版和文学期刊跟着集中桂林。一时间桂林群英荟萃，一个文坛中心在形成，文学出版空前繁荣，虽然这繁荣也是短暂的——1944年11月，日军陷桂林，一切都化为烟尘，但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战时流徙的频繁，生

存的艰难,出版业的萧条,不可能不给文学创作造成致命的挫损。但是,作家们是绝不甘沉默的,“国家不幸诗家幸”。流亡生活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题材,赋予他们作为作家的使命感,因此也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基调。

正是这些流亡的知识分子,在抗战的特定环境下,大大地传播和普及了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学第一次和广大民众贴近起来。正是这些流亡的文人、艺术家,给桂林带来了为期六年的文学黄金时期,也给本来可能更加凋零的中国文学创作增添了一片繁荣。很多作家就是在这里创办杂志、出版丛书,创作小说,为战斗的土地呐喊,为奋战的人民提供精神食粮。例如在抗战烽火中崛起的“七月派”就与桂林有不解之缘。其主要杂志《七月》从上海、武汉、重庆到桂林,吸引和造就了一大批作家,产生了广泛的文学影响。

战争锻炼了文学,流亡也造就了作家,把他们推到了文学的前沿,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学传奇。1938年,艾芜举家从宁远辗转逃难来到山城,在此停居了五年,时年35岁至40岁。这个在30年代初就步入文坛的文学青年,此时,已是有影响的作家了,和司马文森一样,他出身贫寒,早年曾到异国他乡漂泊。

在桂林,除为《桂林晚报》担任过副刊编辑外,艾芜主要从事创作,这是抗战时期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作家”,从1939年至1944年,他每年每月有作品问世。仅写于桂林的就有小说长篇:《故乡》、《山野》、《花落时节》;中篇《我的旅伴》、《母亲》、《春天》、《打猎记》;短篇《荒地》、《冬夜》、《鞭下》、《黄昏》、《尚德忠》、《邻居》、《苦闷》、《纺车复活的时候》、《穿破衣服的人》、《老好人》、《日本轰炸缅甸的时候》、《春天的原野》等。其中,《故乡》和《纺车复活的时候》被认为是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

鲁彦在桂林的文学活动也是精彩的一章。战争爆发时,鲁彦37岁,战争胜利前夕,鲁彦44岁,然而这一年竟是一个多才作家生命的终点。他象那个时代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一样,终于未能走出黑夜的尽头。他曾是活跃在上海文坛的颇有个性化的“乡土

文学作家”兼翻译家。他有郁达夫的多情,爱自然,爱猫狗,爱孩子;他又有鲁迅的热烈,善于描写城乡各种各样的人生,尤其擅长描写乡村小知识分子及农民的心理,被称为“近代中国的典型作家”。然而,1937年,鲁彦离开上海,开始了他最不幸的流亡生活。先到湖南,为长沙《抗战日报》工作。不久赴武汉。1938年10月偕妻儿抵桂林。为解决生计,他创办了《文艺杂志》(1942年1月)。在他主编时期,这份杂志一直是当时桂林一流的文学期刊,而且是独立作家所办的独立性杂志。出了一卷五期后,鲁彦终于病重不能支撑,移交给刚来桂林的端木蕻良主编。其间,鲁彦还往返于广西或湖南教书和养病。1944年8月日军攻陷桂林前夕,鲁彦偕家由湘返桂林,终于倒在桂林医院再没有起来,死后连入敛的衣服都没钱买。鲁彦死后,他的遗孀覃英又带着几个孤儿踏上继续流亡的路。

鲁彦在流亡路上也曾留下一串风格题材迥异的、闪着才华的最后光芒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抗战有关的人和事,颂扬了投身于抗日前线和后方的军民们:短篇小说《陈老奶》、《我们喇叭》、《杨连副》、《伤兵旅馆》、《樱花时节》、《千家村》和遗著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第二部《春草》。《春草》就是他于1939年在桂林稍为安定时创作,在《广西日报》副刊上陆续发表的,可惜仅写了一半。

值得一提的还有司马文森,他的创作也是和流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流亡给予他机会和灵感,使他在创作中欲罢不能。司马文森出身贫寒,少年时曾在新加坡一带打工,饱受异国凄苦。1934年只身赴上海,加入左联,从此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以长篇小说《风雨桐江》而闻名。战争来到时,他才21岁,上海沦陷两天后,司马文森由海道乘英国船向广州撤退。同行有郭沫若、夏衍。在这期间,司马文森这位勤奋的作家,写作和发表了大量文章。著名的《展开通俗化运动》(上海《救亡日报》10.3)和《再谈展开通俗化运动》(同上10.7)作为一位当年饱尝异国苦楚的归侨作家,他深知民众切身的疾苦和文化的饥渴。正是他,很早就提出了文学的通俗化问题,此后,他一直坚持这

个主张。1939年11月17、18日，他在《救亡日报》连载长篇论文《论“文章入伍”》。配合了文协桂林分会提出的“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并在理论上加以阐述。在战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个口号确曾起过积极作用，对日后的影响更重大，这也许是出乎倡导者意料之外的。他在桂林创作的小说长篇有《雨季》、《人的希望》；中篇有《天才的悲剧》、《希望》、《转形》、《落日》、《王英和李漫》；短篇有《蠢货》、《渣》、《孤独》、《奇遇》等。他同时还是优秀的散文作家，文章风格清丽，情感丰富蓬勃，有散文集《过客》。

三

中国抗战流亡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中最精采的一章，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文学范围，它对于中国整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转型，对于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流和勾通，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首先，从文学上看，抗战流亡文学是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产生的，给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一种沉重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带有民族性，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命运感。例如抗战中兴起的历史剧创作热潮，就与这种流亡生活很有关联。郭沫若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先后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及《南冠草》等多部历史剧，并陆续在重庆、桂林等地上演，就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追寻。特别是《屈原》，之所以当时能深深打动人心，与它表现了一种与现实人们相通的感情息息相关。屈原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流亡者和流放者，他被迫流落异地，但心系祖国和人民，很容易引起当时人们的共鸣。

显然，这种悲剧性不仅来自国难，而且来自对流亡生活，异地生活的种种体验。例如残酷的人情世故，狭隘的地方主义情志，都曾给这些作家心灵上留下创痛。本来，流亡在外的作家，就象失却母亲的儿女一样更需要爱抚和理解。但是，如端木蕻良所说，流亡到内地的作家仍然没有摆脱“两重的奴隶”的处境，很多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这种难言的苦痛，这使文学中的悲剧意识更加

浓厚了。

其次，流亡文学在表现人情、乡情和民族文化之情方面，不仅拓宽了题材范围，而且，流亡生活加深了对故土故乡的怀念，也丰富了对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体验。无疑，对祖国、故乡的怀念是流亡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其中所表露的感情深度也更加深刻。另外，一些因战事流亡海外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抗战文学特殊的一部分。他们又比在国内流亡的作家多了一层苦难和情怀，所以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情感更加深厚和强烈。

第三，中国抗战流亡文学不仅促进了文学交流，而且深刻推动了新文学的平民化、通俗化，把新文学的根真正扎进了民族的土壤。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新文学平民化、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而抗日战争提供了这样一个历史契机：作家在流亡之中，也就意味着彻底走出了过去各自的文学小圈子，并且失去了过去的依赖，必然要走向社会和大众，在创作方向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抗战流亡文学在这方面往往表现得非常突出。作家奔赴前线、奔赴乡村，用通俗的文学形式来宣传和表现抗日精神，走出了一条通俗化的文学之路。这些作品在语言上和情感表达方式方面都非常贴近中国传统习惯和人民大众，因此很容易勾通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这种文学的通俗化、平民化追求，几乎表现在所有历经流亡的作家的创作中，只不过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当革命文学作家走向民间，收集和学习民间文学形式，创造大众化文学的同时，上海滩上《万象》杂志也在倡导通俗文学，促使当时言情小说向新的方向发展。

总之，中国抗战流亡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对于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本世纪产生的新文学是一个新生儿，一直在寻找自己可靠的归宿，那么，只有经过了一种流亡的磨砺，才真正成熟起来，才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说文解字》 中的“夸父”意象

臧克和

“夸父逐日”这一传说，在原本缺少系统、零碎支离的中国神话谱系中，稍具规模。所以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文史选本都予以收录，足见其影响之大。但是，传世文献原本语焉不详，而各家在阐释这一则神话传说时似乎又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一个预定指向的制约。下面是有代表性的几家：

游国恩等所编《中国文学史》：

《山海经》所载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神话，就明显地反映原始人在实际生活中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决意志。他们在劳动的经验中坚信人们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抱有克服困难的信心。①。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这个故事表现人民对勇敢、力量和伟大气魄的歌颂，对死后不忘为人民造福的崇高精神的赞美。

其中的注解有两处颇可注意：一是“夸父：人名，也是一个种族的名称。”二是“入日：太阳落入地平线之下。”

郭锡良等所编《古代汉语》：

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敢于向大自然挑战的雄伟气魄。

其中有两处注释与以上说法略有出入：一是“夸父：神话中的英雄，父，古代用在男子名后的美称。”二是“逐走：竞走，赛跑。入日：意思是追赶上了太阳。”

袁珂先生《山海经校译》则径直解为：

夸父不量力，想要去追赶太阳光，将它在禺谷那个地方捉住。他追到半途，心烦口渴，……就渴死在这里了。

上引诸说是有代表性的，也许在某一层次上是较为接近“夸父”本义的。但是，只说到夸父是在和太阳竞走赛跑等类游戏，并由此而导致“道渴而死”，总难免让人觉得这位夸父似乎有些逞勇蛮作，也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讲的自“不量力”。②

由于年代久远而逐渐流转走失，古代文献缺乏，文字繁难，书写工具不便，史前神话完整流传下来的几乎没有。《说文解字》通过种种联类，构成一种特殊的文献，保存了一些中国史前神话思维的事迹，其意义是赖以仅存的。这里试图通过《说文解字》一书中“夸”字类的联系，钩稽出保留在《说文解字》里的“夸父”意象原始。

a. “夸父”得名于“规矩”，或者说，“夸父”就是“规矩”的转语。人名来自工具之号，《说文解字》揭示了这一神话命名原则。

“夸父”特征之一是与“规矩”一词存在着相同的语源。

“夸父”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一般认为《山海经》一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秦汉时又有增删。“规矩”作为合成词使用，也是在周秦之际的文献里就已经出现，《礼·经解》：“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孟子·离娄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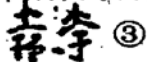
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可为例证。“夸父”、“规矩”皆属连绵词。“夸父”古音系统里属于溪母鱼部和并母鱼部，“规矩”则分别属于见母支部和见母鱼部，二者读音极为相近。

“夸父”特征之二是“夸”字所指对应于“规”。

《说文》：“夸，奢也。从大，于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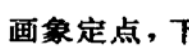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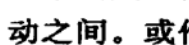
《说文》：“奢，张也。从大，者声。”

在《说文》“大部”也就是“夸”字同一部类中，从大取类，即有“大”义，例不赘。这实际上就是“同训系列”。所赖以区分具体的“大”义，就是该字类各自所从得之声，因此，“夸”字结构值得注意。“夸”字结体的历史演变情形：

 ③

从金文来看，从“大”取类，即以人体的张大体示一般抽象之大。而声符“于”其初写则比较复杂，“夸”正是从此符得声兼表义以传递“具体之大”的。“于”字在甲骨文即已习见常用，兹考察其形体传承：

 ④

徐中舒先生考释说：“于象大圆规，上一横画象定点，下一横画可以移动，从表示移动之间。或作于，为之省。”⑤

“夸”字的结体构形意义可以引申出“夸（跨）度”、“夸张”等义，至于“夸奢”之义，已属虚泛化的后起义。我们再从语音联系来看：

筭，竹三十六簧也。按管乐也。

杆，诸杆也。从衣，于声。按大掖衣如妇人袪衣也。

引，满弓有所向也。从弓，于声。《广雅·释诂一》：引，张也。

纤，诘也。从系，于声。

跨，渡也。从足，夸声。张两股越渡。

胯，股也。从肉，夸声。按两股之间也。

剡，判也。从刀，夸声。《易·系辞传》：剡木为舟。

瓠，匏也。从瓜，夸声。有甘苦二种，今苏俗谓之壶卢。瓠即壶卢之合音。

袴，胫衣也。从系，夸声。字亦作袴。今

苏俗谓之套裤。若满裆裤。（见《说文通训定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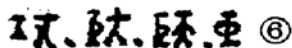
和“夸”字同衍一个声符的上列字群，除了各具“具体之大”外，差不多皆含“曲度”之义，而这正是“规”的功能意义。亦堪联类共参。

“夸父”特点之三是“父”字一端所指对应于“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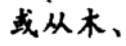
“父”字作为男子名号美称尚属后起，原初所指自有较为实在的内涵，《说文》字类联系保存了这方面的文化意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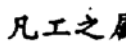
《说文·父部》：“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

这个说解含三层意思。首先“父”训“矩”，这是“声训”。段玉裁注为“以叠韵释之”，可以认为《说文》是从语源联系上将“父”解释为“矩”的。“矩”字自可合成“规矩”一词，圆者为规，方者为矩，古人称度量器之总名。“巨”为“矩”之初写，段《注》就写成“巨”，其古文结体作：

 ⑥

《说文》将“巨”系《工部》，其说曰：

巨，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桀，巨或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古文巨。大凡从工结体之字皆有“规矩工巧”之意，《说文·工部》：

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凡工之属皆从工。，古文工从彡。

根据《说文》的联类，“工”其实就是“巨”的初文。高鸿缙《中国字例》中说：“工象桀形，为最初文，自借为职工、百工之工，乃加画人形以持之……后所加之人形变为夫，变为矢，流而为矩，省而为巨。后巨又借为巨细之巨，矩复加木旁作桀，而工与巨后因形歧而变其音，于是人莫知其朔矣。”⑦其实，照我们的“取类说”，从木结构，揭示其质料；从矢构形，标志其形制功能：“矢者，其中正也。”

其次是又释为“家长率教者”，所说为引申义，从《说文》可试图寻求并建立“夸父”字构造和“丈人”等语言的联系。

第三层是说解“父”字结体特征：“从

又举杖”。“父”字甲骨文作、金文作、, ⑧皆从手举一物体。所举为何?《说文》透出这方面的消息:“从又举杖。”而“杖,持也。从木,丈声。”其实初文就是“丈”,奚世干校按:“丈,当是杖之本字。”《说文》“丈”系《十部》:“丈,从又持十。”《说文·十部》:“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如此看来,“十”字器在握,自可“丈量”天地四方了,这便是“矩”。

“夸”字所指对应于“规”,“父”字对应于“矩”,“夸父”便是“规矩”。看来“夸父”作为人格化的名称,当首先来自作为“规矩”的工具。这如同“昆吾”“壶”、“羿”和“射弓”、“椎”和“钟葵”等等并无二致。《说文》所揭示的,是一条极普遍的神话命名原则。神话思维规律之一,就是“从人一开始使用工具,他就从来未把工具看作是人造的东西;相反,工具被当作一种因其自身而在的存在,赋有着自身的力量;工具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反倒成为人受其意志支配的神或鬼——人感到自身依赖于它,于是就以种种具有宗教崇拜性质的礼仪崇拜它。在原始时代,斧头和锤子似乎尤其获得过这种宗教意蕴;对其它工具,诸如锄头、鱼钩、矛或剑的崇拜至今尚可在未开化部族中发见。在依韦部族中,铁匠使用的锤子被看作是一位强有力的神,依韦人崇拜它并向它奉献牺牲。工具从未被看成是人制造的东西、某种想到而后制造出来的东西;相反,工具被视为某种‘天赐之物’。工具并非起源于人自身,而是起源于某种‘文化英雄’;这个英雄要么是神,要么是兽。”^⑨《说文》中的“夸父”意象,亦堪联类。在中国《世本》等文献所载工具的发创,大要须作如此解会。

b. “夸父逐日”的本事是远古时代人们观测天象,以太阳在太空运行距离的单位划分,进行时间单位的把握,确定时序季节以及每天的时间单元切割。以空间体现时间,这是原始思维的又一规律。这些在文献所载的传说里已基本潜隐失落。保存这一悠远记忆的唯有《说文》。

按《说文》字类联系所见之“夸父”,有下列特征可与传说记载对应:

其一、“举杖”与“举父”。

《山海经·北山经》:“梁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夸父。”郭璞注:“或作举父”。《说文》释“父”为“从又举杖”。而“举,对举也。”“举杖”,也就等于双手对举以持杖。二者相应若合符节。

其二、“举杖”与“弃杖”。

《山海经》记载这位夸父是与“杖”这一道具相联系的,而且直到死而始弃其杖。《海外北经》:“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个“邓林”据学者考证就是“桃林”^⑩。但这并不是桃园长林,也并不与《说文》所解之“杖”相矛盾。《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邓林在其(夸父国)东,二树木。”郝懿行说:“盖谓邓林二树而成林,言其大也。”

舍弃上述对应之处,在传说中剩下的东西对人们解读“夸父逐日”之谜已没有多少直接的帮助。

我们下面来看《山海经》关于“夸父逐日”始末的最为完整的记载: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按《海外北经》的这段记载,人们很自然地得出夸父逞勇蛮作、不自量力的解会,再补以《大荒北经》的有关记载: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互相比照,再联系《说文》,又可知:

其一、夸父逐日,所要追赶的是“日景”(即日影),也就是太阳的投影。古人计算时间称“晷刻”,而“日景”也就是“晷”,《说文·日部》:“晷,日景也。”可见古人所追对象实际上是太阳投影移动的轨迹,人们以“规矩”(夸父)进行测定、划分。古人假空间划分以切割时间,比如:

“时”，《说文·日部》所收古文作，其说曰：“古文时从之日。”“之”为动符，甲骨文作、①，从止在一上，止为人足之象，一为地上，象人足自某一地点有所往。《尔雅·释诂》：“之，往也。”因此，《说文·日部》古文时作，即表明古人对于时间的观察与把握：太阳天体在空中的运行，是其参照。

其二、“夸父入日”，所指就是“逮之于禺谷。”参考其它相关文献可知，“禺谷”就是“虞渊”、“昧谷”、“蒙谷”，也就是日落之处。《山海经·大荒北经》郭璞注：“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虞渊，是谓黄昏。”“昏”字所指时刻，太阳已落入地下，《说文·日部》：“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天文训》又载：“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比勘《尚书·尧典》的记载，“蒙谷”又即“昧谷”；在空间方位上为西方：“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传》：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说文·日部》：“昧，……一曰闇也。”可见“入日”之处，也就是夸父观测的终点，相对于这个终点的始点应该就是“暘谷”，《说文·日部》：“暘，日出也。从日，易声。虞书曰‘暘谷。’”“暘谷”作为日出之处，相对于“禺谷”还有个名称叫“隅夷”，《说文·山部》也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暘，一曰隅铁暘谷也。”这里“铁”就是“夷”，《说文·金部》“铁”下收录其古体写作，即其证。《尚书·尧典》：“分命义仲，宅隅夷，曰暘谷。”《传》：“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暘谷。”《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暘谷。”

这样联系起来考察，“夸父”观测的是太阳由东到西、由出到落的整整一天的运行轨迹。这个过程，传达出远古人们对于时间把握和确定的特点，即以观测天体日象的运行，来划分时令时刻，从而安排社会集团的日常生活。《尚书·尧典》里有有关的记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隅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

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十三经注疏》本）我们要结合孔颖达的《正义》来考察就不难发现：

其一、季节时序的划分，总是对应于某一星象；季节时序的规定，又总是参照于某一方位。

其二、天象的变化，也即时令的更替与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物息息焉通，悠悠焉会。

其三、上古时代，社会集团对于天地四时的观测工作极为重视，往往需要“分命”专职官员，长期驻守在固定的相应的观测地点。

其四、分布在各地相应的观测天象运行、确定时间更替的专职人员，对这项工作是相当敬畏的，由“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然后到“敬授人时”。“夸父”既人格化作为观测太阳运行情况者，怎么会去向太阳挑战、进行不自量力的竞赛呢？

《说文》有关字类所隐括的“夸父”本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中国典籍所反映的文化背景相应相合的，而且和西方民族的时空观念及其体现也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我们看到，象左与右、前与后这样最简单的空间关系，被一条沿太阳轨迹由东向西的线划分开，并被一条由北向南的垂直线平分——所有时间间隔都源于这些交叉的线段。在那些把这种方法发展得最为明晰和完善的民族中，这种关系常被模拟于最常用的时间术语。拉丁词季候来源于天界的观念及标示。……

把空间划分为各个方向和区域，把时间划分为若干阶段，两者是平行地进行的②。

上引中西文献资料，使我们有理由联系

到在殷墟卜辞中所发现的大量的“出日”、“入日”之祭的商人档案记录：“乙巳卜，王宾日”（《佚》872）“出入日，岁三牛”（《粹》17）；等等。郭沫若、陈梦家等人根据卜辞材料，推断殷人对太阳有朝夕迎送的礼拜仪式。《说文》所释“父”为“从又举杖”、“丈”又为“从又持十”；而甲骨文中“甲”即作“十”，有人认为“十”为测日之表，殷人先世上甲微是殷代第一个用“十”测日影以确定时刻的^⑬。

c. 夸父神话的田野调查异文及有关习俗的发现，可以与我们的稽考《说文》有关字类所揭示的“夸父逐日”本事相互印证。

其一、《夸父峪碑记》所考证夸父山之由来。河南、山西、陕西交界处的灵宝县，古代即称桃林，周时称桃林塞，隋代叫桃林县，至唐天宝元年始改为灵宝县，按《地理通释》所载：“桃林从潼关东至函谷关，西至华阴等地。”灵宝西阎乡庙底村保存了一块清代道光年间所立的“夸父峪碑”，从《夸父峪碑记》的主要内容来看，此碑所立，主要是为了解决周围山民关于夸父山山权问题。碑记考证了夸父山的由来，录入了“夸父追日”的传说：“东海之滨，有夸父其人者，疾走善行，知太阳之出，不知其入，爱策杖追日至此山下，渴而死。山因以名焉。”又云：“此山之神，镇佑一方，民咸受其福，理合血食。兹故土八社士庶人等，每岁享祀，周而复始，昭其崇也。”

由此可见，夸父逐日有着明确的求知目的即了解太阳出入（升落）情况，受当地人的无尚崇拜。

其二、民间流传神话中的夸父之死及桃林的由来。民间口耳相传神话对夸父山、桃林来历的解释是：相传在五千年前，黄帝族与炎帝族在阪泉地方发生了冲突，在中原打了一仗，结果炎帝族战败。当时，夸父族是炎帝族的一个部族，被黄帝族下的一名大将应龙追赶西逃。夸父族逃到灵宝西部，正遇上八年一大旱的酷热天气，人们饥渴难忍，头领夸父不幸渴死在这里。夸父族的全体成

员，决定在这座山下定居下来。他们把头领夸父葬在这座山下，因而也就称这座山为“夸父山”了。夸父临死时，嘱咐子孙要种植桃树，所以这里就叫桃林了。

由此可见，“夸父”之死，与“追日”或许不是同一过程，而是后来逐渐积累上去的。

其三、民间传说中“夸父逐日”的起因和经过。传说很早以前，有个巨人夸父，只知道日出，不知道日落。为了弄清日落的地方，才和太阳赛跑的。他追日来到此地，正好天近中午。夸父心想，我喝点水休息一下，再和它赛跑。谁知夸父一觉醒来，太阳已经进了西山。夸父一看追不上太阳了，一气之下就死在这里^⑭。

可知“夸父逐日”，显然潜含着原始人探求自然奥秘，求知的意义。

①《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2页。

②《二十二子》毕沅校本。

③见容庚《金文编》所录。

④⑥见《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卷五所著录。

⑤《甲骨文字典》卷五，第510页。

⑦见《汉语大字典》卷一《匚部》。

⑧见高明《古文字类编》。

⑨〔德〕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中译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0—82页。

⑩毕源《山海经新校证》：“邓林即桃林也，邓、桃音近……盖即《中山经》所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矣。”

⑪《甲骨文编》卷六。

⑫〔德〕恩·卡西尔《神话思维》中译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122页。

⑬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⑭所引碑文、民间传说均见张振犁著《中国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09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一般认为宫体诗兴起于南朝文坛的新变之风。其实,当时的宫体诗人也是新体诗创作的积极参与者,而他们自觉创制宫体,也是当作诗歌新变的一条途径。陈代的姚察就指出:“(徐摛)属文好新变,不拘旧体。……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①今人孙康宜教授也说:“萧纲和他的朋友将他们的宫体诗创作称为一种‘新变’(innovation),或许,这是指宫体诗创作是一个与几十年前的声律新变(the tonal innovation)同等重要的诗歌运动。实际上,‘新变’已几乎成为宫体诗创作的标志。”^②

宫体诗大都声律协调、体制短小、文辞华丽,确实具有新体诗的特征。但与新体诗较广泛的创作题材相比,宫体诗更集中于艳情艳物之类的表现,审美情趣也有别于新体诗的清丽而趋向于艳美,尚俗倾向更甚于新体诗。宫体的“新变”,既与当时诗坛新变大势有密切的联系,也有它自己明显的独特性与阶段性。可以说,宫体诗是南朝新体诗创作潮流中的讹变支脉。

宫体诗最显著的特征是“艳”——艳物、艳事、艳情的内容,艳丽的辞藻。因此,宫体诗也常常被称为“艳诗”。然而,宫体诗虽大兴于梁代,艳诗却源远流长。冯定远认为宫体诗“作俑”于鲍照与沈约:“至于沈、鲍,文体倾倒,宫体滔滔,作俑于此。”^③刘师培则将“侧艳之词”溯源至晋宋:“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晋。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歌》、《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用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有惠休。

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④其实,《诗经》中的《召南·野有死麋》和《卫风·硕人》等已有“艳”的表现,《楚辞·招魂》等亦“长言摹写,极女色燕昵之盛。”^⑤之后,宋玉的《神女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上林赋》,张衡的《舞赋》、《西京赋》,傅毅的《舞赋》,蔡邕的《协和婚赋》、《青衣赋》,边让的《章华台赋》,曹植的《洛神赋》,乃至陶渊明的《闲情赋》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艳”的描写。就文人诗而言,张衡的《四愁诗》,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曹丕的《善哉行》、《浮萍篇》,曹植

的《美女篇》、《名都篇》,阮籍的《咏怀诗》其十九,傅玄的《有女篇艳行歌》,张华的《情诗》,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等等,都或多或少称得上是“侧艳之词”。汤惠休、鲍照的《白纻歌》以及沈约的《六忆》等诗,也确实以“淫艳”的表现直接影响了梁代诗人。尽管艳诗(赋)源远流长,历代不绝,但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梁陈宫体诗那样的艳诗创作高潮。萧齐时,艳诗的

创作虽较之前代为甚,仍未形成独立的一体,只是梁陈宫体诗的直接先声而已。进入梁代后,诗坛的艳风才愈煽愈烈,终于从新体诗创作潮流中讹变出门户独立的宫体一派。

这种讹变的原因,首先在于文坛领导中心的变化。永明前后,文坛的领导人物是沈约、谢朓、王融等士族文人,以声律说为先导的永明新变,正是由他们“创其首”、“扬其波”,引起“士流景慕”^⑥,进而衍化为新体诗的创作高潮。入梁之后,文坛的领导中心由士族文人转移到帝王皇族:“时主儒

宫体正义

□王力坚

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⑦应该承认，南朝帝王爱好、奖励文学，无疑对当时诗歌的繁荣兴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以帝王爱好为转移的创作风气，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诗歌发展引向了“宫体”一途。

或许就因为这样，以往的论者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便常常将宫体诗的创作跟帝王贵族的奢侈腐化生活直接挂上勾：

迨宫体既兴，情思逾荡。绮罗泽之好，形于篇章；帷闼床第之私，流为吟咏。……史述帝王之容，而柔丽纤妙如状夫人，则其淫荡轻艳，根于体性，从可知矣。⑧

可以使纵欲的要求升华一下，使由生理的满足提高为心理的满足，以文学来做精神生活的一种寄托——这便是宫体诗。⑨

这些评价综合为两点：其一，宫体诗的创作，跟帝王贵族的生活实况、乃至作者本人的“体性”直接挂钩，即宫体诗创作与现实生活是一种恒等式的关系；其二，宫体诗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满足荒淫享乐的要求，包括“由生理的满足提高为心理的满足”。

对这种评价，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诚然，宫体诗的创作和帝王贵族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但宫体诗并非生活的原版复制。以下史实，常常被有关论者引为例证：“（宋前废帝）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⑩“（齐郁林王）与左右无赖二十许人，共衣食同卧起，妃何氏择其中美貌者，皆与交欢。”⑪“（陈后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夫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骰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到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⑫然而，这类史实在宫体诗中却没有得到“如实”地反映，尤其是前两例性淫乱的现象，更难在宫体诗中寻其踪影。显然，宫体诗的作者是在有意地“回避”。这种“回避”，仅用“升华”、“提高”（王瑶语）来解释是难以服人的。

如果说陈后主、江总等陈代诗人的宫体诗创作，是以他们的荒淫生活为蓝本，那还

多少有道理；但从宋、齐、梁三代来看，宫体诗与生活，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现象。宋、齐两代帝王贵族生活，可谓相当荒淫腐化，但当时宫体艳诗并不多见（宋前废帝与齐郁林王更无诗作传世）偶作艳诗的，反倒是“才秀人微”（《诗品》）的鲍照，与“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梁书·沈约传》）的沈约等少数诗人。梁代是宫体诗大盛的时代，然而，倡导宫体之风的萧梁帝王们，却是南朝少有的不荒淫君主。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南朝多淫主》篇，就唯独没有梁代君主荒淫的记录。相反，史书的记载却是：梁武帝萧衍“不饮酒，不听音声……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押腰，盛夏暑日，未尝褰袒。”（《梁书·武帝纪》）简文帝萧纲“实有人君之懿”，“威惠外宣，德行内敏”（《梁书·简文帝纪》）。元帝萧绎“不好声色，颇有高名。”（《梁书·元帝纪》）昭明太子萧统“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⑬当时的宫体诗人如徐摛、徐陵、刘孝仪、刘孝威、萧子云、庾肩吾等，在史书中也没有留下荒淫放荡的恶名，有的还颇有清简刚正的佳评。面对这样的史实，上引诸论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那么，宫体诗与诗人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宫体诗创作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一段话，历来被视为萧纲倡导宫体诗的纲领性主张。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认为：“萧纲不仅带头写《咏内人昼眠》、《美人晨妆》等等描摹色情的宫体诗，而且还提出公开的理论主张：‘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在萧纲的积极倡导下，当时的宫庭文人庾肩吾、庾信、徐摛、徐陵等就奉承他的旨意，大力扇扬宫体诗风。他们甚至还写女人的衣领、绣鞋，写枕、席、衾、帐等等卧具，满足他们变态性心理的要求。”这种意见，显然是把“放荡”理解为淫荡腐朽之义，由此推理，便自然认为“文章且须放荡”就是鼓

吹表现变态性心理的色情文学了。

魏晋以来的文坛风气,一直以放任不拘为主。放任不拘的创作风气,使诗歌创作更为自由和多样化,也日益趋向于艺术及唯美的孜孜追求,到了萧纲的时代,由放任不拘趋向艺术唯美,更成为势不可挡的文学新变大潮流。而萧纲以及萧衍、萧绎、萧统等人,恰恰就是在这新变大潮流中闯荡出来的弄潮儿。因此,萧纲就自然选择了“放荡”作为为文之道。

萧纲具有统治者兼诗人的双重身分。从统治者的身分出发,加上武帝萧衍推崇儒、佛二教的影响,萧纲必然要求立身要谨重;但从诗人身分出发,他又要求为文须采取与立身相异的“放荡”态度。在《与湘东王书》中,萧纲就将守道与为文严格区别对待:“若夫六典之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慕《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总之,萧纲是立场鲜明地认为为文与立身各有不同的准则,从而使为文摆脱了对立身之道的依附,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立身慎重与为文放荡这两种对立的形态,一旦统一到一个人身上,二者之间就或多或少有内在的联系。一般来说,前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制约着后者。这也是宫体诗——尤其是梁代宫体诗能够没有完全流于荒唐淫荡地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宫体诗之前的艳情文学创作,也曾有过以立身之道自我制约的表现。如曹植的《洛神赋》对女色作了极其妖冶艳美的描绘:“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鬋鬋,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但结局是曹植“收和言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明确地显示出以“礼防”来自我制约情思肉欲的流宕。而宫体诗人在诗中的自我制约,表现为作者(以及读者)与描写对象(女色与艳情)之间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不仅表现为道德上的安全距离感,还表现为艺术上的审美距离感,从而使宫体诗在内容上不致于沦落到淫荡无度的深渊,在艺术形式上则

获得较“纯净”的审美娱乐感受。

萧纲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创作主张:“寓目写心,因事而作。”这是萧纲为了解决“表现什么”而提出的主张。从晋宋山水诗的“身所盘植,目所绸缪”、“应目会心”,到齐梁新体诗的“即目”、“所见”、“直寻”,诗歌的表现题材,都是以眼前事物和心中情感为主。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萧纲更明确地说明了“寓目写心”的具体内涵:“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影里”以下四句,便是寓目所见之物,“高楼”以下四句,便是写心所表之情。这些物与情无疑都是属于宫廷生活的范围。可见,“寓目写心”也是萧纲对宫体创作题材的要求。从山水诗,到新体诗,到宫体诗,对创作题材的要求是大致一样的,但在具体表现中,又有明显的差异。就“寓目”而言,晋宋时期的山水诗主要是表现奇峰异水、高山大川等大自然景象;永明之后的新体诗(包括此阶段的山水诗——下同),则多写寻常风景、园林庭阁,以及对一花、一树、一草、一鸟的表现,取景的角度越来越小,题材的范围,也从广阔的山水大自然,逐渐收缩到作者生活周围的狭窄空间;到了宫体诗,更是集中于表现宫廷内所特有的台池花卉及宫女歌伎(即“细腰”“好面”之类)。就“写心”而言,晋宋山水诗体现一种哲理化的意绪,新体诗则多抒发作者的生活感受,宫体诗却集中表现宫中女性(宫女、歌伎等)的艳情愁思。

与“寓目写心”的主张有密切联系的,就是“缘情绮靡”的追求。如果说“寓目写心”是要求表现宫廷生活题材的话,那么,“缘情绮靡”则是强调宫廷题材应遵循唯美的原则来表现。“缘情绮靡”,即陆机《文赋》所提倡的“诗缘情而绮靡”。陆机这一主张,对六朝文人的诗歌创作影响甚大,但在陆机之后,却很少人说过类似的话,只有到了宫体诗的时代,从辞、义两方面都类似陆机主张的理论表述才大量出现:

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

若乃缘情体物，繁弦缛锦；纵横艳思，笼盖辞林。（萧子范《求撰昭明太子集表》）

况复丽藻星铺，雕文锦缛；风云景物，义尽缘情。（李昶《答徐陵书》）

搦札含毫，必弘靡丽，情绮縠之思，郁风霞之情，质不伤文，丽而有体。（王僧儒《詹事徐府君集序》）

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宇文道《庾信集序》）

吟咏情性，往往丽绝当世。（邢臧《与王昕王暉书》）

天时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清文满箴，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葡萄之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一作谏）德之辞。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徐陵《玉台新咏序》）

这些表述，可归纳为三点：一、所缘之情，多为艳情。即萧纲所说的“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之类宫中女性情怀。上引的“纵横艳思”，“情绮縠之思，郁风霞之情”，和佳丽登高“时有缘情之作”，指的就是艳情。二、缘情与体物进一步融合。缘情即写心，体物即寓目。强调写心缘情体现于寓目体物之中，上引例三、例四就明显有这种要求。萧纲《劝医论》对此表示得更为明确：“文若为诗，则多须见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须寓目，详其去取，然后丽辞方吐，逸韵乃生。”三、无论缘情或体物，皆强调要“绮靡”，这包括情艳、物美、辞丽。上引诸例（包括萧纲《劝医论》）都有此意。这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唯美追求，而这种唯美的追求，恰恰又是宫体诗能够避免流于荒唐淫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道理很简单，生活中的荒唐淫荡，显然是与“美”

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宫体诗人将生活引入诗中时，便对生活原型做了艺术的“升华”处理。唯美的追求，也就成了生活与诗歌之间的一个“过滤器”，它在艺术审美方面，对宫体诗的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宫体诗创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再现”生活，而在于追求和实践其艺术的唯美理想。宫廷生活题材，只是作为宫体诗人实现其艺术唯美追求的媒体之一（其它媒体便是文辞、声律、结构等）。

综上所述，无非是强调三点：一、宫体诗是文坛新变的产物，并以其特有宫廷女色艳情为主要题材而自成一派；二、时代、社会各方面的因素对宫体诗的产生与兴盛有诸多影响，但宫体诗并非生活的复制翻版，而是艺术化的再现；三、宫体诗创作的主要目的，不是满足肉欲刺激，而是实践对艺术唯美理想的追求。

①《梁书·徐摛传》。

② Kang-i Sun Chang Six Dynasties Poet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4.

③《围炉诗话》卷二引。

④《中国中古文学史》，香港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91页。

⑤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

⑥皆见《诗品序》。

⑦⑩⑪⑫⑬分别见《南史》的《文学传序》、《宋前废帝纪》、《齐郁林王纪》、《后主传》、《萧统传》。

⑧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上古至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⑨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作者单位：新加坡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博士生导师桂诗春教授谈应用语言学

□本刊记者 陶原珂

桂诗春，广东省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外语学会会长。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等，主编《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研究》等。

问：桂诗春先生，从一些资料看来，应用语言学在世界上只有不过 90 年的历史，发展却十分蓬勃；而在国内，贵校在这方面的研究是走在全国前面的，特别是以您牵头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点，集中体现着你们在这一学科方面的研究实力。您能否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博士点建设的情况？在学科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吗？

答：可以的。我们广东省外语外贸大学从 1978 年开始建立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班，现在已经招生 15 届了。开始那一年，王宗炎先生还没调回中山大学，最初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生课程的设立他也参与了。在这个基础上，1984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我们成立了一个“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学科点”，发展本学科的研究工作，1986 年起获得该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全国该学科第一个博士点，而且是全国外语院系十多个博士点中五个国家重点之一，至今已培养了博士生多人。

我们这个“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点，有四位博士生导师，黄建华教授是词典学方面的专家，何自然教授是语用学方面的专家，我和李筱菊教授则都是研究应用语言学的。我的研究范围涉及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外语教学、外语测试等方面。在我们的师资队伍中，还有三位从国外毕业回来的博士——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各一名。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馆藏的语言学书籍比较齐全，不亚于国外的

大学。

我们的应用语言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是通过基础研究改进英语教学和学习过程。另一方面是测试，例如设计全国范围的标准化考试等。还有就是编写教材，李筱菊编写的“交际英语”教材，体现了许多崭新的外语教学思想，在同行中受到广泛称道。

问：据我的理解，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如何应用于语言教学的，它的主要研究对象自然是语言教学和学习过程了。您认为，它如何有别于一般教学法的研究，而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学科呢？

答：从狭义来说，应用语言学是研究外语教学的，外语教学已经有 25 个世纪的历史了，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应用语言学是 60 年代建立起来的。从广义来说，它包括了许多学科。我们原来以研究英语教学为主，现在逐步扩大到自然语言处理、语言使用的心理过程、计算语言学等方面。应用语言学是实验性的科学，不是思辩性的（speculative）科学。它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自在物”（外语教学）变为“自为物”（有理论指导的、有目的的、科学探究的活动）。具体一点说，应用语言学利用语言学本身（如关于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的语言理论、语言描写）、语言学的一些边缘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教学理论（如教育学、教育测量学、

教育技术)、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理论来研究和组织外语教学。

问:应用语言学有没有一个基本理论或基本方法?它的基本理论或方法有什么特点吗?

答:应用语言学是一个开放系统,是面向过程的,面向语言教学、语言学习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广阔的应用范围。因此,它适合于用一般系统论的科学思想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系统思想来指导应用语言学,有两个运用层次方面:一是运用一般系统论来认识应用语言学的性质、特点和过程,从而奠定应用语言学的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二是运用系统工程的运筹学的原理,解决应用语言学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比如解决学习者在心中如何建立语言系统的过程的问题,解决语言学习和使用中与环境进行交换的信息处理过程的问题,等等。

问:语用学和词典学,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学科位置是如何确定的,应该如何认识?能否谈一下你们在这两个学科方面的优长之处?

答: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是指联系实际问题进行的语言研究和语言学研究,包括词典学、翻译法、言语病理学、语言规划、机器翻译等等。从语言是怎样学的到语言是怎样使用 and 理解的,都包括在应用语言学的范围内。

我们的词典学方向主要是双语词典学。全国双语词典学学会就设在我校。黄建华教授曾经在联合国驻法国的教科文组织工作了许多年,收集了许多词典学的资料,回来后写了《词典论》一书在杂志上连载,并且主编了《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一书,几位合作撰写人都是本院的教授。

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研究已经不局限于语言内部因素(语音、句法、语义等)的研究,而把许多边缘学科吸收进来了。语言学边缘学科的发展,语言与外部因素的联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方面,体现了语言学界对语言和语言学的认识有了重大改变。语用学与语言学的核心学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与许多边缘学科发生联系,前景广阔。语用学(pragmatics)研究特定情景下语言怎样理解的问题。过去,John

Lyons 把语用学归入语义学内,现在有了明确分工:语义学研究逻辑性的语义,语用学研究非逻辑性的语义。这十几二十年来,语用学发展得很快,1978年在比利时成立了国际语用学会,Mey当了《语用学杂志》主编。中国首先是由广外设立与国际联系的资料中心,现在国内的会员已发展到三四百人。1989年在广外举行了全国语用学会议。今年将在昆明师大召开第四届年会。

问:从您已经发表的一些论文来看,您近年好象还比较关注与语言学习有关的认知方面的问题。从学科研究的发展来说,这种关注有什么必然性吗?

答:认知科学也是60年代以来兴起的。认知包括知觉、表象、记忆、识别、理解、意识、假设、思维、决策、问题求解等一系列心理表征,了解认知的途径是研究它的运算过程,所以,认知科学也是研究过程的。认知科学对应用语言学的影响,有着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意义,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语言系统和言语活动的本质,如促进了应用语言学认识母语和外语的关系、明示的语言知识和隐含的语言知识的关系、语言知识内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实际上,认知科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有许多结合部,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认知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语言学(包括应用语言学)是认知科学的重要支柱,应用语言学家也意识到要吸收认知科学的养分,以葆自身学科的青春。

问:从应用语言学的任务和应用语言学在世界上的发展趋势来看,您认为我国的应用语言学研究目前还有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吗?

答:认知科学是当前世界上四大前沿科学之一。我国目前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的研究与语言学、特别是心理语言学研究脱节了,只有使两部分研究人员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另外,中国语言学界、对外汉语教学界和外国语言学界三股力量应该合流,外国语言学理论当然应该应用到汉语研究上来。语言研究与其他一些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当然,不是每个人什么都搞,能够搞一个方面就可以了,互相依存。

“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研讨会综述

□ 关 仪

由广东中国文学学会、《学术研究》杂志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于8月26日在广州召开。研讨会由中国文学学会会长吴宏聪教授主持，有20位学者参加。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与会学者以史为鉴，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同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对抗战时期的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肯定，并围绕抗战文学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

一、抗战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与会学者认为，抗战文学既是五四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开端。抗战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知识分子走向乡村，进一步唤醒中国的广大农民。重温抗日战争文学与中国民族命运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密切联系，可以看到，抗战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和巨大意义。因此，抗战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抗战文学描绘了一个时代光明与黑暗，正义与罪恶殊死的较量，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舍身杀敌的勇气，不仅在推动全面抗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为数不少的“灿烂文艺之花”。抗战作品是“民族心灵的呐喊，它们共同构筑起一座气派雄伟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丰碑，并对发展今天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启示。

二、对抗战时期作家及作品的评价

回顾抗战时期的作家、作品，与会者认为，抗战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中，其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不少作品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危机中的觉醒和抗争，并在作品中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如李金发的《亡国是可怕的》、何其芳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这些作品都有一种历史的悲壮感，抗战活报剧和街头诗，也曾动员和焕发了民众的抗战力量，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直到“文革”后的新时期，抗战文学仍然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可火的《战争和人》、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等，写出了抗日救亡的历史惨痛，宗璞的《南渡记》、孙汝春的《弹痕》等亦再现了抗战风云的历史。

有学者评价，李尔重撰写的八卷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的“警世书”和“正气歌”，体现了作者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精神，兼有史学、哲学、美学价值，是一部“总根于爱”的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有学者认为，早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讨论民族形式问题起因于要匡正五四以后出现的“欧化”倾向，其根本目的是如何使文艺更好地汇入争取民族解放的主流。因此，这场讨论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有“具体的眼前的实践意义”使文艺更好地让广大中国老百姓接受，达到宣传抗战，唤起群众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民族形式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有人提出：民族性与自然形态的民间性不宜混为一谈，民间性的东西很多只是处在自然形态，而诗歌艺术永远是高于自然的。

三、抗战时期文学存在的不足

有学者在充分肯定了抗战文学的成绩的同时，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它们的不足。首先，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作品在描绘“人”的审美思考时，往往凝眸于民族意识的苏醒，而忽视了在此基础上把被炮火的嘶鸣唤醒了民族意识，进一步升华为个性意识，就更别说把人的觉醒与个性的发展，上升为本体论的高度。在急功近利的，带有浓厚乡村文化、政治文化色彩的要求下，知识者有时被描写成“自我谴责”的形象，因此，难以进入史诗性深度的思考。

此外，有些专家还指出，我们对一些流亡在海外的抗战作品有所忽视，研究界应把流亡海外的作家及作品，以及港澳台及海外作家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抗战的烽火也曾震动了千万海外华人作家，他们的工作和成就是不能低估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陶原珂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 ARCH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5/95

ISSN 1000-7326



ISSN1000-7326
CN44-1070

逢双月 25 日出版

定价：3 元/册